PLEASE RETURN TO
CHINESE SECTION
ORIENTALIA DIVISION

新建设

5 - MAR 1 0

SEP 9 1957

SOURCE UNKNOWN

学术性月刊

SEP 9 1957

8

1957

P
C402
H82
2nd set.

新建設　一九五七年　八月号(总第107期)

·反对資产阶級右派斗爭特輯·

粉碎資产阶級右派誹謗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种种謬論……朱　榕（1）
从事物的兩面性看右派分子对辯証法的歪曲……黃枬森（9）
試論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沙　英（12）
——学習"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笔記
談資产阶級社会学的反动性……王　康（18）
資产阶級的經济学不是科学……郑伯彬（24）
章乃器是怎么样的一个"經济理論家"?……吳大琨（28）

·学　术　論　著·

关于哲学思想的阶級性和繼承性……張岱年（32）
初級农業生产合作社中的地租問題……赵　靖（38）
宋詞發展的几个阶段……龙榆生（44）
略論战国秦汉社会的性質……童書業（51）

一得之見

应該重視中国經济学說史的研究……吳忠观（55）
整理和研究我国古典文艺理論的遺产……应　杰、安　倫（56）

学术通信：对"試論形式、內容和性質的关系"一文的几点
質疑和作者的答复……龔育之、王宗睦、关　鋒（57）

·專　　載·

中国哲学史講授提綱（初稿）（七）……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60）

編輯者：新建設杂志編輯委員会　北京东單区小甜水井1号
出版者：光明日報社　北京石駙馬大街90号
总發行处：邮电部北京邮局
代訂代售处：全国各地邮局　全国各地新华書店
排版印刷封面：光明日報印刷厂
印刷正文：北京市印刷二厂
預定价目　全年十二期 4.20元　半年六期 2.10元　三个月三期 1.05元
定費一律預收

印張：4　定价：（5）0.35元　本期印数：27,503

反对資产阶級右派斗爭特輯

粉碎資产阶級右派誹謗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种种謬論

朱　榕

馬克思列宁主义已經成为我們国家的指导思想，已經日益深入人心。这一情况就使得一切仇視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动分子不能不改变他們攻击馬克思主义的策略：即由公开否認馬克思主义轉变为表面上不反对馬克思主义而暗地里尽情歪曲、污蔑、丑化馬克思主义。敌人也意識到，今天在我国如果公开反对馬克思主义那是很不明智的，很难爭取、拉攏群众的，因此他們陰謀采用新策略来达到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次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利用共产党貫徹"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政策以及开展整風运动的机会，猖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的时候，就是采取这种計策从各个方面誹謗馬克思主义，妄圖取消以馬列主义作为我們国家的指导思想。右派分子詆毀馬克思主义的謬論是多种多样的，彙集起来主要有以下七論：（1）"教条論"，（2）"貧乏論"，（3）"过时論"，（4）"例外論"，（5）"排他論"，（6）"停滯論"，（7）"变質論"。对于这些謬論我們必須全面批判，各个击破，以保衛馬克思主义。

（1）"教条論"：

右派分子最普遍最惡毒的手法就是打着反教条主义的招牌来根本否定馬克思主义。他們先把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說成都是一無用处的僵硬的教条，然后再一棒子打死馬克思主义。

其实，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不止一次地說过：我們的学說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馬克思主义是代表無产阶級利益的科学的思想体系，而教条主义根本不是什么思想体系，它只是一种極端錯誤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学習方法和工作方法。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根本区别如果归結到一点就是对实际的不同态度：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是理論联系实际，即是說它的理論不是純粹理性思維的产物，而是从研究实际問題中引伸出来、总結出来的，同时又回头用以指导新的实践，并且不断以实践經驗来进一步丰富自己的理論；教条主义的主要特征是理論脫离实际，它把理論看成是与实际無关的殭化的公式，学習的时候不去探究理論是如何針对具体的实际情况总結出来的，而是書呆式地强記硬背，运用的时候不去思索如何根据理論的精神实質来分析、解决具体的实际問題，而是盲目地机械地把針对特定历史条件得出的理論原理不分青紅皂白到处生搬硬套。

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之間既然界限这样分明，为什么又常常糾纏在一起呢？这主要是主观主义在作祟，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使得人們不善于去掌握并运用馬克思主义的精髓，結果把生气勃勃的馬克思主义变成为死气沉沉的教条主义。当然，缺乏实践經驗也是促使我們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客观原因。馬克思主义是要解决全世界全人类如何实現共产主义这样一个重大的根本問題，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情况又是千差万别的，因此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如何实現共产主义必然帶有自己的許多特点。当我們还缺乏实践經驗的时候，在运用国际經驗和别国經驗以解决本国問題方面难免易犯簡單模仿和抄襲的毛病；一旦有了实践經驗之后，就能較充分地把握本国的特点，創造性地来运用国际經驗和别国經驗，教条主义就会减少以至絕迹。在我們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1931年至1934年之間，党的一些領导人曾因照抄苏联的某些經驗而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的錯誤。后来党在毛澤东同志領导下徹底清算了教条主义路綫，因此現在我們的党在学習国际經驗的时候就可能少犯錯誤以至不犯錯誤。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綫以及"百花齐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监督"等各項政策方針都是創造性运用馬克思主义和苏联經驗的榜样，而不是教条主义，这是举世公認的。当然在某些具体工作中，尤其是在理論教育和科学研究中，我們还存在着教条主义的毛病。这也正是我們正在不断努力克服的。

可是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却妄想把教条主义归罪于

馬克思主义，說教条主义就是来源于馬克思主义，說教条主义是馬克思主义本身固有的宿疾，說工人阶級和共产党人就是教条主义的創始者和化身。这完全是無耻的讕言。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虽然有时看似"貌合"，实則"神离"，兩者并沒有天生的姻緣。如果要追查教条主义創始者的話，难道地主阶級和資产阶級不是早就犯过許多教条主义的錯誤嗎？中世紀的經院哲学就是脫离生活不研究現实，而專門致力于从教会的一般信条来做出具体的結論，并且以此規定人們的行为准則，这豈不是教条主义的典型？中国封建社会中那种死背四書五經、套写八股文章的做法，豈不也是教条主义？你們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妄想在中国建立英美式的資产阶級的議会制共和国，这难道不是教条主义的夢想？历史注定了中国如果丧失了社会主义的話，只能倒退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妄想把英美式的議会制移植到中国来是絕对行不通的。

右派分子裝腔作势，似乎只有他們才是徹底深惡痛絕教条主义，其实他們深惡痛絕的乃是馬克思主义。試举一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識这是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天經地义，可是右派分子居然說"經济与生产是人們自己組成的，因此說經济环境决定人的思想就是教条主义。"这难道不是借反教条主义之名明目張胆地攻击馬克思主义嗎？教条主义我們是坚决反对的，但是决不允許右派分子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偷运資产阶級的貨色。

（2）"貧乏論"：

右派分子章伯鈞說："馬列主义沒有什么，不外講人事关系，就是父母、兄弟、夫妇、朋友之間相处的社会关系，关系搞好了，就是最好的馬列主义。……許多馬列主义巨著，最多是几个教条法則，倒不如中国古旧著作，早就把人事关系講得扼要而清楚。"他認为"詩經、論語还有用，馬列主义只有那么几条"，"还不如学学曾国藩家書"。罗隆基甚至認为"不学馬列主义也可以有馬列主义"。有的右派分子干脆否認馬列主义是一門科学，辱罵馬列主义只不过是"無产阶級革命的咒語"。总之，在右派分子看来，馬列主义簡直貧乏、淺薄、粗陋、單調，根本不值一学。

馬列主义是"不外講人事关系"嗎？完全胡扯。馬列主义主要是講阶級关系，是講無产阶級阶級斗爭的規律；在阶級社会中，离开了阶級和阶級斗爭的观点，还談得上什么人事关系？中国古旧著作中談人事关系时难道一般地不是充滿着像三綱五常之类封建道德倫理的說教？那一本古書有馬列主义这样鮮明的阶級观点？汉奸劊子手曾国藩的家書怎么能和馬列主义著作相比？当然，只有像章伯鈞这样的政治野心家才需要从祖师曾国藩的家書中去学習"登龙之术"和"出卖得値錢"之"道"。

馬列主义眞是像右派分子所說的"只有那么几条"嗎？完全信口雌黃。馬列主义可以說是自古以来唯一最丰富最艰深的学問。第一，从馬列主义的产生来看，馬克思恩格斯为了要解决自然和社会發展的規律这个总命題，曾經鑽研了、吸取了人类一切优秀文化的遺产。众所周知，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經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乃是馬克思主义三个最基本的来源。馬克思、恩格斯为了制定無产阶級解放的科学，曾經長期深入考察了、研究了資本主义經济制度、工人阶級狀况以及工人运动的經驗。試問，历史上有那一門科学的产生曾經吸收了这么丰富的养料？第二，从馬列主义的內容来看，它包括哲学、历史、經济、政治、軍事、文化等各方面的理論，它的最基本內容也有哲学、經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組成部分。而且这些部分随着实踐經驗的增多和科学理論的發展，其內容也日益丰富。第三，从馬列主义的运用来看，为了使它适应于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土壤和气候，就必須深入調查实际情况，掌握民族特点和时代特点。学会善于以馬列主义之矢射中革命之的，这是十分艰巨的过程。总之，無論从馬列主义的产生、內容和运用来看，它都不是貧乏、淺陋的，而是十分丰富、艰深的。

右派分子还借口馬列主义貧乏而主張恢复資产阶級的社会科学，美其名曰：向資产阶級社会科学吸取养料，似乎不这样做馬列主义就要枯萎。他們說：馬克思主义的产生就是靠資产阶級的社会科学，你們現在为什么背弃这个傳統？是的，馬克思主义的产生确实从資产阶級的哲学、經济学、政治学、历史学那里吸取了养料，这是因为那时还处于資本主义上升时期，資产阶級还有进步性，这反映在資产阶級学者的著作中还有合理的內核，如費尔巴哈的唯物論、黑格尔的辯証法、亞当·斯密和李嘉圖的劳动价值論等等；現在随着資本主义日趋腐朽和資产阶級日益反动，資产阶級的社会科学也完全赤裸裸暴露出其反动本質，它不仅是不科学的，而且是反科学的，再談不上有过去那样的合理內核了。其次，还要看到，自从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就宣告了資产阶級社会科学的徹底破产，随着馬克思主义的傳播与胜利，愈来愈多的正直的有才能的学者逐步都归附到馬克思主义旗帜下而抛弃了資产阶級社会科学，这样就使得資产阶級社会科学不仅日益反动，而且也日益枯竭苍白。我們从根本上否定了資产阶級社会科学，是否意味着一笔抹煞資产阶級社会科学对我們有任何价值呢？不是的，

資产阶級社会科学本質上是为資本主义和資产阶級辯护，因此它必然是反科学的，但是在它里面还是积累了許多知識材料，这些知識材料当然我們可以批判地加以利用。例如列宁在著“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書时，就曾从資产阶級經济学家霍柏森、黑依曼、克斯特涅尔、蘭斯堡、施里德尔、叔尔茨·黑維尼茨等人的著作中批判地吸取了他們对帝国主义的某些政治經济特点所作的分析和許多統計材料。可見，右派分子說我們全盤否定資产阶級社会科学的全部知識，这完全是恶意的歪曲。但是也应該肯定：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丰富和發展是靠总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踐經驗，是靠与各种机会主义和資产阶級社会科学作斗爭，而不是靠吸取資产阶級社会科学的养料。尤其是在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中各种現象的規律性时，資产阶級社会科学更不可能提供給我們什么知識材料。右派分子打着吸取养料的幌子其目的就是要恢复資产阶級社会科学在我国的統治地位，取消以馬克思主义作为我們的指导思想，为資本主义在我国的复辟奠定理論基础。

（3）“过时論”：

右派分子章伯鈞說：“馬克思主义已經过时了，一百几十年以前，資本家剝削工人到了極点，馬克思根据那时的情况，創造出馬克思主义进行阶級斗爭，这是有力量的；但它种到人們头腦中的东西是要人們反抗統治者，这种思想对于搞革命、推倒統治者、夺取政权很有用。但是現在已經取得了政权，工人阶級自己成了統治者，以前那一套就过时了，再强調就会引导到对自己的斗爭。”章伯鈞說这一段話的意圖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要我們从思想上解除阶級斗爭学說的武装，要我們不要用阶級斗爭的武器来对付他們这般政治野心家，同时他們还以这种論調作掩护，对我們进行猖狂的阶級斗爭，以便由他們篡夺国家的政治領导权。这眞可以說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馬克思主义关于阶級斗爭的学說眞是已經过时了嗎？当然沒有。从国内情况来說，“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說来，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众阶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級的殘余还是存在，資产阶級还是存在，小資产阶級剛剛在改造。阶級斗爭并沒有結束。無产阶級和資产阶級之間的阶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阶級斗爭，無产阶級和資产阶級之間在意識形态方面的阶級斗爭，还是長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毛澤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不少人以为我国农業合作化和資本主义工商業改造的高潮过去后，阶級斗爭也就結束了，因此可以高枕勿憂了。这次資产阶級右派在政治上思想上对我們發动的猖狂进攻，該使这些沉睡的人猛醒了吧！？从国际情况来說，虽然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已經日益巩固、强大，但是資本主义世界体系还存在着，帝国主义还有相当的力量，他們每时每刻都在企圖消灭我們社会主义国家，美帝国主义还豢养着蔣介石集团盤据在我国的台灣，因此阶級斗爭、尤其是思想領域的斗爭，更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也更是激烈的。去年的匈牙利事件以及敌人利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批判个人崇拜的时机对我們所發动的思想进攻难道不是鉄証嗎？美帝国主义和蔣介石集团經常对我們进行武裝挑衅，并且不断派遣特务間諜潛入我国进行破坏活动难道不也是鉄証嗎？無产阶級的阶級斗爭是从資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建成这一整个历史时代長期的規律性現象，因此阶級斗爭的学說不是那么輕易过时的。

有的右派分子說：“过去的馬克思主义是阶級斗爭的馬克思主义，現在的馬克思主义应該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馬克思主义。”这样把阶級斗爭和社会主义民主对立起来完全是錯誤的。民主从来是有阶級內容的，民主从来是离不开專政，离不开阶級斗爭的。社会主义民主在历史上是最高类型的民主，它是屬于占人口絕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它是眞实的、不折不扣的、并且有物質保証的，但是它还是离不开無产阶級專政，离不开对少数反动分子的鎮压，离不开阶級斗爭。尽管随着敌对阶級的被消灭，專政的面可以縮小，民主的面可以放寬，然而民主总是与無产阶級專政共存的。一旦阶級斗爭完全熄灭，無产阶級專政消亡，那么社会主义民主也就同时消亡。無产阶級專政与社会主义民主兩者可以說是同生、同在、同灭。列宁在描述民主的辯証發展过程时曾提出了如下的公式：“由專制主义到資产阶級民主，由資产阶級民主到無产阶級民主，由無产阶級民主到完全無有。”他在解釋这个公式时曾經这样說过：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由于实現了“眞正完全的民主，民主变成習慣，因之就死灭……完全的民主就等于無民主，这决不是一句取巧的說話而是眞理！”（見“馬克思主义論国家”一書，着重点是原有的。）当然，这里所說的將要死灭的民主是指“民主与專政”这个范疇的民主，而不是指“民主与集中”这个范疇的民主。至于“民主与集中”那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也会万古長存的。

話說回来，既然社会主义民主是离不开阶級斗爭的，那么右派分子妄圖以“社会主义民主”来代替阶級斗爭，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他們所鼓吹的“社会主义民主”不外兩种含义：（1）实行互無領导关系的多党制度，自由竞选，輪流执政，兩院制等等，这

一套豈不明明白白就是資产阶級民主？（2）实行不要專政、不要集中的“絕对民主”，这种小資产阶級無政府主义的“絕对民主”，必然瓦解劳动人民的战斗性和組織性，造成天下大乱的局面，便利于右派分子趁机大肆活动，便利于資本主义复辟和帝国主义卷土重来。

更进一步說，即使將来共产主义社会建成，阶級斗爭完全消亡，因此屬于阶級斗爭范疇的民主、專政、国家、法律、政党等等也都消亡，那时馬克思主义仍然不会过时。馬克思主义的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唯一眞正反映了、說明了自然和社会發展規律的科学。关于剩余价值、無产阶級專政等經济政治原理，都是根据馬克思主义的立場、观点、方法为了解决消灭資本主义和建成共产主义这个大問題而提出的。一旦共产主义建成，那时根据馬克思主义的立場、观点、方法来研究共产主义社会的新情况新問題，当然又会提出一系列新的原理，馬克思主义的某些具体內容將来会煥然一新，然而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質是万古長青，永不凋謝的！

（4）“例外論”：

右派分子不仅污蔑說馬克思主义从时間上看已經过时了，而且还說馬克思主义从空間上看不适用于中国。天津資本家柴子正大放厥詞地說：“馬克思主义形成于一百年前欧洲資本主义發展的时代，适宜于德国、俄国，但是搬到中国来以后，很多地方对不上号；在中国只有大貧和小貧，并沒有資产阶級和無产阶級的区别。”

这种“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例外論”是早已被駁倒的陈詞濫調。远在十月革命后馬克思主义在中国傳播的初期，它就遇到資产阶級的猛烈反对。梁啓超可以算是馬克思主义“中国例外論”的鼻祖。1920年冬天，他在上海的“时事新报”和“改造”月刊上發表文章，一方面伪裝信仰社会主义，“确信此主义必須实行”，另一方面又說中国产業落后、工厂絕少，游民最多，并無無产阶級，因此不可能实現無产阶級革命，“社会主义不能实現于今日之中国”，在中国“無产可共”。他的主張“首先是对于資本家采矯正态度，先在劳資协調之状况之下徐圖健实的發展”（“飲冰室文集”，第十四册）。梁啓超的这种謬論不但在理論上早已被駁倒，而且在实踐上也已經被中国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事实所徹底粉碎。現在右派分子又企圖撿起这些殘磚碎瓦来击毁馬克思主义的銅牆鉄壁，这不是徒劳嗎？

馬克思主义虽然是产生于一百多年前的欧洲，但它又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眞理，因为消灭資本主义和实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乃是社会發展的客观規律。即使对于極少数未受資本主义侵蝕的落后地区，馬克思主义也是适用的，因为那里也存在着前資本主义的剝削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只有实現共产主义才能消灭一切形式的剝削制度并使生产力得到高度發展，使全人类得到解放。可見科学共产主义乃是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毫無例外的共同归宿。

說到中国，虽然过去因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束縛，資本主义發展較慢，發展水平也远比不上美、英等先进資本主义国家，但是劳資兩个阶級的对立难道不是鉄的事实嗎？柴子正之流借口自己不如資本主义国家的橡膠大王、汽車大王、煤油大王富裕，竟說他們与無产阶級之間仅是小貧与大貧之别，并無阶級对立。可是我們馬克思主义者知道，阶級的区别主要是以人們对于生产資料的占有及使用情况为标准，貧富程度不同并不能說明問題本質。穷乡僻壤的小地主不見得比大城市的熟練工人富裕，但是誰能否認前者是不劳而获的剝削者，而后者則是被剝削的劳动者呢？柴子正說：“中国民族資产阶級勤劳肯干，賺的多，花的少，而且在我們上升为剝削者之后，也不是坐享其成，而是操劳更重。”这种神話是經不起事实驗証的。誰都知道，資产阶級是不直接参加生产的，它的“勤劳”、“操劳”是指参加企業的經营管理与监督生产而言，这种“操劳”虽然对于發展生产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它更主要的目的是压迫、剝削工人，以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資产阶級的这种本性可以說是“天下烏鴉一般黑”，难道中国会有什么例外？要說中国有什么特点的話，那正是：民族資产阶級一般說来由于不如外国帝国主义在华企業資金多、設备好、技术新，因此为了在竞爭中求得自己的生存与發展，不得不“操劳更重”，不得不更殘酷地剝削工人。柴子正原屬的南洋橡膠厂的老工人就揭露了柴子正“操劳”的本質，那就是当工人上班的时候，他每天早晨起得很早，把工人挨个叫起来上班工作，白天他睡大覚，而当工人上夜班的时候，他在夜里又监督工人生产，工人每天最長的工作时間要达到十八个小时。不少进步的資本家在批判柴子正的时候，自己都承認：“我們勤劳肯干，精打細算，为的是追求利潤，越精打細算，对工人阶級的剝削越重。”当然中国的民族資产阶級也有它反帝爱国的另一面，再加上我国經济落后、阶級力量对比方面工人阶級居絕对优势等特点，因此我們党对資本主义經济才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現在这个政策已經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行業公私合营实現了，資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經基本上消灭了。右派分子現在重新又提出中国“例外論”，其目的就是全盤推翻中国共产党对

資本主义工商業和資产阶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一概否定八年来对資本主义工商業和資产阶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成績，而且也否定今后繼續进行改造的必要。既然馬克思主义在中国对不上号，既然中国沒有資产阶級和無产阶級的对立，那么就应該讓資产阶級恢复过去的剝削，就应該讓資本主义复辟。中国的資本主义万古千秋！中国的資产阶級万古長存！——这就是"例外論"的最后一言。

（5）"排他論"：

右派分子說：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百家中的一家，它具有絕对的排他性，不相容性，过去它是靠行政手段而占居領导地位，不許其它各家有發言权和生存权，今后既然是实行百家爭鳴就应該取消以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否則就会阻碍科学的發展。有的人虽然不敢公开反对以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但是拐弯抹角地說：不要过份强調馬克思主义的領导，否則就会使非馬克思主义者产生一种思想上的顧虑，从而原想大鳴的就变为小鳴，原想小鳴的則变为不鳴。还有的人說：应以馬克思列宁主义为爭鳴的武器，但不明定为指导标准。

首先应該指出：实行百家爭鳴的方針和以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絲毫不矛盾。百家爭鳴并不是要取消馬克思主义的領导地位，恰好是为了在新条件下，允許非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通过爭辯来駁倒各种非馬克思主义思想，从而更加强，更巩固馬克思主义的統治地位。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依靠行政手段来建立自己的領导地位，誰都知道，馬克思主义从誕生以来的一百多年中受尽了各国資产阶級和一切反动派各种行政手段的鞭笞，但是它終究冲破了重圍，广泛地傳播起来了，而且在十几个国家已經指导革命取得了胜利。馬克思主义在我国領导地位的确立，乃是中国共产党領导我国人民取得人民革命胜利的結果，也是今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事業胜利的根本保証。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这种無往不胜的威力，簡單些說就是因为它正确，它是科学眞理。在百家爭鳴中我們强調以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并不是排斥其他各家思想爭鳴，也不是不允許别人批評馬克思主义；反之，如果不以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那么百家爭鳴就会失去辨别是非、判定是非的标准，結果百家爭鳴就不会是为了探求眞理，为了更加强馬克思主义的領导地位，反而会造成各家互相攻击、众說紛紛、莫衷一是的局面。

其次应該說明：馬克思主义本身既是科学眞理而不是什么学术宗派，因此它是沒有排他性的。右派分子說馬克思主义是一种宗教教义，共产党就是教会，說我們把那些离开"教条"、稍持独立見解的人都当作"异教徒"来加以迫害。这是完全不合事实的詆毁。馬克思主义是一切科学眞理的最大的蓄水庫，任何理論观点只要它符合客观实际，那怕只有部分地符合客观实际，尽管它是出自非馬克思主义者，它都要批判地兼容并包。正因为馬克思主义具有这个特性，所以它能够集世界一切优秀文化之大成。这里不妨举几个实例。前曾提到，馬克思主义的产生就是批判地吸取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經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說中的精华的結果。再看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的事吧。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并不是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的科学成就是馬克思、恩格斯所十分重視的。馬克思的密友威廉·李卜克內西在"馬克思回忆录"中告訴我們："当达尔文的研究得到結論并把它們公布了的时候，有好几个月我們除了談論达尔文和他在科学上的成就是革命的力量而外，便什么都不談了。"（"論馬恩列斯"，解放社版，第36頁。）后来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曾引用达尔文的原理来說明生产工具的形成与發展，恩格斯曾引用达尔文的原理来說明"劳动在从猿到人轉变过程中的作用"。美国人种学家摩尔根也不是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多年研究印第安人生活的成果也是馬克思、恩格斯所十分重視的。馬克思曾認眞研究了1878年出版的摩尔根的主要著作"古代社会"，并且作了摘要。后来恩格斯还根据摩尔根的發見科学地說明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至于对于一切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东西，馬克思主义当然具有排他性。馬克思主义与資产阶級思想体系是势不兩立的，兩者不能和平共处。对于那些披着馬克思主义外衣的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馬克思主义也要坚决排斥之。右派分子說，馬克思主义的这种排他性不是出于科学良心，而是出于狹隘的阶級仇恨。这完全是誹謗。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阶級性是統一而不可分割的。一方面馬克思主义是無产阶級利益的科学表現，是無产阶級和全体劳动人民爭取解放的科学武器，另一方面也只有大公無私的無产阶級才能毫無偏見地正視現实、不歪曲現实，从而發見并自覚地掌握世界發展的客观規律。只有剝削阶級和資产阶級右派分子，由于利欲熏心、利令智昏，才有意歪曲現实，从而不可能認識科学眞理。

借口馬克思主义具有排他性、不相容性，妄圖取消馬克思主义的領导地位；要馬克思主义对資产阶級思想讓出陣地，以便資产阶級思想到处氾濫，从而根本瓦解社会主义——这就是"排他論"者的眞正目的。

（6）"停滯論"：

有的資产阶級学者硬說：自从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六十二年来馬克思主义停滯不前，列宁、斯大林仅仅在个别問題上有新的提法。換句話說，馬克思主义还停留在1895年的地方。

这种观点包含着对馬克思、恩格斯学說本身以及对恩格斯逝世后六十二年来实踐与理論發展史这兩方面的曲解。

先看馬克思、恩格斯学說本身。我們認为，馬克思、恩格斯学說虽然是最徹底最严整的科学体系，但是我們深信，"它只是为一个科学奠定了基础"（列宁），它仅仅給我們提供了一般的指导原理，即观察問題、解决問題鑰匙——立場、观点、方法，它本身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藥方彙集。因此它要求我們不断以新的实踐經驗来丰富、推进这个科学，要求我們在运用它的原理时要尽量結合各个时期各个国家的具体特点。馬克思、恩格斯学說的这种特質决定了它是不会固步自封、停滯不前的。当然，在我們革命队伍中也有一些不可救藥的糊塗虫——教条主义者，他們把馬克思主义看成是包治百病的万应灵丹，是一切現成答案的彙集，他們不会也不去独立地思考并运用馬克思主义，"安然地躺在火炕上来咀嚼現成答案"（斯大林），这种躺在馬克思主义立場上而不是站在馬克思主义立場上的人，我們是嗤之以鼻的。

卡尔·格倫在他的一本名为"法国和比利时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漫談集里說了一段很值得我們深思的例子。他說，傅利叶的門徒除少数例外，都是一般只知道盲目背誦傅利叶的文句，不能使他的学理有任何进展。卡尔·格倫認为这是由于："傅利叶把世界呈現在一个完备的体系里，这体系的一切細节都精細地完成了。"应該說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空想社会主义由于它已經空想地描繪了一切細节，沒有什么可补充的了，因此它必然是停滯不前；而科学社会主义由于它只是科学地規定了基本道路，需要人們繼續不断地开拓，因此它必然前途似錦。这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之点。"停滯論"者大概是沒有思索过这一点的。

再从六十二年来实踐与理論的历史来看馬克思主义是否停滯不前。

（1）从实踐的發展历史看，六十二年来馬克思主义已經不仅是書本上的眞理，而且变成为生活的現实，它指导革命实踐取得了巨大的胜利。1895年的时候，馬克思主义的傳播和工人阶級政党的組織主要仅限于欧洲与北美洲，而且当时的党还是旧型的社会民主党，党員总数不过几百万人，当时世界上还沒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資本主义正向帝国主义过渡，殖民地接近于被瓜分完畢，資本主义世界体系成为囊括世界各个角落的蜘蛛網建立起来。六十二年来世界上最主要的变化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各国共产党的建立与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欧亞兩洲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中国革命的胜利等等。今天呢，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組織已經伸展到世界上各个洲各个国家，共产党員已經有三千多万人，特别重要的是世界上已經有了十三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經有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資本主义世界已經失去了广大地盤，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已經大部分土崩瓦解。社会主义运动所創造、积累的許多新的实踐經驗都是馬克思主义向前飞躍發展的表征。

（2）从理論的發展历史看，新时代的許多新的革命經驗在各国共产党領袖的著作和党的文献中都作出了科学的总結，从而在各个方面發展了馬克思主义，使馬克思主义躍进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众所周知，列宁划时代地全面地發展了馬克思主义理論，列宁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和無产阶級革命时代的馬克思主义。說列宁仅仅在个别問題上对馬克思主义有發展，这若不是無知就是别有用心。在哲学方面，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哲学笔記"等著作中批判了民粹主义、馬赫主义、各种形式的修正主义，創造性地發展了关于历史發展中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相互关系的原理，关于从資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規律，关于認識論的根本原理，关于唯物辯証法的基本特征，关于辯証法、邏輯学和認識論的相互关系的原理，总結了恩格斯逝世后自然科学的新成就，深刻地發揮了关于哲学的党性原則。在政治經济学方面，列宁在"俄国資本主义的發展"、"帝国主义論"以及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許多著作中进一步發展了关于資本主义經济的諸基本原理，創造性地貢献了关于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最高阶段的理論，关于社会主义經济改造和經济建設的理論。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列宁在"做什么？""进一步，退兩步""兩个策略""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叛徒考茨基"等著作中創造性發展了关于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結合的原理，关于無产阶級在革命中領导权以及革命轉变的原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一国胜利以及世界革命發展道路的原理，关于無产阶級專政的苏維埃形式以及無产阶級專政是最高类型民主的原理，关于社会主义建設的原理，关于战略与策略的原理，关于工农联盟的原理，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的原理，关于党的原理等等。此外，列宁在历史学、軍事学、文艺理論等許多方面的貢献也是非常巨大的。

斯大林同志在發展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方面的成就，毛澤东同志在"最偉大的友誼"中曾作了簡明的

概括。"斯大林同志創造性地發展了列宁关于資本主义發展不平衡規律的理論和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內首先胜利的理論；斯大林同志創造性地貢献了关于資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理論，貢献了关于在苏联建設共产主义的理論，貢献了关于現代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經济法則的理論，貢献了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論。斯大林同志还創造性地發展了列宁关于党的建設的理論。"

毛澤东同志結合中国革命实际对于發展馬克思主义也作出了杰出的貢献。这主要的就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原理，关于革命根据地的原理，关于革命战争的原理，关于無产阶級領导权的原理，关于解放农民的原理，关于革命統一战綫的原理，关于革命轉变的原理，关于人民民主專政的原理，关于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設的原理，关于發展文化的原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原理，关于党的建設的原理等等。毛澤东同志的"实踐論"、"矛盾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著作对于發展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作出了創造性的貢献。至于党中央發表的"論無产阶級專政的历史經驗"和"再論無产阶級專政的历史經驗"这兩篇論文对于發展馬克思主义的意义更是举世公認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有許多杰出的人物，对于發展馬克思主义理論都作出了有益的貢献，这里就不一一列述了。

总之，六十二年来不論从实踐上和理論上說，馬克思主义都有了巨大的發展。說馬克思主义基本上还停留在1895年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停滯論"者的手法和实質就是标榜馬克思、恩格斯，而一笔抹煞列宁、斯大林、毛澤东等等对于馬克思主义的貢献，把六十二年来的历史归結为教条主义的統治，从而否認以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我們的指导思想。

（7）"变質論"：

另一种标榜馬克思恩格斯来反对馬克思主义的更恶毒的右派謬論就是"变質論"。右派分子說："1895年以后，馬克思主义按照鉄的必然性轉化为自身的反面，与此相适应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相互滲透的修正主义与教条主义六十二年的絕对統治。"这就是說，恩格斯逝世后，馬克思主义不仅停滯不前，甚至已經蛻化变質。

究竟什么是馬克思主义变質的"鉄的必然性"呢？右派分子說，因为"二十世紀初自由竞爭的資本主义轉化为自身的反面，走上壟断阶段"，因此馬克思主义也必然轉化为自身的反面，变为修正主义与教条主义。这是什么邏輯啊？簡直胡扯。首先，資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根本就不是变为自身的反面，难道帝国主义已經不是資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了嗎？难道壟断已經完全消灭竞爭了嗎？沒有的事。帝国主义不过是資本主义的最高亦即最后阶段，不过是寄生、腐朽、垂死的資本主义罢了；壟断不过是使竞爭具有更加尖銳、更加剧烈的形式，具有更大的破坏性和掠夺性罢了。其次，馬克思主义根本不是維护資本主义經济基础的意識形态，而是反資本主义的無产阶級的思想体系，它怎么可能簡單地随着資本主义經济的發展而变質呢？到帝国主义时代，無产阶級革命的客观条件更成熟了，主观力量更强大了，实踐經驗更丰富了，这样作为反映無产阶級利益的馬克思主义只能必然地朝着自身的正面向前躍进，怎么可能朝着自身的反面轉化呢？右派分子居然敢公开地向邏輯挑战。

不可否認，六十二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确出現了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然而这六十二年来总的情况是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兩个思潮的斗爭，斗爭的趋势是列宁主义日益取得了胜利。右派分子故意否認列宁主义的产生、發展和胜利，把六十二年来的历史描繪为只是修正主义与教条主义互相滲透統治的局面，这完全是顚倒是非。

恩格斯逝世后不久，以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很快就發展成为普遍的国际現象，它并且利用第二国际組織篡夺了国际工人运动的領导权。修正主义的抬头并不是馬克思主义自身發展的結果，而是資产阶級思想滲透入工人运动的产物。具体地說就是：（1）随着資本主义轉化为帝国主义，很多国家普遍出現了工人貴族阶層，即資产阶級化的工人；（2）当时是資本主义比較和平發展的年代，資产阶級乘机改变了統治工人的策略，即由暴力鎮压轉变为偏重于实行某些改良、讓步，这种策略上的变化也使某些工人受到迷惑，对資本主义制度产生幻想；（3）随着馬克思主义的胜利，資产阶級的代理人不得不采取披着馬克思主义外衣来修改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的手法；（4）工人阶級队伍中滲入了許多破产的小資产阶級，他們是傳播修正主义的温床。还要指出：当时修正主义的特点和手法之一，就是死抓住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原理、个别詞句，把它当作教条，加以曲解，并且动輒借口于这些教条来对抗列宁对于馬克思主义的創造性發展。第二国际最著名的几个教条就是：無产阶級如果在全国人口中不占多数便不能也不該夺取政权；工業生产力如果沒有得到高度的發展便不能夺取政权；無产阶級如果还沒有足数的能够管理国家的文化干部和行政干部便不能夺取政权；無产阶級不可采用政治总罢工和武装起义的办法；社会主义不可能首先在一个国家胜利等等。第二国际的

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給国际工人阶級帶来很深的毒害和很大的灾难，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分裂了工人阶級和工人运动，为虎作倀，帮助帝国主义分化、鎮压各国的工人运动，使各国工人兄弟互相殘杀。

当第二国际背弃馬克思、恩格斯学說的修正主义抬头的时候，另一支繼承又發展馬克思主义的强有力的思潮也同时蓬勃兴起了，这就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对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經过長期的迂迴曲折的斗爭，終于取得了胜利，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列宁主义胜利和修正主义破产的明証。十月革命后，修正主义者便徹底暴露了他們公开反对無产阶級專政的眞面目，并且进一步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十月革命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轉折点，从此結束了恩格斯逝世后修正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占統治地位的旧时代，同时开辟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党占統治地位的新时代。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的四十年，国际工人运动中思想斗爭的主流仍然是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即社会民主主义的斗爭。到今天，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与發展，各国共产党力量的壯大以及社会党的衰落与分化等等現象，可以看出列宁主义已經取得了更大的胜利，而社会民主主义已經日益丧失其欺騙作用。

不可否認，四十年来在列宁主义者的队伍中也有一些人犯过教条主义的錯誤。例如二十年代初期欧洲一些新建立的年輕的共产党犯过左傾幼稚病的錯誤，1931年至1934年中国的一些共产党人犯过严重的机械硬搬苏联革命經驗的錯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一些人民民主国家的兄弟党也犯过一些机械硬搬苏联建設經驗的錯誤，斯大林同志在后期也犯了一些教条主义的錯誤。但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的趋势来看，恩格斯逝世后教条主义决不是主流，正确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才是主流。实踐是理論最好的試金石，在中国革命史上，教条主义仅仅在1931年至1934年这短短的四年占上風，就使得中国革命遭受到那样慘重的損失，如果六十二年来是教条主义占上風的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怎么可能取得今天这样巨大的胜利？这难道不是連瞎子都可以辨明的事实嗎？

今后我們还要繼續进行反对教条主义，尤其是反对修正主义的斗爭，但是我們决不允許右派分子任意污蔑馬克思列宁主义变質。

* * *

右派分子歪曲、誹謗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种主要謬論已經被我們一一揭穿了。他們千方百計、挖空心思地攻击馬克思列宁主义，主要目的在于取消馬列主义作为我們的指导思想。敌人也知道，馬列主义是指导我們党、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事業的灵魂，取消了馬列主义当然也就沒有了社会主义，因此他們采取"挖心战"。但是，我們要警告右派分子：馬列主义已經在我国人民心灵和社会生活中扎下了根，并且已經茁長、开花、結果，我国广大人民的政治覚悟已經提高，你們的陰謀已經被識破，你們的詭計决达不到目的，"蚍蜉撼大树"，那是徹头徹尾的幻想，你們还是赶快投降吧！

从事物的兩面性看右派分子对辯証法的歪曲

黄枬森

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右派分子对党、对社会主义的进攻的特点之一就是修正主义。他們不是直接地公开地否認社会主义和宣揚資本主义，而是对社会主义进行歪曲的理解，来达到他們实际否認社会主义的目的，其中包括对馬克思主义基本理論的别有居心的窜改。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报告中曾經談到了乱子的二重性問題。事物的二重性，又称事物的兩面性，即事物的矛盾性，本来是馬克思主义辯証法的核心問題，是一个極其深刻但也極其平易和明确的原理。右派分子对它發生了極大"兴趣"，他們把事物的二重性原理任意曲解，以便論証他們各种反动观点。他們自以为"辯証"得很，馬克思主义反而是形而上学，其实他們是很不辯証的，他們所吹噓的"辯証法"不过是折衷主义和詭辯論的伪装。他們并非眞正承認事物的二重性，他們眞正發生兴趣的乃是事物的一重性、一面性，当然是他們喜欢的那一面。

究竟什么是事物的二重性？右派分子对事物的二重性原理进行了一些什么样的歪曲？弄清楚这些問題，对于捍衛馬克思主义辯証法和批判右派分子的謬論是有意义的。

一　一切具体事物都有兩面性

任何事物、任何現象都有二重性或兩面性：有正面，也有反面；有肯定的一面，也有否定的一面。正因为正面中有反面，肯定中有否定，所以才有变化：在一定条件下正面向反面轉化，肯定向否定轉化。事物、現象的兩面性就是事物、現象的矛盾性，就是矛盾双方的互相滲透。

生物体中如不包含着死的因素，生物体就不会死；死的物質中如不包含着生的因素，死的物質就不会变为生物。好事中如不包含着坏的因素，好事就不会变成坏事；坏事中如不包含好的因素，坏事就不会变为好事。禍中有福，福中有禍，所以禍与福可以相互轉化。

匈牙利事件是坏事，但匈牙利事件是从事件前的胜利局势轉化来的，好事在一定条件下之所以会轉化成为坏事，是因为在胜利局势中就有着坏的因素：工作上的錯誤、官僚主义、驕傲自滿等等。匈牙利事件后来又轉化成为好事，党的領导水平提高了，人民的觉悟提高了，無产阶級專政巩固了，坏事在一定条件下之所以会轉化成为好事，是因为在匈牙利事件中就有着好的因素：錯誤暴露出来了，反革命分子的眞面目暴露出来了，党組織得到了煅煉和进一步純潔起来了等等。

有些人觉得这个原理难于理解。好事就是好事，好事中怎样会包含坏的因素呢？这是不难理解的，关鍵就在于你是抽象地还是具体地考察問題。

抽象地說，按照定义来說，好事当然是完全排斥坏事的，但是絕对排斥坏事的好事只是一种抽象的結果，只是存在于头腦中的东西，至于实际存在的具体的事物总不是那末純粹的、那末理想的、那末典型的。具体事物总是复杂的，总是多样性的統一，对立面的統一。好事仅仅是好事，而不包含坏的因素，坏事仅仅是坏事，而不包含好的因素，这是抽象的同一性；而辯証法所發現的同一性乃是具体的同一性，即同一中有差别、有矛盾，正面中有反面，肯定中有否定。从具体的观点看来，不仅好事与坏事的相互滲透，一切对立面的相互滲透，如好人与坏人、善行与惡行、成功与失敗、順境与逆境、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辯証法与形而上学的相互滲透，都是易于理解的。

二　在事物的兩面性中，有一面是主要的，因而对立事物之間有相对的界限

从上面的論述，可以看出，辯証法否認有純粹又純粹的东西，坚持任何事物都包含着它的反面、否定的一面，因而否認对立事物之間有絕对的界限。但是，辯証法并不否認就某一事物来說，对立兩面中有一面是根本的、主要的，因而并不否認对立事物之間有相对的界限。上面我們曾談到，如果抽象的看問題，就很难理解对立面的相互滲透，但是我們并不完全反对抽象地看事物，而只是反对完全抽象地看事物。科学的抽象就是把非主要的方面暫时撇开，抓住主要方面，这当然是不够的，但为了对事物获得一个确定的認識、掌握对立事物之間的相对的然而明确的界限，是完全必要的。右派分子的詭辯論歪曲这个原理的手法之一就是否認在事物的兩面性中区别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否認对立事物之間的相对界限，以便于他們顚倒是非，混淆黑白。

請注意毛主席的說法："匈牙利事件不是好事，这是大家清楚的。"这就是說，匈牙利事件是坏事。不过这件坏事中也包含着好的一方面，所以說它也有二重性。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在各种建設中的成就是好事，不是坏事，但其中也包含着坏的因素，如一些缺点、錯誤及某些不良傾向的滋長等。匈牙利事件是坏中有好，而不是又好又坏，或好中有坏；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好中有坏，而不是又好又坏，或坏中有好。事物的兩面性原理，是要我們从正面中看出反面、从肯定的方面中看出否定的方面，而不是叫我們把正面与反面、肯定与否定等量齐观。正面、肯定的方面总是事物主要方面，它决定事物的根本性質，并使对立事物之間有着明确的界限。

如果一件事件既是好事，也是坏事；生即是死，死即是生；"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眞即是假，假即是眞；是即是非，非即是是；唯物主义即是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即是唯物主义；辯証法即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即是辯証法；……这样，世界在我們眼前將变得混沌一团，黑白不分，而我們也就达到一种恍恍惚惚、昏昏沈沈的精神境界了。这决不是辯証法，这是詭辯，是对辯証法的玩弄、歪曲，是唯心主义。

当然，右派分子的兴趣并不仅在于玩弄辯証法，而是在于愚弄人民。他們企圖利用事物有兩面性的原理来証明匈牙利事件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一切鬧事都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他們的"邏輯"是这样的：既然匈牙利事件也有好的一面，所以它就是好事，所以它就不是坏事；既然鬧事也有好的一面，所以它就是好事，所以它就不是坏事。所以匈牙利事件是应該發生的，鬧事是应該提倡的，鬧得越大越好。他們把鬧事也有好的一面夸大成为鬧事就是好事，对于这种荒謬的"邏輯"，辯証法是不会負什么責任的。

他們更企圖利用这个原理来証明馬克思主义的指导、共产党的領导、人民民主專政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是坏事而不是好事。某些馬克思主义者中間滋長了教条主义，某些共产党員身上滋長了宗派主义，某些国家領导人員身上滋長了官僚主义，这是事实，这是旧制度对新制度的滲透，是坏对好的滲透，是新中有旧，好中有坏。这些旧的、坏的因素，是可以逐漸克服和消灭的。但是，他們的"邏輯"不是这样，他們認为：既然馬克思主义者中間出現了教条主义，所以馬克思主义就是教条主义，所以馬克思主义是坏的；既然共产党員中間出現了宗派主义，所以共产党就是一个狹隘利益的宗派，所以共产党的領导是坏的；既然我国国家机構中出現了官僚主义，所以我国国家机構就是一个官僚机構，所以我国国家机構就是坏的。他們就是利用这种荒謬的"邏輯"完全否定我国革命胜利以来的偉大成就，把我国情况說成"一团糟"。显然，这是一种徹头徹尾的詭辯，与辯証法是沒有什么关系的。

三　事物都有兩面性　但具有怎样的兩面性要具体分析

同任何普遍的原理一样，事物的兩面性原理不是証明的工具，而只是我們研究具体事物时的思想指导。它只告訴我們事物都具有兩面性，但事物具有怎样的兩面性，它却沒有涉及，而需要对事物作具体的分析。但是右派分子却認为一切事物的兩面性都是相同的，这是另一种詭辯。他們說，既然一切事物都有兩面性，既然中国民族資产阶級有兩面性，难道工人阶級就沒有兩面性？既然工人阶級也有兩面性，那末，工人阶級和資产阶級还有什么本質的区别呢？沒有了，中国工人阶級和資产阶級融合起来了。这是对于辯証法的一种極为惡劣的玩弄。

有些好心腸的同志不承認在工人阶級的队伍中有任何兩面性，我認为不必。中国工人阶級是从旧社会中产生出来的，不可能不受小資产阶級、資产阶級甚至封建地主阶級的若干影响，我国工人中的非工人阶級思想影响以及在这些思想影响下所發生的一些行为就是我国工人阶級的队伍中的否定、消極的一面。不承認工人阶級的队伍中的兩面性是不現实的。

但是，难道中国民族資产阶級的兩面性也是这样的嗎？不，决不是这样。不仅如此，中国民族資产阶級的兩面性在中国历史發展的各个时期也是不相同的。不作具体分析，就会导出各种荒謬的結論。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全行業公私合营以后的三个时期中，資产阶級都有兩面性，但其內容都是不同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資产阶級的兩面性，說得簡單明了一点，就是革命性和反革命性，就是动搖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間。难道在那个时期，工人阶級也有这种兩面性么？难道工人阶級是动搖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間而不是最坚决、最徹底的革命阶級么？决不是的，这是任何稍具常識和理智的人都能回答的。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資产阶級的兩面性就是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抵抗社会主义改造，这个兩面性与前一个兩面性显然是不同的，这已不是是否贊同新民主主义革命問題，而是是否贊同社会主义革命問題，在"五反"前抵抗一面是主要的，在"五反"后接受一面就成为主要的了。难道工人阶級有这种兩面性么？难道工人阶級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領导力量、核心力量么？这些問題，只要是不存心歪曲历史事实的人都能回答的。

至于在全行業公私合营之后，資产阶級的兩面性

又有了变化，这时的兩面性是劳动者和剝削者。有的人不承認現在資产阶級还有兩面性（一方面根据辯証法强調工人阶級队伍中的兩面性，另一方面又不惜違反辯証法而否認資产阶級的兩面性，这是很滑稽的）。事实畢竟是事实，資产阶級只要一天还憑其資本来获得利潤，就一天摆脫不了剝削者的身份。难道工人阶級也有剝削者的身份？难道工人阶級的被剝削者的身份不是还沒有完全摆脫么？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非常容易弄清楚的。

中国民族資产阶級是有兩面性的，兩面性的內容也在不断地变化。但是，不管是在那一个时期，資产阶級的兩面性，同工人阶級队伍中的兩面性都是不能混同的。由于資产阶級和工人阶級队伍中都有兩面性并从而得出結論，認为資产阶級和工人阶級沒有本質的区别，是沒有任何根据的。

四　事物向对立面的轉化是有条件的

由于肯定中有否定、正面中有反面，所以事物才能向否定一面、反面轉化，但是轉化不是沒有条件的。匈牙利事件是在一定条件下才轉化为好事的，它并非沒有坏下去的可能。这一点很重要，毛主席在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报告中一再强調这点。什么条件呢？得具体分析，一般說来，就是足以引起質的变化的量的变化，就是足以使非主要的方面能够成为主要方面的量的变化，否則事物就不会向对立面轉化。不管条件而侈談轉化，这是另一种詭辯論的表現。

我們从来沒有說过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員不可能轉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只要某些馬克思主义者中間还存在着馬克思主义的反面——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只要某些共产党員中間还存在着共产党的反面——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那末，它們就有可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轉化，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員并未修成万劫不毁的金身，除了宇宙本身而外，辯証法不承認有任何具体事物是万劫不毁的。恩格斯逝世之后，国际工人运动就曾一度为机会主义所統治，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蛻化成为了机会主义的政党。右派分子就在这里作文章了。他們認为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必然会轉化成为自己的对立面，而且在目前中国似乎已經轉化了。有的右派分子說，自从恩格斯逝世之后，馬克思主义就轉化成为自己的对立面——教条主义（在苏联和中国以及各人民民主国家）和修正主义，現在才在开始向馬克思复归。这完全是捏造。实踐是最好的見証。半世紀来，包括苏联和中国在內的偉大革命胜利，正是創造性的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不是教条主义的胜利，教条主义是决不能获得这种胜利的（如果竟然有某种“教条主义”能获得这样偉大的胜利，我看这种“教条主义”并沒有什么不好）。我們并不否認在苏联和中国曾經出現过教条主义，有时还非常严重，但是就整个历史阶段来說，教条主义并不曾达到使馬克思主义从量变向質变轉化的程度。

有的右派分子說，中国共产党已經从革命的党轉化成为保守的党，前进的党轉化成为落后的党了。当然，这正是某些人所梦寐以求的事。但是事实畢竟是事实。共产党領导全国人民剛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就紧接着領导全国人民来实現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在1955年至1956年基本完成了，但并未最后完成，共产党正領导着全国人民繼續着未完成的革命事業，这种事業难道是保守落后的党的事業嗎？党中央發动了整風运动，要把党內已經有所滋長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克服下来，于是有些人就借此机会大叫：共产党已經轉化为自己的对立面了，已經变質了。但是恰恰就是整風运动这件事情本身，就足以証明右派分子的叫囂完全是無中生有。事情很清楚，如果共产党已經变化成一个官僚主义的宗派集团，它就不会發动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整風运动。

那末，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將来是否会向自己的对立面轉化呢？如果这就是指的工人阶級的馬克思主义在共产主义社会必然轉化为屬于全民的馬克思主义，共产党会最后归于消灭，那当然是一定的。如果这是指的馬克思主义轉化为教条主义或修正主义，共产党轉化为保守的落后的党，我們說这是不会的。为什么不会？因为共产党有着植根于工人阶級的阶級本性、植根于社会主义經济制度的批評与自我批評，共产党有整風。由于小私有者和剝削者的思想对共产党員的侵襲，某些党員，甚至个别組織的蛻化变質，是很难避免的。但党內經常的批評与自我批評，党的整風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会使有錯誤思想的人得到批評、改正錯誤，有錯誤行为的人也得到批評、糾正錯誤，違法乱紀的人受到应受的处分，而蛻化变質的人則被淸洗。这样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就不会变質，剝削制度就不会复辟。党并沒有什么一劳永逸的办法来保护自己純潔的肌体，它只有一个办法，即天天洗臉，这个办法并不出奇，然而最为踏实有效。共产党能够实行这个办法，并不是由于共产党人天生聰明，而是由于工人阶級这样的阶級和社会主义这样的經济制度需要这样的党，需要能够不断克服自己錯誤和缺点、永远前进的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

由此可見，那些日夜祈禱共产党蛻化变質以至于失敗和天下大乱的人是徒劳的，是沒有什么望头的。

*　　*　　*

以上就是右派分子打着辯証法的招牌来反对辯証法的一些情况，但右派分子所实际使用的不是辯証法而是詭辯論。

詭辯論把自己裝扮得非常辯証的样子，似乎比辯証法更“辯証一些”。事实上，詭辯論是对辯証法的任意玩弄和歪曲，是徹底反辯証法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的。只是由于右派分子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反对社会主义，詭辯論才成了他們的方便的工具。你不是喜欢辯証法嗎？那好，我就給你“辯証”得黑白不分、眞假莫辨、是非不明。——这就是右派分子的居心，他們对于眞正的辯証法、馬克思主义的辯証法其实是仇恨的，也是無知的。

这些詭辯对于久經煅煉的共产党員說来当然是不值一笑，但对于一些斗爭煅煉較少的同志，未必不能起一些迷惑作用。为了徹底击潰右派分子的进攻，也为正确宣傳辯証法，应該对右派分子的思想武器——詭辯論迎头痛击。

試論長期共存、互相监督

——学習"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笔記

沙　英

关于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無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問題，应当怎样理解和怎样处理呢？这不仅是一个社会主义建設的实踐中所面临的問題，而且也是在理論上需要加以探討的問題。特别是目前資产阶級右派分子極力歪曲和破坏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这个問題更值得我們的重視。

我国的人民民主統一战綫，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而又包括一切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在內的广泛的联盟。那末，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以后，在統一战綫中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我觉得这就如同任何客观存在的事物一样，乃是一种矛盾的統一体，即有統一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我們不論忽略其中的任何一面，都不免陷于片面性，找不到正确的处理方法。首先，这种統一的方面表現在：現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經基本上建立起来了，生产資料的公有制已占統治地位，生产关系已是不受剝削的人們的友誼合作和互助的关系，人民民主專政（实質上是無产阶級專政）已日益巩固，基本上消灭了人剝削人、人压迫人的現象，大規模的阶級斗爭基本上結束了，人与人之間是一种眞正的自由平等的关系。这就决定了社会中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之間、个人与集体之間、政府和人民之間等等的关系，从根本上說来利益都是一致的，沒有什么不可調和的矛盾。大家对于国民經济的發展，对于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对于社会主义的建設，都具有共同的关怀。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代表一部分人民利益的民主党派、無党派的民主人士，和代表工人阶級和全体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从根本上說来利益也是一致的。各民主党派和無党派的民主人士早就公开表示，他們拥护我們国家的宪法，贊成我們党的总路綫，接受社会主义的綱領，願意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是說大家的政治方向和奋斗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实現一种共同的偉大的理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爭的。这样，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間就存在着共同的政治基础，这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設的根本利益。从解放以后几年来的革命实踐来看，各民主党派和無党派民主人士，一般地說，对于几大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事業不但是贊成的，而且也有所貢献。

其次，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無党派民主人士之間也是有矛盾的，这种矛盾表現在：第一，現在阶級关系虽已發生了根本的变化，大規模的阶級斗爭已基本結束了，但这并不是說阶級已不存在了，阶級斗爭已經沒有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級斗爭还会繼續着，有时这个斗爭还会采取很尖銳的形式。例如現在民族資产阶級还是拿定息的，还存在着兩面性，从阶級利益上看，它和工人阶級还是有矛盾的，有斗爭的。当然，我国目前工人阶級同資产阶級的矛盾是屬于人民內部的矛盾，工人阶級和資产阶級的阶級斗爭一般地是屬于人民內部的阶級斗爭。（只是在处理不当的时候，或者民族資产阶級不願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工人阶級和資产阶級的矛盾才会变成敌我之間的矛盾。）不用說，工人阶級同資产阶級的矛盾和阶級斗爭，不会不反映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今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的社論"文匯报的資产阶級方向应当批判"中指出："民盟在百家爭鳴过程和整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惡劣。有組織、有計划、有綱領、有路綫，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兩个党在这次惊濤駭浪中特别突出。風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别的党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惡劣。但人数較少，系統性不明显。"这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第二，就是到了社会主义建成之后，阶級关系徹底改变了，大家都变成了劳动人民，沒有剝削現象了，但是由于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的社会地位和分工不同，所以对各种問題的看法也有不同，特别是由于思想意識的变化总是落后于人們的社会地位，因此，民主党派和無党派民主人士所代表的一部分人民的資产阶級思想会拖得很長，生活作風和工作方法等，和工人农民还是有不同的，他們观察問題、認識問題的观点和方法，对人对事的态度，和工人阶級的观点和方法是不同的，这就自然要發生思想上的矛盾和斗爭。工人阶級和資产阶級的思想斗爭还会長期存在。第三，由于主观和客观的矛盾存在，人們的主观認識总不能百分之百的符合于客观情况，因此在确定政策和日常工作中，个别的局部的暫时的錯誤总是难免的。特别是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在处理这种关系的时候，在合作共事的过程中，总难免要發生一些矛盾。党与民主党派之間可能發生矛盾的原因和表現形式是很多的，这里

只是概括地提出几点。

一般地說，党与民主党派之間的矛盾的性質，是人民內部的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但是我們也要正視这种矛盾，并且要对它加以具体分析和正确的处理。如果处理得好，使党与民主党派之間的关系处于一种协調的、健康的狀态，就能加强人民內部的团結，就能調动一切积極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推动我們的工作向前發展。否則，如果我們不正視这种矛盾，对这种矛盾处理的不好，那就会使这种矛盾扩大和加深，不仅不能調动一切积極因素，反而会把积極因素变为消極因素，这就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設，不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業。

那末，党与民主党派之間的矛盾应如何处理呢？如果按照头腦簡單的人或者宗派主义者的眼光看来，为了省得一些麻煩，最好是用压服的办法，或者干脆取消民主党派。当然，我們党是沒有采取宗派主义者的办法，而是采取"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来处理党与民主党派之間的关系。

資产阶級右派分子是反对"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这种方針的。他們不仅千方百計地歪曲这种方針，企圖把民主党派引向資产阶級的政治方向，要把民主党派变成共产党的对手和敌手；而且企圖煽动民主党派篡夺共产党的領导地位，推翻党与民主党派長期共存的政治基础——社会主义。資产阶級右派，"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識分子、資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風浪中表現出来了。他們人数極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别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輕視。"（人民日报七月一日社論"文匯报的資产阶級方向应当批判"）

二　我們为什么采取"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而不能采取压服和取消的办法呢？

大家都知道，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得到解决。这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須严格遵守的一个原則。党与民主党派的矛盾的性質既然是人民內部的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那就不能用專政的办法、用压制的办法去解决，例如剝夺选举权，不給發言权，不准結社、出版、集会，有的还要抓起来坐牢等等，这都是屬于專政范圍的办法，我們不能用这些办法去解决党与民主党派的矛盾。对于人民內部的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用"团結——批評——团結"这个公式来解决。只能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这个方針就是"团結——批評——团結"这个公式的具体应用，是在政治范圍內調节人民內部矛盾的一种妥善办法。

我們党采取"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这种方針的根据和目的是：第一，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有長期合作的历史。大家都知道，民主党派大多都是在抗日战爭时期或第三次国內革命战爭时期产生的，它們和共产党結成了統一战綫，它們在党的領导或党的影响下，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参加了反帝、反封建和反官僚資本的斗爭。

第二，它們不仅参加了民主革命，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在党的領导和帮助之下，表示贊成社会主义革命，采取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綫。几年来，它們对于它們所联系的阶級和阶層起了一定的团結、教育和改造的作用，并且督促和帮助它們的成員和他們所联系的群众，为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改造事業作了一些貢献。今后还需要它們繼續进行这种工作。就是在將来社会主义改造徹底完成，这些阶級和阶層变成劳动人民之后，因为这一部分人民的資产阶級思想会拖得很長，还会和其他劳动人民有不同的利益和要求，除了我們党直接对它們进行联系和教育之外，如果通过民主党派对它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对于推进社会主义事業的發展是有利的。只要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不断地进步，他們不仅在建設社会主义时期能發揮作用，就是在將来建設共产主义的时期也將繼續發揮作用。总之，"广大人民所希望于各民主党派的就是堅定地站在社会主义立場上，注意进行思想改造，以充分發揮他們在国家生活中的积極作用。"（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議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第三，長期的多党合作，是我国人民民主專政的特点之一。我国的經驗証明了，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長期共存的过程中，能够起互相帮助和互相监督的作用，有利于人民民主專政的巩固和加强。互相监督就是互相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意思，絕不能把互相监督理解为"分庭抗礼"和"各有千秋"。互相监督从性質上講是政治上的监督，而不是生活上的监督。互相监督的目的是为了分清人民內部的是非，加强政治思想上的团結，避免和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錯誤。上边說过，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間既有統一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既有相同的意見，也有不同的意見；大前提是搞社会主义，这是沒有問題的，但在具体問題上大家是有出入的。因此，如果相互之間进行批評与斗爭，善于听取兩种意見，那就容易辨别是非，分清好坏，也就能調节矛盾，加强团結，并保証互相的进步。凡是主張極端化片面性的人，就会思想硬化，工作停滯，阻碍事業的前进。刘少奇同志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說道："我們的

党是一个不为私利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但是我們現在还有缺点，將来也一定还有缺点，并且不可能沒有錯誤。我們当然首先要加强党內的自我批評和依靠广大劳动人民的监督来消除这些缺点和錯誤；同时，我們也应当善于从各民主党派和無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和批評中得到帮助。"只有我們从劳动人民和民主党派、無党派民主人士那里不仅听到拥护和贊美的声浪，而且也能經常听到批評和建議，那才能使我們的头腦更加清醒，看問題更加全面，从而不犯錯誤或少犯錯誤，就是犯了錯誤也能很快糾正。同时，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也指出："所謂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單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并且毛主席根据我国的宪法原則、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各党派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張，提出了六条标准，使批評和自我批評沿着正确的軌道前进。因此党与民主党派相互之間所提的意見和批評，只有在合乎这六条政治标准的情况下，才能發揮互相监督的积極作用。

根据上面的理由，所以我們采取"長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針。这是正确地反映了我国社会的客观情况和需要。同时，毛主席早在一九五〇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議上說过："只要誰肯眞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內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貫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廢，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沒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沒有理由不給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

不过，应当强調地指出，在"長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过程中，我們絕不能忽略了領导与被領导的关系。在統一战綫中以共产党为領导力量和核心力量，以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这是大家公認的，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同时也是我国宪法所規定的，这是絕不能含糊的。今后这种領导仍然必須保持和加强。这种領导是政治領导，領导的方法是經过各种会議的討論和协商，經过各种方式的宣傳和爭論，从而取得政治上的一致。同时共产党对于民主党派和無党派民主人士的困难和合理要求，也要采取积極关怀和帮助的态度。最近，右派分子力圖推翻共产党的領导地位，力圖丢掉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用什么"党天下"、"一党專政"的話来誹謗党，公开提出"請共产党下台"、"政治設計院"、"平反委員会"等等狂妄的要求，来破坏党与民主党派的領导与被領导的关系，想使民主党派离开正确的軌道；并且有些右派分子有組織有計划地进行活动，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这是違反宪法的行为，也是全国人民所坚决反对的。此外，我們也应当認識到，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一方面是領导与被領导的关系，一方面又是平等的友党关系，要对民主党派坚持独立、自由和平等的原則。只有民主党派保持独立、自由和平等的地位，才能充分發揮互相监督的作用。因此，党对民主党派的政治領导，决不意味着党可以把它們当作附屬团体；加强領导也并不等于对民主党派的工作管得过多过死，而应当理解为加强政治的領导。

"長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針和"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有密切的联系的，它們都是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甚至可以說这是一个統一的方針的兩个不同的方面。旣然在政治范圍內，我国有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可以"長期共存、互相监督"，那末在思想文化范圍內就更有广泛的民主和自由。讓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自由發展，讓科学上不同的学派自由爭論，这不仅可以解决艺术科学中的是非問題，促进艺术科学的繁荣进步，而且可以使馬克思列宁主义在斗爭的風雨中得到煅鍊和發展，使更多的人經过独立思考而相信它是眞理。香花只有在和毒草的斗爭中才能生存，眞理只有在和謬誤的斗爭中才能發展。同时，广开言路，讓人民敢于說話，敢于批評，这充分显示出我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标志着我們的国家是一个合理的、活潑的和富有生命力的国家。

三

"長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是根据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提出的。但是，这个口号在理論上是否符合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則呢？

有人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經典著作中并沒有說过共产党和其他党派長期共存的話啊！为什么我們实行这样的方針呢？"是的，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經典著作中确实沒有講过"長期共存、互相监督"这种方針；但是另一方面，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著作中也确实沒有講过只能允許一个党存在。这里，我想重要的問題是我們应当怎样看待理論。按照辯証唯物主义的認識論来說，人們的認識是来源于实踐，人們是通过实踐而發現眞理，并且又通过实踐而証实和發展眞理。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何而来呢？这不过是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根据实际創造出来的理論，是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的結論。我們学習这种理論，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依据它的立場、观点和方法，去正确地理解历史中和革命中所發生的实际問題，找出其發展規律，引出理論性的結論来。这就是說我們学習它的目的完全在于应用。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死的，而是活的；不是停滯不前的，而是不断發展和完善的。我們在应用它的过程中，当分析历史实际和革

命实际而找出了規律性的时候，就用新的經驗和新的知識丰富和發展馬克思主义。党中央和毛主席就是这样做的，把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踐密切結合起来，經常对革命的形势进行具体分析，及时提出新的任务和新的方針，推动革命事業的前进，并且善于用新的經驗丰富和推进馬克思列宁主义。現在，我們党中央和毛主席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針，以及其他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是繼續丰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我們的革命实踐已經証实了并將繼續証实这一点。

有人說：“我們不是無产阶級專政的国家嗎，为什么允許民主党派和共产党長期共存呢？”是的，我們是無产阶級專政的国家，但是無产阶級專政的国家并不是命定的只能有一个党存在。列宁从無产阶級的同盟問題出發，曾經这样闡明了無产阶級專政的公式：“無产阶級專政，是無产阶級，即劳动者先鋒队，与人数众多的非無产阶級的劳动者阶層（小資产阶級、小業主、农民、知識分子等等）之間，或与他們大多数之間的特式阶級联盟，……是为最終建成和巩固社会主义而建立的特式阶級联盟。”（列宁：“論以自由和平等的口号欺騙人民”演說詞出版序言，載“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２０卷350—351頁）旣然，無产阶級專政，是作为領导者的工人阶級和被領导者的非工人阶級的一种特式阶級联盟，那么这种联盟在一定条件下就可能以多党共存的形式表現出来。多党共存和無产阶級專政的原則不是不相容的，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多党共存可以加强無产阶級專政，是社会主义民主高度發展的表現。要知道，社会主义講統一，是指制度上的統一，是主張消灭剝削制度，实行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以代替私有制，不允許私有制和社会主义所有制同时存在。但并不是說要取消統一制度下的个人自由，要縮小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民主。其实，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有广泛的民主，在人人劳动的基础上才有眞正的自由，人的个性才能得到正常的發展。在我国，民族資产阶級不仅在民主革命中有兩面性，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也有兩面性，加以工人阶級領导的正确、工农联盟的强大，以及社会主义陣营日益强大的国际条件，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民族資产阶級可能走社会主义道路，我們可能建立更广泛的阶級联盟。我国的人民民主專政，不仅是工人阶級同农民和一切劳动群众結成联盟，且而以这种联盟为基础，同民族資产阶級和少数民族的一些上層人物建立了統一战綫，結成了联盟。我国的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是民族資产阶級、上層小資产阶級和它們的知識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民主党派又贊成社会主义并接受共产党的領导，它們实际上已經成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团体。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当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起来的时候，我們提出了“長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針，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只能有一个党存在呢？共产主义的事業絕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共产党員只有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絕無排斥别人、壟断一切的权利。这是毛澤东同志早就告誡我們的。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說过：“工人阶級的解放斗爭，不是要爭得阶級特权和壟断权，而是要爭得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廢止任何阶級統治。”

有人說：“苏联不是只有一个党存在嗎，为什么我們要实行多党長期共存呢？”这种人不了解：在人类社会的發展中有共同的基本規律，但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間，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特点。因此，每个国家和民族在走向共产主义这一个基本点上是相同的，但在具体形式上各有不同的道路。只有善于根据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特点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眞理，各国無产阶級的事業才能得到成功。这是在“再論無产阶級專政的历史經驗”一文中說得十分明白的。列宁对此曾經指出：“各民族之走向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但走法不会完全相同，每一民族具有其特点，在这一个或那一个無产阶級專政的形态中，在这一个或那一个社会主义改革的步驟中。”（列宁选集第三卷一七八頁）他們不了解苏联之所以只有一个党存在，是由于苏联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我們所以有多党存在，是由我国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大家知道，在十月革命的初期，列宁曾經想爭取同社会革命党合作，来共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列宁領导的布尔什維克并且曾經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成立了协定，并吸收他們某些人担任苏維埃政府中的重要职务。但是由于第一个無产阶級專政的国家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圍之中，国內进行了尖銳的阶級斗爭，一些非無产阶級的政党都先后变成了反革命的政党。共产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也只存在半年的时間，由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拥护富农的利益举行叛乱，反对苏維埃政权，而跑到反革命营壘中去了，于是才把它們清除出去。因此，苏維埃政权就不是建立在多党联合的基础上，而是变成一个党即共产党存在的局面。可是我們中国的历史条件和苏联是不同的。不仅国际条件不同（我們現在的国际环境比当时苏联所处的情况好得多了），最重要的是我国的人民民主統一战綫有長期的历史，現在民主党派又拥护社会主义并接受共产党的領导，那就容許多党存在。这絕对沒有改变我們国家的無产阶級專政的性質，而且加强了無产阶級的專政，更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建設。当然，有了

这样有利的历史条件，要是沒有正确的政策和正确的領导，也是不能利用这种有利的历史条件，把理想变为現实。教条主义者不了解，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眞理只有通过一定的民族特点，才能在現实生活中具体地表現出来和發生作用。教条主义者不肯認眞地研究我国的社会历史特点，只会机械地搬运别人的經驗或背頌書本上的詞句，他們看見苏联只有一个党存在，而我們却有多党存在，于是他們就怀疑起来了，憂虑起来了。只有創造性的馬克思主义者才能有勇气提出"百花齐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样的方針，以及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指示等等，这自然是为教条主义者所难以理解的。

另外，也有人这样說："旣然有多党存在，那就实行兩党制吧，这一个党在台上，那一个党在台下，大家輪流执政。"这些醉心于資产阶級民主的資产阶級右派分子，認为西方的議会制度比我們的人民民主制度自由得多，民主得多，想以西方的議会制度来代替我們的人民民主制度。其实，西方的議会制度是服务于資产阶級的利益的，实質上只是少数資产阶級能够享受的民主，是資产阶級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專政。所謂兩党制不过是維护資产阶級專政的一种方法，那些交替执政的政党实質上都是代表資产阶級的組織，交替执政只不过是一种分贓的形式。右派分子要求实行兩党制，就是离开社会主义而回到資本主义老路上去；要求輪流执政，就是爭取領导权，企圖摆脫共产党的領导。是不是西方的議会制度比我們的人民民主制度有更广泛的自由和民主呢？毛澤东同志說："在阶級斗爭的社会里，有了剝削阶級剝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劳动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有了資产阶級的民主，就沒有無产阶級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有些資本主义国家也容許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資产阶級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許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我們的国家是工人阶級領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国家。我們的專政，是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專政；我們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对于人民来說，是享受着比任何資本主义国家所不可能有的广大的民主自由。当然，这种民主是集中指导之下的民主，这种自由是有領导的自由。这就是民主集中制，就是把广泛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互相結合起来。这种民主集中制的具体运用，則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因为民主的扩大而根本否定集中的領导。右派分子企圖利用"絕对民主"的观念，来瓦解劳动人民的組織性，我們必須堅决地反对，保衛我們的民主集中制。在我們的国家里由誰来領导呢？这只能由工人阶級的政党来領导，而不能由資产阶級或小資产阶級的政党来領导。世界上还沒有任何一个非工人阶級政党領导劳动人民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事实。在我国虽然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各民主党派在共产党領导下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参加了国家的管理工作，但是各民主党派并不能代替共产党的領导地位。这是社会發展的規律所决定的，也是我們的宪法上所明文規定了的。任何企圖摆脫共产党的領导的想法，任何企圖离开社会主义而回到資本主义的想法，不仅是根本錯誤的，而且也是不可能实現的。醉心于資产阶級民主的右派分子們，你們的兩党制和輪流执政的幻想是永远不能实現的，人民不能同意你們按照資产阶級的面貌来改变我們国家性質的意見的。

四

"長期共存、互相监督"是我們党"固定不移"和"永远不变"的方針。对于这个方針，当然是沒有人公开反对的。但这并不是說大家对这个方針是眞正心悅誠服的了，党与民主党派之間沒有什么問題了。有人这样說："民主党派有什么資格跟我們長期共存？还是短期共存吧！""我监督你，我还用你监督嗎？你民主党派那年打的天下！"由于有些人有这种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緒，所以就不能貫徹执行党的方針政策，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尊重不够，帮助不够，而且有些党員居功自傲，自以为是，不虛心学習，不乐意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見，并且經常采取簡單化的工作方法去处理問題。因此，有些党外人士总感到党与非党之間有"牆"或"溝"，因而不能充分發揮党外人士的作用，有些积極因素还沒有調动起来。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使党与民主党派之間的关系更加协調更加健康起来，这也就需要整風。只有在整風中克服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才能巩固人民內部的团結，順利建成社会主义。在党中央关于整風运动的指示中說道：在整風学習中，对于各級領导机关和干部，主要是要檢查处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情况，檢查对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針和"勤儉建国"方針的执行情况，檢查那些脫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現象，檢查那些不从团結六亿人民出發、不从团結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和广大的党外群众出發，不从团結全党出發的宗派主义現象，檢查那些不从实际情况出發的主观主义現象，而眞正地貫徹执行中央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指示。我們相信，經过此次整風，对于人民內部的矛盾加以充分的揭露和正确的处理，党与民主党派之間的关系也將大为改善。

我們党这次整風有一个特点，就是开門整風，不仅在党内要开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运动，而且还要請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給党多提意見和批評，帮助党整風。只有这样“內外夾攻”，才能使整風运动进行得徹底。从最近各地报刊所揭露的材料看来，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已經給我們党提出了大量的批評和意見，其中大多数的批評和意見是正确的，或者說基本上是正确的，我們应当誠恳接受并且边整边改。这对推进党和国家的各种工作，对改善党和非党的关系，是有很大帮助的。当然，也有一部分批評和意見是不正确的，是不符合事实的，我們应当加以解釋。但是一些心怀敌意的右派分子，却以为大好时机已到，在帮助党整風的幌子下，向党發动了猖狂的进攻。他們打着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来反对馬克思主义，打着反对宗派主义的幌子反对共产党的領导，打着反对官僚主义的幌子反对人民民主專政。总之，他們兴風作浪，到处点火，千方百計地要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而把中国拉到資本主义的老路上去。因此，我們对右派分子应当进行坚决的斗爭。这也說明，过去党与非党之間矛盾，有些是右派分子制造出来的。这也說明，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阶級斗爭虽然基本上过去了，但是阶級斗爭还沒有完全結束。我們反右派的斗爭实际上是一次深刻的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現在这个斗爭已經获得了重大的战果。但是也应該看到，眞正在政治上、思想上完全粉碎右派的活动，还是一个長时期的任务。我們要繼續努力，絕不能草率收兵，只有完全揭露他們的陰謀，徹底駁倒他們的謬論，使他們在人民中間原形畢露，陷于孤立，这才能加强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团結。

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問題畢竟是包括兩个方面的，要改善相互之間的关系，民主党派当然也有責任。有些民主党派的負責干部就这样說，如果說党与非党之間有“牆”和“溝”的話，那絕不是單方面形成的，“拆牆”或“填溝”那就要兩方面动手。假如把責任完全归之于一方，那是不公平的。周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代大会第四次会議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說：“非共产党人士也应該勇于尽职尽責，消除对于工农干部的抵触情緒，消除对于共产党員的猜疑隔閡，开誠相見，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随时提出批評和建議，并且加强学習，提高自己的思想和認識，以期达到双方亲密合作、和衷共济的目的。在非共产党人士中有一些人对于社会主义还抱着对立的情緒，他們尤其需要努力改造自己，清除这种对立情緒。”至于長期共存的問題，毛澤东同志說：“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長期共存，这是我們的願望，也是我們的方針。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長期存在下去，不是單由共产党一方面的願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現，要看他們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因此，我們希望各民主党派都能注意思想改造，爭取和共产党一道長期共存，互相监督，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东同志指出的这一点是極为重要的。現在各民主党派在深入开展反右派的斗爭中决定进行整風运动，加强思想改造工作，这当然是可喜的事情。民主党派只有通过以反右派斗爭为中心的整風运动，受到考驗和鍛鍊，整頓自己的队伍，去腐催新，使自己的机体健康起来，帮助自己的成員加强思想改造，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永远跟着共产党前进，忠誠地为人民服务，那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适应新社会的需要，同共产党長期共存下去。

最后，我們还应当指出，在經过反右派的斗爭和整風运动之后，許多党員在政治上、思想上得到了很大的鍛鍊和提高，各种工作改进了；民主党派的成員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右派分子被孤立起来了，这样党与非党的关系就会有很大的改善，所謂“牆”和“溝”就不会存在了，团結就更緊密了。但是，这并不是說党与民主党派之間就不需要有什么界綫了，就不会再發生什么矛盾了。上面說过，旣然民主党派所代表的一部分人民的社会地位及其利益和要求，都同工人农民有所不同，特别是他們的資产阶級思想会拖得很長，对待問題的观点和方法都和工人阶級不同，那就自然会發生矛盾。同时有些党員在整風运动之后也还会在工作中繼續發生缺点和錯誤，这也就会使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發生問題。不过那时候的矛盾，乃是在新的更高的团結的基础上所發生的新的矛盾。事物的运动就是这样，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如此循环往复，以至無穷。可是每次矛盾解决之后，事物即向前發展一步。这种前进的上升运动，乃是事物矛盾發展的規律。我們只有采取“团結——批評——团結”这个方法，貫徹执行“長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針，才能正确地处理党与民主党派的矛盾，加强人民內部的团結。为了正确地处理这种矛盾，我們党要注意进行兩条战綫的斗爭，一方面要反对“左”的傾向，“左”傾的危險，是常常忽視爭取中間力量，有宗派主义情緒，只有斗爭，沒有团結；另一方面又要反对右的傾向，右傾的危險，是常常放弃党的原則，庸俗的迁就，只有团結，沒有斗爭。不論犯了“左”傾的錯誤或右傾的錯誤，其結果都会使党的統一战綫工作遭受重大的損失，使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处于不正常的状态，这是对于社会主义建設事業很不利的。

談資产阶級社会学的反动性

王　康

在百家爭鳴声中，我們从报刊上也听到了恢复社会学的声音。

近几个月来，已經有不少人对于社会学的地位、任务等問題，發表了很多意見。这里所說的社会学，也就是指的資产阶級社会学而言。本来，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照耀下，如果資产阶級社会学这株毒草也要随着無数香花一道鳴放出来，正可以讓我們認清这株毒草的眞面目，鋤起来会更容易些，讓香花可以更香，更显示出馬克思主义眞理的正确性。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是，那些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和我們的想法显然是不同的。他們提出了系統的恢复資产阶級社会科学的反动綱領，社会学不过是他們企圖突破的一个缺口。右派分子始終怀念着沒落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感情，不甘心接受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論；恢复資产阶級的社会科学或社会学，实質上是右派分子在思想战綫上向馬克思列宁主义發动的一种猖狂进攻，他們一方面打算为資产阶級的各种反动学說理論的重新泛濫开辟道路，以便从思想上解除一般知識分子或少数个别不坚定的馬克思主义者的武装，同时也惡毒地配合了他們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陰謀活动，妄圖在新中国搞資本主义的复辟。因此，"恢复社会学"这种主張不仅是荒謬的，而且可以断言，也必將随着右派分子的徹底失敗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眞理面前宣告徹底破产。

社会学是在院系調整之后随同另一些資产阶級的社会科学一道从新中国大学課程上勾去的。这在当时，剛解放不久，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在高等学校中还未取得优势，而資产阶級的学說思想在相当多的知識分子中还很有市場，在这样的时候，为了不讓反动思想扩大影响，引导知識分子学習革命理論，树立革命人生观和正确的立場，学会掌握明辨是非的标准，采取这样一个措施，是完全必要的。

現在，情形当然不同了。新中国的大学已深刻地經过了教学改革，知識分子的面貌經过学習改造也有了一定的变化，馬克思列宁主义已在新中国得到广泛的傳播，并用宪法明确地規定为我們国家的指导思想，資产阶級的各种"理論"已程度不同地受到了批判，不再能公开地占有市場了。但是，如果因此認为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已經稳固，資产阶級的思想影响已不再存在，可以听任社会学等資产阶級的社会科学重新恢复，那就錯了，事实上像社会学这門学問虽然早从大学課程上勾去，它所代表的那种思想意識在一些学过这門学問的人中間，实际上仍在自覚或不自覚地保留着一定的影响；就是在沒有学过这門学問的人中間，也同样在或多或少地發生着作用。过去这一段时間由于右派分子有計划地散播着影响，事实表明它仍然有相当的市場。如果無条件地任其鳴放，必然会泛濫成灾，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当然，这并不排斥站在馬克思主义的立場上批判性地来加以評介，比如說，可以考虑在大学的哲学系或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里批判地开講这門学問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論，这样就有可能讓人們逐步了解社会学的反动內容，比較具体地認識資产阶級的各种反动社会学說，这对于开展批判唯心主义的斗爭，無疑地会起到知己知彼的作用，同时也自然会丰富馬克思主义教育的內容。此外，还可以在科学机关里适当組織一些人力，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适当地吸收一些社会学的方法和經驗，逐步开展一些社会調查研究，讓实踐来証驗社会学是否能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中發揮一些有益的作用。我們相信，在我們这样的国家里，任何事物只要眞能發揮出有益的作用，也就自然会有它应得的地位。

但是，应該指出，上面說的这些，同"恢复社会学"的要求是有原則区别的，如果說社会学可以發揮一定的作用，那也是有条件的，并不是簡單的恢复。因为資产阶級社会学是一門和历史唯物主义針鋒相对的最反动的学說，要把一門長期为資产阶級利益服务的东西轉变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絕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必須經过認眞的、細致的研究批判，經过一番严肃的思想斗爭，旣能認清这門反动学問的本来面目，揚弃掉那些腐朽的思想理論，又能实事求是地抉擇出若干有用的思想資料和有条件地运用社会学的某些調查研究的方法。至于究竟抉擇什么揚弃什么，这当然有待于进一步的細致的、深入的研究。这里，为了抛磚引玉，請允許我冒昧地对社会学的性質提出一些膚淺的看法。

資产阶級的社会学和馬克思主义都是在19世紀四十年代左右，在差不多相同的时期里誕生的。我們知道，这个时期虽然还是資本主义处于上升的阶段，但

是，資产阶級为發財致富而造成的罪惡已層出不穷，資本主义的危机已不断出現，資本主义的致命病症也已日益显露，而随着資产阶級一道誕生的無产阶級，尽管备受压迫剝削却日益壯大起来，这时候，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說的：資产阶級的“生产力已經增長到这种关系（指資产阶級所有制关系——引者）所不能容納的地步，資产阶級的关系已在阻碍着生产力的發展；而当生产力一开始实行打破这种障碍时，就使得整个資产阶級社会陷于混乱，就使得資产阶級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代表着新兴的無产阶級利益的馬克思主义正式誕生了。它根据对人类社会历史上各种生产方式的分析研究，發現了人类社会發展的規律，明确地指出了，資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用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从理論上武裝了無产阶級，鼓舞着無产阶級为美好未来而斗爭的信心。

資产阶級自然不会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它为了巩固自己的旣得利益和統治地位，在經济上是更加紧無情的兼并和集中，同时把从殖民地劫夺来的大量財富吐出一点余唾分潤給少数“工人貴族”来分化無产阶級；在政治上則日益狡詐地玩弄虛伪的民主与自由。同时，还动員了大批御用的学者来制造理論上的依据。可是，那个时代的那些曾經帮助过資产阶級建立过优势的各种資产阶級理論，都無能为力来弥补这剛建立不久就破綻百出的資本主义制度。資产阶級迫切需要有一种新的学說来对抗無产阶級的革命理論，能比較自圓其說地为它的存在辯护。为适应这种需要，于是一种企圖綜合各种資产阶級社会科学的社会学就出現了。

1839年，法国著名的实証主义者孔德（1798——1857）在他的“实証哲学”第四卷里首先采用了社会学这个名称，并提出了一套社会学說，以后人們就把他当作这門資产阶級学說的創始人。

孔德，在青年时期曾經追随过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聖西門，他的那套实証主义的理論，其中一些基本論点就是来自聖西門的思想体系。可是，当聖西門繼續尖銳地揭露着資本主义社会罪惡的时候，孔德就和他的老师闊翻了。聖西門空想的基本上是帶着唯心观点的改造社会的学說，沒有能够說服他的这位門生，这位一度崇信过社会主义的青年，終于轉变为資本主义制度忠实的辯护者。

在孔德的中年和晚年，欧洲工人运动和各种社会主义理論在蓬勃發展，法国及整个欧洲的資产阶級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及其以后二三十年間無产阶級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犹心有余悸，資产阶級最需要的是一个巩固和稳定的秩序。而孔德也的确被資本主义上升时期新涌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和繁荣景象弄得眼花繚乱，便認为資本主义制度是历史發展的最高阶段，是“最合乎理性而必須加以維护的制度”。因此，他根据自己对那个时代的片面認識，提出了他自己对社会現象的解說和改革社会的方案，坚决反对聖西門等攻击这个制度的理論，反对阶級斗爭，这些論点很显然地是充分反映着資产阶級的要求与願望。

孔德把社会發展分为神学的、形而上学的和实証的（或科学的）三个阶段。他認为当时社会所呈現的混乱狀态，都是由于神学的和形而上学的政治影响造成的。只有实証哲学才能改造社会。于是他强調秩序与进步的重要，創建了一种实証的社会学，一部分叫作社会静学，專門研究社会秩序；一部分叫作社会动学，專門研究社会进步。他并且毫不諱言地要用这門綜合各門科学之“長”的新学說来“指导社会政治活动”，“使那些名符其实的政治家能够了解这一工作是确实有用的”。本来，在孔德眼里所謂“进步”就是指的資本主义制度，要維护这种“进步”就得有“秩序”，也就是資产阶級的秩序。按着实証主义的謬論，在实証的社会里，經济与政治的大权都归于資本家，而無产阶級則只能在实証哲学家的教导下永远从屬于資本家。按着这种理論去做，就能“用道德和科学的力量来調和阶級利益的矛盾”，把这个社会建立在精确的科学的稳固基础之上。所以馬克思批評孔德是替独夫專政和資本家統治辯护的預言家，列宁更把他叫做“墮落的自命为哲学家的空談家”。

然而，說来也很可笑，尽管孔德把自己的大半輩子精力都用来維护資本主义制度，那些唯利是圖的資本家們，却沒有及时給他以相应的信任。在他發表了“实証哲学”之后，他虽然早已和他的老师脫离了关系，但淺薄的資产阶級暫时还不能“了解这一工作是实在有用的”，因此，他依然遭受着聖西門晚年所遭受着的貧困命运。矛盾与困惱的心情，使他一度得了神經錯乱的毛病。以后病总算好了，还是長期不能摆脫貧困，連他的妻子也因不慣艰苦离他而去。这些人世的貧困与辛酸，使这位郁郁不能得志的頗为博学的人終于看破紅塵，从实証的科学的路上退回到宗教上来。晚年，他大力倡导“人道教”，宣揚友爱互助和自我牺牲，也沒有多少追随的人。1857年一次新的經济危机从大洋彼岸的美国卷入欧洲，这位歌頌过資本主义的学者，終于憂郁地在貧困与危机中逝去了。他所称为最进步的社会，对他竟是如此地無情，这眞是絕妙的諷刺！

但是，我們却已經足够从这个諷刺的悲剧中，大体上看到了社会学誕生的情景和它的本来面目了。

的确，当資产阶級終于理解到孔德所創立的学說对他們的好处之后，就表現了極大的兴趣。它們把孔德思想中强調科学、提倡合作和利他主义、鼓吹人道主义等含有进步因素的东西都完全丢掉，而把孔德反对唯物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理論則加以夸大和發揮。所以在孔德死后，社会学这一門严格說来并不能算作科学的东西，只是因为它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它有利于資本主义制度，却吸引了大批的資产阶級学者，受到了壟断資本特殊的寵爱。

今年，是孔德逝世一百周年。在这一百年里，和資产阶級社会学以及整个資产阶級理論坚持不懈地进行着斗爭的馬克思主义，已經成为指导九亿人民欢度社会主义生活的思想武器，馬克思主义已成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眞理。在馬克思主义的光輝照耀下，爱好和平与进步的人类已經决定把孔德作为今年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来紀念，人們从历史的观点理解到时代环境在他的思想上所造成的局限性，公正地指出了他思想反动的一面，同时也非常重視他思想中的进步因素和追求人类幸福的理想，并把它作为重要的文化遺产繼承下来。人們对待社会学創始者孔德的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在一定的意义下也足以表明人們对待社会学的态度。

不过，一百年来，社会学为适应資产阶級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的需要，都有了不同的变化。同时它也針对着馬克思主义理論和事業的胜利發展，用着各种不同的形式散播着各种各样反馬克思主义的謬論。虽然直到今天究竟社会学是研究什么的，中外社会学者一直是众說紛紜，莫衷一是。这个情况充分表明，这門学問作为一門科学来要求是很不够的。可是，这門說来很不謹严的学問內容却非常龐杂，流派也特别多。按，逃亡的白俄，寄寓在美国的社会学家苏若金在"当代社会学学說"中所搜罗的流派，眞是异說杂陈，不下数十余家。其中，苏若金惡意地把馬克思的学說仅仅作为經济学派的一个旁支来看待，这当然是非常荒謬的。至于其他各家，都不外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就自己局限的范圍內，受阶級意識的指使，对社会現象所作的各种各样片面的解釋。有些解釋，尽管都振振有詞，現在看来，也都是經不住一駁的，如像斯大林在"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对地理环境論和人口数量論的評述就是很好的例子。我們在这篇短文里不可能分别加以論列，只就其中几个最主要的流派簡介一下。

我們知道，在19世紀后期，資产阶級已經普遍在欧洲各国占据着統治的地位，社会阶級的矛盾日益尖銳，馬克思主义的影响已經籠罩着整个欧洲，要求自由平等的呼声也日益高漲，进化論的思潮正盛極一时，……在这些情况下，資产阶級需要巩固自己的地位，便从原来扮演的进步角色后退到又和封建势力妥协，并乞助于教会神权联合对付無产阶級和进步力量。社会学也适应这种要求，出現了以英国斯宾塞（1820——1903）为代表的生物学派。

斯宾塞繼承着孔德所首創的有机体說，又吸取了当时进化論的观点，把人类社会也当成有机体，認为社会的生命，也完全受进化規律的支配。本来，进化論是資产阶級反对封建势力，反对教会神权的一个重要的武器，所以这个学派在表面还显得有点进步和唯物主义的味道。但它机械地把社会和有机体作着牽强附会的类比，如像把社会的阶級分化和有机体內的机能分化完全等同起来（認为动物有营养、分配和調节三种系統的器官，人类社会也就相应地有担任营养职能的工人阶級，担任分配或交换职能的商人阶級，和負責調节生产的工業資本家阶級），从而惡毒地把社会上剝削与被剝削的关系說成为天經地义的事情，資产阶級天生是統治者，而無产阶級則生来是被治者，無产阶級服从資本家的統治，就如同身体活动要受神經中樞的指导一样。这样就替社会上所存在的一切不合理現象，从自然規律上进行了辯解。

生物学派重复着孔德的論調，也認为資本主义社会是合理的、和諧的社会，是可以永世長存的。

生物学派的旁支很多，最反动的莫过于假"物竞天擇，适者生存"这一进化理論而出現的各种种族优越論，和認战爭为人类天性的战爭学派，公开地叫囂人类不平等，为帝国主义侵略落后民族制造了可耻的借口；公开地宣揚战爭可以促进社会的进化，認为战爭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規律。还有从生物遺傳学中派生出来的优生学，把生物中实驗的規律硬搬到人类身上来，强調先天的重要，無視后天环境的作用，似乎一个人的成長并不决定于环境，而早决定在未出生以前的条件，这就为残余的封建貴族和資本主义社会实际上存在的等級制度作了辯护。此外，如关于人口問題的研究，正如現在开展的人口討論虽然有許多可取之处，也無可諱言地有許多反动的謬論（如生存空間論），曾經为帝国主义的战爭政策張目过。

19世紀結束时，資本主义的"黃金时代"也結束了。社会学的生物学派为对抗馬克思主义的阶級斗爭学說，曾煞費苦心地創制的反科学的社会有机体說，在現实面前充分暴露了它的荒謬絕倫，尽管它能曲解阶級的关系，却無法解决日益尖銳的阶級矛盾，無法挽救資本主义的腐朽命运。因此几乎是同时在欧洲和美国又出現了一批社会学者，在資产阶級社会学里标榜

了另一个重要流派——宣揚唯心論，否認有阶級斗爭的心理学派。心理学派为了表現自己的客观，也批駁了生物学派那种机械的、生硬的有机体的类比論，同时也偷偷地販卖着形而上学的論調，把社会同自然界絕对地对立起来。这个学派把所謂个人的心理特質当成社会成立的基础，認为一切社会行为的發生，都不过是个人相互行为的交互刺激和反应，这就从根本上否認了阶級对立的事实。那末，怎样解釋社会上存在着的阶級矛盾呢？心理学派說，人們在交互刺激和反应过程中，有时也会發生一些失調現象，但这并不是什么阶級对立和斗爭，都不过是个人与个人或这一群人与那一群人之間的关系問題。为了解决这些失調現象，心理学派就大力研究个人的心理特質，企圖从玄虛的态度上来寻找社会物質狀況和社会制度变迁的原因，企圖从人性、人格这些东西上来說明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組織的形式。比如說，什么叫人格呢？有的社会学者說，"人格就是决定个人在社会上所任职务的各种特質的总和及其組織。"有的社会学者說，"我們可以視人格为个人所有关于社会环境的各种态度、思想与習慣的統一的性質。""有許多个人特質如身材、能力与气質，确可以影响其社会地位。原来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是为其他許多社会关系如团体参加、品性、个人行为模式、社会性等所决定"（見孙本文："社会学原理"）。好了，从这些解釋可以看出什么呢？应該說，我們并不完全否認心理学关于人格問題的研究，特别是它也强調社会环境对于人格培养的作用。但是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心理学派的理論，人格是个人心理特質的整个單位，而个人的心理特質就是社会成立的基础，这样心理学派就很狡猾地躲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級学說，很狡猾的否定了社会物質資料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同时，也利用态度、品性与習慣这一类說法（其中也有可取之处），把許多原則性的問題加以庸俗和歪曲，这只要举一个小例子就可以說明了，我們知道壟断資本家对待新技术新發明的态度都是从利潤多少来决定的。近代有許多事例表明，壟断資本家常常把新技术新發明的專利权买去并不应用，道理本来很簡單：如果不改进技术照样可以賺錢的話，他怎么会多花錢去改进呢？但是，心理学派却把这件事情說成是"人类的惰性"作用。而壟断資本家的罪恶也就这样地被輕描淡写蒙混过去了。

心理学派就好像沙漠里的鴕鳥一样，把自己的腦袋塞到自己醉心的所謂心理特質中去。但是事实却和它所設想的并不一样。社会虽然离不开个人，也并不仅是一个个别的人的拼凑，心理学派想从每个人的心理特質找出社会成立的規律，結果也許有些个别的具体的收获，总的来說，則不过是一种只見树木不見森林的理論。因此，当資本主义發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的时候，社会学上的这种理論就逐漸吃不开了。首先它無法抹煞社会上活生生地存在的阶級和阶級斗爭的事实，同时壟断資本集团对于自由資本主义时期的一些东西也不感兴趣了。于是，社会学又用尽心思来适应帝国主义时期的要求，出現了一个所謂的文化学派。这个学派采取了折中主义的态度，它也認为心理学派只强調个人心理特質这种見木不見林的理論是片面的，从而提出一种文化决定論，認为人和动物的分别，在于人有文化；沒有文化，也就沒有人类社会。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受文化的支配，一个人一进入社会，飲食起居一言一行沒有一件事能逃得脫文化的約束，而社会离开了文化，也就不成其为社会，所以社会的生存与發展也完全由文化决定。那末，文化是什么呢？文化又是怎样發生和發展的呢？关于后一問題，在文化人类学中曾經有过各种各样的解釋，許多学者各执一詞，始終沒有得出一致的意見。关于前者，說法也很多，有的說"文化是一种学習的过程"，有的說"文化就是社会上过去与現在的一切思想与活动的途徑的总和"，还有一些英美社会学者認为"文化是一种复杂体，包括实物、知識、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風俗以及其余从社会上学得的能力与習慣"（見孙本文："社会学原理"）。应該說，这些研究并不是完全沒有可取之处的，事实上这也都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要研究的对象，文化学派無疑地是可以提供不少思想材料的。問題在于根据社会学的文化学派的这些說法，所謂文化，实际上就是指的全部社会現象。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邏輯：既把文化当作决定社会生存發展的原因，又說，文化就是全部的社会現象，这样以原因为結果，又以結果为原因的"理論"虽然可笑，它却起了一种釜底抽薪的作用，就是拋开問題的本質，只在人創造文化，文化創造人这套邏輯里兜圈子，把人們的注意力糾纏在衣食住行，婚嫁丧葬以及諸如家庭、宗教、战爭等等所表露出来的一些現象上。然后就在这些人們耳濡目染的現象上利用人們常識上的錯覚，提出了一系列的和历史唯物主义相对立的理論。比如說，在分析社会的構成时，它不是首先分析社会的阶級結構，而是以家庭、社区和国家等为社会組織的研究对象，把一切阶級的矛盾斗爭都归結为"文化失調"，也就是說，都不过是文化各部分之間不能很好地配合的結果；它也不相信有哈社会發展的規律（如五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往往是把社会發展都簡單地当成所謂的"文化变迁"，都不过是新文化的增加和旧文化的改变而已。当然，文化学派也非

常有兴趣論述人类从石器时代直至近代使用机器的人类社会的进化史，但目的無非是为了論証資本主义制度的进步，所以它虽然要談生产工具的改进，却并不討論生产方式的改变，更不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問題。而且动員了許多人类学者竭力从初民社会中去寻找論据反对馬克思主义。它厭惡阶級分析的方法，不重視經济基础的作用；特别强調精神意識的重要，（或者把二者机械地割裂开来，或者干脆宣揚唯心主义的理論）反对革命，强調演化，……这些無疑地鋒芒都是对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它还为剝削者創造压迫統治的借口，如对于一种新的革命理論，在社会上所受到的反动統治阶級的迫害則解釋成为不符合社会固有的"文化模式"，解放前常常出現的反馬克思主义的"不合国情論"就正是文化学派的一种謬論。

这种社会学随着美国資本一道發展起来，在美国特别拥有市場，金元帝国的銅臭气把这門学說熏染得庸俗煩瑣不堪，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曾經流行过的一种"全盤西化論"，就是深受美国世界主义影响在文化問題上的一种反映，还有那种崇拜技术、夸大武器作用，企圖利用原子彈来統治世界为美帝国主义暴力張目的原子社会学也就正是这个流派的产物。

社会学的这些学說一直与政治上的改良主义相互为用，难解难分，的确曾經分散过某些人們对腐朽現实的注意力。然而，当人們不断受到資本主义危机的侵害和日益受到馬克思主义的影响的时候，这各种流派对資本主义的腐朽現实都無能为力，先后破产了。从此，我們就在近二三十年来的許多社会学教科書上看到一种漸趋一致的"体系"，就是把各派社会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中为資本剝削辯护的那些似是而非的理論，像杂燴一样地拼凑在一起，用它們来解釋、說明各种社会現象，同时也用它們来抗拒馬克思主义声势浩大的影响。

按照这些社会学教科書的体系，在討論社会問題社会現象的时候，照例采取一种煩瑣的多元論的观点，搬出一大堆"要素"来（如地理要素、生物要素、心理要素和文化要素）。美其名曰要求得一种綜合的"不偏不倚"的看法。应該承認，这种討論問題的方法也并非毫無可取之处，通常对于一个問題試求多方面的了解，自然是比較客观而合乎科学精神的，这种观点用之得当，的确可以克服处理問題簡單化和教条主义的毛病。問題在于資产阶級的社会学者的目的并不在此，社会学的多元論几乎是从孔德以来一脉相承的傳統，社会学者一貫都把自己裝扮得比較超然，他們都声称自己是科学家不参預哲学的爭論，不願卷入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爭，因而在理論上就选擇了折中調和与等量齐观的多元論的态度。而我們知道，折中的或多元論的态度，实际上都是唯心論的变种，是和唯物論不相容的。

社会学的多元論的另一个表現，是罗列現象，既不分主次，也不考虑本質与現象的分别，这样，就可以随阶級利益的要求，混淆人們注意的重心，来冲淡人們对社会發展的主要原因的重視，从而在思想上造成一种模糊不清的印象。

在社会学的多元論的基础上，还产生了一种功能互倚論（Functional Interdependence）。这种理論是針对着因果論而發的。它認为社会現象是無論在空間上或时間上都可彼此先后影响，牽一髮而动全身的息息相关，而因果論对复杂的社会現象，不是看得过于簡單，执一以概全，就是流于阶段論（即承認社会是按照五种生产方式不断向前發展的，这当然是社会学者所不喜欢的）。应該承認，的确有些机械的因果論者往往用一因一果来解釋問題，这样当然不好，功能互倚論在这一点上确乎比較高明。这种理論如果經过改造能用来为眞理服务，也确乎可以帮助我們發現、分析和比較全面的来处理社会問題，至少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可以帮助我們克服簡單化的作風。可惜的是，这种理論在資产阶級社会学的手里，則是用来罗列現象，掩飾本質，在現象里兜圈子，方面尽管扯了許多，并未触及問題的核心。而且因为功能是互倚的，因果是互相作用的，弄到結果往往也就無所謂原因結果了。讓我們举个例子来說吧，比如，資本主义的經济危机可以說是很复杂的社会現象了，現在，人們都知道發生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資本主义的生产資料私有制和生产的社会性之間的矛盾。功能互倚論者却不相信这种理論，他会告訴你，危机是从一家銀行或一家工厂倒閉开始的，很快就波及到和它有关的其他商店企業，造成不景气。因为銀行倒閉，影响工厂关門，工厂关門、工人失業增多就影响工人的購买力，从而也就影响商業蕭条，如此类推，似乎都言之成理，但这显然都不过是某种原因的結果，这些現象并不是危机的原因。社会学却往往就是糾纏在这些現象上，从一些偶然的唯心的观点来找原因，不肯深入到事物的内部去。由于这种理論乍看起来好像和辯証法所講的事物是互相联系、互相依賴和互相制約頗有相似之处，而所談的对象又往往是常見的社会現象，因此更振振有辞很容易在人們思想上造成一种錯覚。多少年来，社会学討論社会組織、社会制度、社会变迁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問題，或者是用上述等量齐观的手法来冲淡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性，或者就是用这种功能互倚論从根本上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性。

現代社会学教科書用上述多元論的体系，把自己打扮成一付超阶級的姿态，有的时候，它也对某些过分露骨反动的社会理論，零敲碎打一下，比如說，它也批評人种論，优生学，也批評馬尔薩斯的学說，显得好像兼容并包非常客观、非常科学的样子。这样，它也就極其狡滑地販运了各种資产阶級理論中最反动的部分，因而所起的反动作用也就更大。

这門拼凑起来的学說，特别受到壟断資本集团的重視，在美国大学里普遍設有社会学專系。大量培养学生作为宗教事务、社会行政的干部；許多大腹便便的巨富为了充分了解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更便于發財，都很热心筹集大批資金来資助各种各样的社会調查研究工作；同时，还作为美国文化的一种重要內容积極向各国推广，中国最早設立社会学系的就是在美国文化掮客們办的教会大学里。从前在法西斯的德、意，这种学說也曾以各种名目風行过一时，从理論上作了希特勒等吃人生番的帮凶。而在英国这一类老牌資本主义国家里，更直接与改良主义串連在一起，因此在表面上更显得誘人动听，在知識分子阶層中的影响也就更为深远。

在上面簡單地述說了社会学反动的特点，这也可以說是社会学主要的一面，当然，这里叙說的是否确切，还有待于大家的指正。不过，在目前着重地指出社会学的这一面，对于我們了解它的性質重新估計它的作用，对于防止修正主义的滋長，对于揭露右派分子的陰謀和拆穿一些美化社会学的宣傳，是完全必要的，也是今后需要做的工作。同时，也只有經过更縝密謹严的分析批判之后，才能确定那些东西是有用的，那些是沒用的，还有那些是有毒害的；才能确定反对什么，發展什么。像这样的工作在我国完全有条件順利地进行，因为我們有党的英明領导，有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傳播的思想基础，也就是說，有批判抉擇的理論武器和运用这种武器的理論工作者，而过去学習社会学的人們，經过認眞的学習改造之后，無疑地也可以作出有益的貢献。

資产阶級社会学在中国如果从严复先生譯出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严譯为"群学肄言"，1903年出版）算起，已經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了。社会学傳到中国虽然是从英国学者的著作开始的，但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由大批留美学生从美国介紹回来的美国社会学。因此，中国的社会学一开始就沾染着英国的改良主义色采和美国的庸俗煩瑣气息；不少的社会学者，也的确承受了改良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深厚影响，以致長期对革命事業采取保留的态度，严重的更会走上反社会主义的道路。早在抗日战争以前，随着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傳播，已經有先进的学者运用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对資产阶級社会学进行批判，从本質上揭露了这門学說的反动性，但是，由于反动政权的庇护，社会学一直占据着所謂正統經院学府的講壇，長期地散播着反馬克思主义的謬論，在青年学生中、在知識分子中投下了深厚的毒害。

当然，有些社会学者在旧中国也曾經在某些具体的社会問題的研究上，花費了不少的劳动，累积了相当的資料，其中有些資料現在还是可用的。但是，由于本身工作的局限性，缺乏群众的支持，虽有点成就，其意义也是很有限的。更重要的是由于立場观点都不对头，所有的結論看法都免不了主观片面的毛病。就是社会学者所最津津乐道的"社会調查"，一向被認为是社会学最精采的"遺产"，其实，許多社会学的調查，都不过是实用主义"大胆假設，小心求証"的具体体現，都不过是为証实某些社会学者的一些論点或想法而进行的。尽管有些方法方式还可吸取，整个說来，这样的調查，看起来非常科学，但由于它竭力迴避阶級分析这个根本問題，实質上，或者是按主观願望所作的煩瑣的解釋，或者是玩弄統計的把戏，用一些主观成分很重的材料来曲解客观的实际，这样的調查，科学价值自然是不会高的。

应該說，資产阶級的社会学長期以来都不能严格地認为是一門科学，它是与馬克思列宁主义相对立的一种反动学說，新中国絕不可能原封不动地恢复它的地位。如果說，它还有些思想資料或个别方法可以用来为我們服务，那也必須經过認眞的批判才行。那么，社会学有沒有改造的可能呢？我們相信，曾經創造性地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了資产阶級的中国共产党，毫無疑問地会胜利地把長期为資产阶級服务的社会学批判改造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样的社会学是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指导下的社会学，是把資产阶級社会学中有用的思想資料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紧密联系起来的新社会学。尽管名称并沒有改变（主要的在于內容），显然不是旧社会学的重版。新中国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給这种新社会学开創了进行社会調查研究的良好条件，同时过渡时期的新社会也提出了許多新的重要的社会問題急需这种新社会学認眞地进行調查研究，求得合理的解决安排。現在，正有着光輝的前景，在等待着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新中国的社会学。

資产阶級的經济学不是科学

郑伯彬

一

民盟中央的“科学規划問題”研究組，在最近国务院科学規划委員会召开会議討論我国科学体制問題的时候，提出了“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問題的几点意見”这样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綱領。

在这个綱領里，有不少篇幅涉及社会科学的問題，而关于社会科学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不滿意有人認为資产阶級的社会科学是不科学的，不滿意“对于資产阶級社会科学只有批判，談不到接受”；主張把資产阶級社会科学“应当恢复的应立即采取适当步驟予以恢复，应当重視的就应重視起来”。

显然，这一綱領的眞正意圖，是要“恢复”資产阶級的社会科学，反对批判資产阶級的社会科学，換句話說，也就是要求大家接受資产阶級社会科学，反对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或者至少是要重新抬出資产阶級社会科学来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科学相抗衡。

資产阶級的社会科学是不是科学的呢？批判資产阶級的社会科学，是不是应該呢？我以为这些問題是早已不存在了，为什么到今天还会出現这些問題？除了右派分子企圖在各个方面展开他們的瘋狂进攻以外，实在不能作其他的任何解釋。

但是，問題既經重新提了出来，我們就有必要再来展开討論。在这里，我們不能討論資产阶級的社会科学是不是科学的問題，因为社会科学的范圍太广，不是这篇短文所能解决的。作为一个經济学的研究者，我倒很願意就社会科学的基础部門——經济学，提出来研究。自然，經济学所涉及的范圍，也很广泛，在这里，即使專对經济学来討論，也只能結合着某些主張恢复旧經济学的人們所特别不滿意的若干主要問題来分析。

二

經济学中的一个中心問題，是价值論的問題。在討論資产阶級經济学是不是科学的問題的时候，是可以首先以資产阶級的价值理論作为一个具体的研究对象的。京津解放初期，許多大学曾經开过这样一种所謂“价格經济学”的課程，不久，这門課程停开了；它的开設和停开，反映了人民对于資产阶級經济学的認識过程。民盟的这个綱領所不滿意的“某些科学解放后竟被废除”，使他們“在情緒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的，也可能包括这門課程在內。为了究明某些“科学”是否应当廢除，我們也有必要对資产阶級的价值論进行具体分析。

在資产阶級經济学中，最使我們重視的，是以亞当斯密与李嘉圖为代表的古典的劳动价值論。古典的劳动价值論虽然还有許多不正确地方，例如，他們混淆了商品价值的决定与价值的分配問題，也混淆了商品本身的价值形成与当作資本的价值增殖的問題，从而，不能揭露价值的本質是在物的掩盖下的生产关系；但是，他們是正确地指出了劳动是一切商品交換价值的眞正尺度。

这样，右派分子所希圖抬出的資产阶級經济学，还不是古典学派的經济学，而是那些在他們看来是“能够眞正解釋价格現象的”各种庸俗的价值論。这里包括以供求关系来决定价值的供求論，以人的主观評价来决定价值的限界效用論，以及以現代英国学派为首的壟断資本主义下的各种价值理論。

我們無妨簡單地說明一下，这些“經济学”倒底是一些什么东西？供求論者認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供求关系，也就是决定于市場上竞爭的兩股力量，当商品的供給大于商品的需求，商品的价值就会下降；反之，当商品的需求大于商品的供給，它的价值就会上升。誰都能够看到，这种說法是不能說明商品价格的基础——价值是怎样决定的。照供求論的說法，商品在交換之前，应当沒有价值，否則，供求决定价值就失去它的前提。实际上，供給和需求是以社会劳动量、即价值为前提的，它只是在商品价值的基础上影响价格上漲或下降的因素，而不是商品价值决定的因素。

在所謂“价格經济学”中經常抬出的，还不仅是供求价值論，还有資产阶級奧大利学派的限界效用論。这种理論肯定地說，商品的交換价值应直接从人們主观的估价中去求得。它的出發点是：認为国民經济是由無数个别的經济單位所構成的，个别經济單位的需要或人們的欲望的滿足，都可以按其重要性排列为不同的等級。例如人們首先要滿足的是維持生存的欲望，即食品的需要；其次也許就是衣服和住宅的需要；再其次，就是烟草、酒、音乐、裝飾品等等的需要。把人們的欲望按照需要的强烈程度排列起来，可

以制成“欲望种类表”。并且說，人类欲望的滿足还有遞減的現象，例如对于飢者食欲的滿足，第四、第五碗飯总不及第一、第二碗飯，所以，人类主观对某一商品的效用的評价，也有遞減的趋势；而决定它商品价值的，就是要滿足的欲望中最不迫切的那个具体欲望：即商品的价值不是由它的最大效用，也不是由它的平均效用，而是由它的最少效用决定的，这最少效用就是所謂“限界效用”。这一派的經济学者認为，限界效用是每一經济主体以其自己的收入来应付各种需要的唯一标准。

这种資产阶級的价值論的科学性在那里呢？誰都能看到，这是站不住脚的。商品的使用价值既不能互相比較，而所謂“限界效用”，对不同阶級的人們来說，也不可能完全相等。既然使用价值在質上是互不相同的，商品就不可能按照使用价值来进行交換，“限界效用”也不可能是商品价值的决定者，这个道理是再簡單不过的。退一步說来，即使商品的限界效用的高低和該商品的价值的大小是相符的，我們也不能因此認为商品的限界效用与商品价值間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如果我們研究一下資本主义制度下商品价格波动的各种因素，就不难看出，这里是不存在任何必然的依存关系的。对于这种完全不能說明經济現象的資产阶級經济理論，認为是科学，不应該加以批判或忽視，眞是不知倒底有什么根据！

自然，資产阶級經济学的热心拥护者們，更主要的还是热中于以現代英国学派为首的現代資产阶級經济理論。这里包括劍桥学派以及其他在壟断資本主义下的各种經济学說。

所有这些現代的資产阶級的理論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以价格代替价值，不再探討商品价值的本質、实体，也不再闡明价值量如何决定的理論体系了。这不仅限于現代的英国經济学者，且也包括欧洲大陆的若干資产阶級經济学家。例如拜来(Bailey)說，財貨的价值决定于物与物的相对关系，并無所謂內在的肯定的价值；德国的馬堡学派(Marburger Schule)也否認价值論，从那所謂动态經济学家馬歇尔起直到在我国曾經風行一时的凱恩斯止，也都有这类意見。这些現代的資产阶級經济学者之所以产生这种看法，显然是在壟断資本主义下，資本主义的矛盾空前尖銳，为了更好地为壟断資本主义辯护，不能再涉及像价值的本質这样帶有根本性的問題了。然而，我国的一些資产阶級經济学的拥护者們，却至今还在留恋这些理論。

这些理論有什么可取之处呢？如果以馬歇尔的說法为例，他認为：商品的需求取决于商品的限界效用，并由此形成商品的需要价格；商品的供給取决于商品的限界生产費用，并由此形成商品的供給价格。需要价格与供給价格的均衡，就是均衡价格，或是价值。上面說过，限界效用是主观的，無法用統一的單位来衡量，因而，也就無法說明需要价格的多少；而限界生产費用，照馬歇尔的說法，是在生产上处于最低等地位的每一生产單位所必須的生产費用，这个說法，更是充分暴露了他除了維护壟断資本家的最大利潤以外，是完全不合乎客观事实的。因为，需要价格与供給价格如果处于均衡状态，無論多么小的企業也不会倒閉，如果不均衡，則小企業为大企業所排挤，也不是断壟資本家的責任。

企圖摆脫傳統說法的凱恩斯，对于价值論，也同样沒有給我們任何新东西。他說，一般物价水平，一部分决定于限界成本中各生产要素的价格，一部分决定于生产規模。更重要的，是商品需求的改变对于成本与产量二者的影响。从而，凱恩斯認为，要解决这个問題，需要一个关于貨幣經济的全盤理論，否則，就会像傳統的經济学家那样，在討論价值論时，說价格决定于供求情况，在討論貨幣与物价时，又說价格决定于貨幣数量、流通速度之类，使人們如墮五里霧中，什么也弄不清楚。然而，凱恩斯自己是否眞正弄通了呢？沒有。他和其他現代的資产阶級經济学者一样，以价格代替了价值，并沒有探討价值的本質，他知道，如果探討价值的本質，就不可避免地要揭露資本家殘酷剝削劳动者的秘密。

以上所述的資产阶級經济学中的价值理論，只是極其簡單扼要地說明了几个主要流派的几个主要論点。但是，仅从这里，就不难看出：資产阶級的經济学在这方面的研究，不是科学的。它不但沒有說明商品价值的本質，也不能眞正闡釋价值运动的規律。我們暫且不論这些价值理論都不能解釋另一社会形态（例如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价值的形成原理，右派分子認为只有資产阶級的价值理論才能解釋价格現象的說法，沒有絲毫事实的根据；即使在資本主义社会，这些理論也是不能闡明、或不能完全闡明商品价值的本質和决定的原理。特别是現代的資产阶級經济学的价值理論，为垂死的資本主义世界辯护，不敢接触价值的实質，更是沒有任何科学的因素。批判資产阶級的价值理論，并沒有什么不当之处。現在的問題，决不是“只有批判”，而是批判得不够。

三

資产阶級經济学的复辟者們，除了要恢复資产阶級的价值理論以外，还要恢复資产阶級的貨幣信用理論。这里包含有各种不正确的主張，有的認为馬克思的貨幣理論不能解釋我国今天的人民幣，有的則索性認为馬克思关于貨

幣信用的本質与职能的研究，把作用簡單化了，在貨幣經济發达的今天已沒有現实意义，不如資产阶級經济学对貨幣与信用作用的分析来得合理实用。

馬克思的貨幣理論是不是不能解釋今天的人民幣呢？除了表示对馬克思学說的無知外，我以为無論如何是不能得出这个結論的。然而，在我国的經济学界中，有的說："作为价值尺度的人民幣，已經不是当作金子（或銀子）的代表，而是当作基本生活的代表"。有的則以为社会主义国家按照劳动生产率調整价格，"不得不放弃这个名义上的黃金作为价值尺度"，"黃金已不再是商品的价值尺度，价值法則对于商品流通所起的作用已和黃金毫無任何內在联系。"所有这些論調，都是对馬克思貨幣理論的严重歪曲。馬克思曾經明确指出，貨幣作为价值尺度，是"供商品界以价值表現的材料，或是把商品价值表現为同名称的量，使其在質的方面相等，在量的方面可以互相比較，这样，它就成了价值的一般尺度"。（"資本論"，第一卷，第81頁，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所謂"基本生活"是什么呢？它能作为各种商品之所以互相比較的尺度嗎？貨幣的这一职能，無論何时都是以其自身所含价值作为具体的尺度来計量各种商品的价值的，而"基本生活"这样一个抽象的东西，怎样能够作为具体的尺度？至于說社会主义国家按照劳动生产率来調整价格，从而得出黃金已不是商品的价值尺度的說法，更是混淆了商品的价格形成与貨幣的价值尺度职能二种不同的概念。商品的价格形成，是一回事，貨幣的价值尺度职能又是另外一回事；不論它根据什么来調整价格，貨幣的价值尺度职能总是存在的。怎样能够因为国家按照劳动生产率調整价格，就認为黃金已不再是价值尺度？这里，除了表示反对馬克思的貨幣学說外，实在沒有任何新的东西。

然而，不滿意馬克思貨幣信用的本質与职能的理論的人們，企圖恢复資产阶級的貨幣信用的理論，又是什么貨色呢？

資产阶級經济学中关于貨幣信用的学說，我們大致可以分为二大类。一类是把貨幣与信用看做經济社会的一种工具，否認它有主动的作用；一类是認为貨幣与信用具有重要的主动作用，它能支配商品生产与流通，同时，也是經济生活的唯一的或者是主要的扰乱因素。

前者是資产阶級的古典学派的共同主張。例如，密尔（J.S.Mill）認为在所有經济社会中，貨幣除了具备时間与劳力的节約性質以外，在实际上，不能有其他的意义；亞当斯密把貨幣看成只是輔助財貨流通的車輪或大道，都是显著的代表。

但是，資产阶級經济学的复辟者們，更主要的还是要恢复現代的資产阶級的貨幣信用論，而不是这些古典学派的理論。現代的資产阶級貨幣信用理論，主要是主張有主动作用的。我們也大致可以把它分为二大派别：一是特别重視"現金差額"的研究，通过所謂"現金差額的方法"（Cash Balance Approach）来說明貨幣的主动作用的；一是注意資本，特别是儲蓄与投資的关系，通过所謂"資本的方法"（Capital Approach）来說明貨幣的主动作用的。这二个学派有共同的主張，就是認为資本主义的經济危机是由貨幣信用的不正确的运用造成的。例如，霍曲萊（R.G.Hawtley）从各个經济主体手中所保有的現金差額的变化，或貨幣的退藏与投放，断定經济社会的扰乱現象是基因于流动資本所帶来的惡循环，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魏克雪（K.Wicksell）把利率分为自然利率与市場利率二种，說自然利率是由現实資本的物理的限界生产力决定的，或是由借貸資本的供求处于均衡狀态决定的；如果銀行把利率降低于自然利率或均衡利率以下时，借貸資本的需要就可以增加，銀行乃必創造信用以滿足此种需要，結果，就可以引起貨幣資本需要的积累过程；反之，如果市場利率提高到自然利率以上，則对借貸資本的需要势必减退，总貯蓄的某一部分即不可能形成資本。換句話說，銀行通过利率的上升或下降，就可以調节資本活动，免除資本主义的經济危机。在这点上，凱恩斯也是具有类似的意見的，他認为在一定的条件下，貨幣是可以当作一种飲料，用来刺激經济体系，促其活动的。

这种貨幣信用的理論說明了什么呢？它不但不能說明另一社会形态的貨幣与信用的作用，即使在資本主义社会，（更正确的說来，即使在壟断資本主义阶段）也不能說明貨幣与信用的眞正作用。因为誰都能够看到，無論从現金差額的方法或是从資本的方法来研究貨幣与信用的作用，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錯誤，就是他們把貨幣、借貸資本、和資本这三个不同的經济范疇混淆了。貨幣流通与信用活动，無論任何时候都是在商品生产与流通的基础上进行的，尽管貨幣流通与信用反过来对商品生产与流通有重要的影响，但貨幣和信用的活动总不能脫离商品生产与流通的基础而孤立存在。銀行是否可以任意投放貨幣或借貸資本于再生产过程中呢？这不决定于銀行，而是决定于現实的再生产过程。具体的說来，就是决定于：在現实的再生产过程中，有無扩充生产的可能，也即生产手段或劳动力等客观条件是否允許現实資本的蓄积。而这些客观条件都不是銀行業者所能决定的。

資产阶級的貨幣信用理論，由于不敢闡明在資本制下的商品生产的資本的特質，不敢揭露資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手段私人占有的矛

盾，認为資本主义的經济危机是一种貨幣現象，倒底具有什么科学性呢？他們的学說，在光輝的馬克思主义面前所暴露的，只是对于貨幣与信用的本質与职能的不正确理解，对貨幣和資本的基本概念的茫然，以及不能理解借貸資本与現实資本的相互关系吧了。

馬克思的貨幣信用理論和資产阶級的貨幣信用理論完全相反，它对貨幣与信用的本質与作用作了正确的闡明与估价。馬克思的貨幣信用理論絲毫沒有过时。他正确地指出了，貨幣、借貸資本和資本都是不同的范疇；也正确地分析了貨幣和信用的作用，一方面不以为只是商品生产与流通的簡單的媒介，另方面也决不把貨幣与信用看成可以創造資本，从而支配国民經济的活动的东西。

我們在近年的实踐中，也可以看出来，眞正合理的、有用的，是馬克思的貨幣信用理論，而不是那些資产阶級的貨幣信用理論。資产阶級經济学的复辟者們，为什么不了解一下我們今天的現实情况，我国利率的决定，我国的銀行信用与扩大再生产的关系？眞正能闡釋这些現象的，倒底是資产阶級的經济学，还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經济学？

四

除了上述关于价值、貨幣与信用的各个方面以外，資产阶級經济学的复辟者們，对于其他許多經济范疇，也同样企圖恢复資产阶級的观点。比方說，在所得与分配方面，就曾利用資产阶級經济学的分配論来否認定息的剝削性質。但是，关于这个問題，已不可能在这篇短文里詳細論及了。

資产阶級的經济学不是科学，仅从上述关于价值、貨幣与信用的資产阶級主要流派的主要論点里，已經可以充分看出来。民盟中央的这一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綱領，是我們所不能同意的；这个綱領企圖复辟資产阶級的社会科学，公开向馬克思列宁主义挑战，是我們坚决反对的。

对于这些非科学的資产阶級經济学，是否应該批判呢？毫無疑問，是应該批判的。無情地、徹底地批判这些資产阶級的东西，一点也不过份。理由很簡單，就是因为它并不是什么科学。

自然，我們批判各种非科学的資产阶級的經济理論，并不等于拒絕接受有用的文化傳統。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無論何时总是尊重各种文化傳統的。但是，接受优良的文化傳統，决不意味着要讓資产阶級的非科学的經济学复辟。

反对資产阶級右派分子的斗爭，是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它对于我国学术界以及广大知識界的思想改造，胜利地进入社会主义，具有特别重大和深刻的意义。本刊为了投入这次庄严的斗爭，从学术理論方面針对右派分子的言行予以揭發和批判，在这一期上，我們以首要篇幅發表了这一方面的文章。

在过去一段时期中，由于我們的政治嗅覚不灵，給右派分子以可乘之机，他們曾先后利用本刊篇幅，發表了陰謀恢复資产阶級社会学的文章。当时，我們未能洞察他們别具野心，当成了一般的学术討論問題，因之，我們曾就这一問題發表了几篇文章，并且組織了座談会进行討論。我們为了辨明是非，廓清影响，業已开始就过去一段时期的工作，进行檢查，并將組織文章进行批判。

章乃器是怎么样的一个"經济理論家"？

吳大琨

右派头子章乃器在解放前与解放后都曾写过相当数量的，有关財政，經济方面的文字。他的喽囉們并曾称之为"杰出的經济学者，財政專家"。①因此，章乃器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經济理論家"也还是值得我們大家来加以檢查的。

一　章乃器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經济学者"呢？

章乃器曾自命为是馬克思主义的經济学家。他在这一次的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提出的檢討書中，也曾自己吹噓說是"一个在資本主义的泥坑里就追求社会主义的人"。但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因为就他在解放前所發表的主要著作看，都不能証明他是在追求社会主义，而是恰巧相反，在追求資本主义，这也并沒有什么奇怪，因为，我覚得章乃器，如果要作为一个"經济学者"来看的話，那么，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民族資产阶級的代言人。

打开章乃器在解放前所出版的那些主要著作来看，我們就可以看到，章乃器在一定程度上是主張反帝的，特别是抗日的。他也在一定程度上是主張反封建的。反帝与反封建这本来是中国民族資产阶級的兩大政治要求，所以章乃器有这些主張是并不奇怪的。但他当时所追求的，却确实是資本主义。

举一例来說，章乃器在解放前，曾經有过一个重要的經济主張，那就是他要"完成一个現代的銀錢市場，創造一个現代的資本市場"。这一主張，用他当时自己的話来說是这样的：

"华商銀行底缺点，第一是沒有一个票据貼現市場。信用制度进展的程序，应該是由对人信用，进到对物信用，再进到票据信用；然而华商銀行始終还只是留滯在对物信用阶段，銀行变成大規模的典当。然而要补救这个缺点，必須先造成票据；这必須工商業家在挂賬买卖貨物之际，用票据去代替賬簿上的債权；銀行然后可以对票据貼現。

第二个缺点是沒有一个資本市場。在上海外人設立的众業公所，几乎專做外人在华事業底股票和債票买卖，証券种类有一百五十种左右；而中国人設立的华商証券交易所却变成一个專做公債买卖的'財政市場'。然而，这当然也并不是华商証券交易所不好，因为事实上市面上沒有可供买卖的股票和公司債票哩！中国工商業家应該如何去發行股票和債票，銀行应該贊助股票和公司債票底發行，以造成一个資本市場：这也是目下的一个大問題。"②

章乃器的这个主張，最初是由他个人提出的，后来就变成是当时的中华工業总联合会所委托他起草的"工商業金融問題研究报告書"③中的具体主張，也变成了是当时的"工商業复兴委員会""对于增加籌碼問題之意見"中的一个意見④。可見章乃器的这个主張，在当时是得到了中国民族資产阶級的拥护，代表了中国民族資产阶級的要求的。大家知道，当时的中国正是由于日帝国主义的武裝侵略，以及美帝国主义的"白銀政策"而發生了严重的民族經济危机的时候，可是章乃器的主張却还仅仅只是要想"完成一个現代的銀錢市場，創造一个現代的資本市場"，这是多么微弱的一个要求，但即連这样的一个要求，当时也未能实現。

章乃器的这个主張是早在抗日战爭前的上海就提出的。就我所知，后来，他在抗战时期的重庆，以及更后的时期，也曾經再度提出过。但他这个主張，終于沒有能够全部見之实行，这当然也是必然的。因为中国在解放前，乃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是不可能完全具有这些"現代的"（也就是資本主义的）銀錢市場与資本市場的。当然，章乃器在当时提出这些主張来，也并沒有什么不可以，因为这是符合于中国民族資产阶級当时的要求的。問題就在，根据这个例証来看，如果要說章乃器所追求的不是資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那就很难使人信以为眞了。

我們只有实事求是地把章乃器看作是一个中国民族資产阶級的代言人，然后我們才能眞正地理解章乃器作为一个"經济学者"的本来面目。

---

① 章乃器著："論中国經济的改造"，編校后言，五十年代出版社版。

② 章乃器著："中国貨幣金融問題"，生活書店1936年版，第36頁。

③ 同前引書，第355頁。

④ 同前引書，第364頁。

二　章乃器对中国的民族資产阶級是怎样估价的？

由于章乃器乃是一个民族資产阶級的代言人，所以他对中国的民族資产阶級是确实有着他的深厚的阶級感情的。——这在解放以后，特别表現得明显。

本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的革命就已进入社会主义的革命阶段。資本主义已經成为了是要逐步被否定的东西。但章乃器却由于他的阶級本質的局限，对于中国的資本主义有着不同的看法；从而对于中国的民族資产阶級也就有了不同的估价。在章乃器的心目中，中国的民族資产阶級就簡直是一个品質好到了極点，前途也是一个可以大为發展的阶級。我們可以从章乃器在解放后所發表的言論中，随便找一下，就可以找到很多材料来加以証明的。例如他在解放后的不久，就曾說过下列的話：

"中国的产業家的确有一部分人存心并不'唯利是圖'；而是想做一番事業的。他們和欧美資本家比起来，力量也眞太小。就說自己吧，当有人說我是資本家的时候，我也有点不好意思承認。我尤其明了，在过去，中国工商業家眞要'唯利是圖'的話，做生产事業就太傻了。其实'唯利是圖'和剝削是兩回事，前者是主观的，而后者是客观的。剝削的結果也可以無利可圖，因为利潤是被帝国主义者，封建势力和官僚資本家所夺取了。此外，某些做生产事業的人，主观上即使并不'唯利是圖'，但是依然需要謀取利潤，以滿足資本家賺錢分紅的要求。这些企業經营家在主观上不'唯利是圖'，不存心剝削，不一味的代表資方，乃是資本主义青年时代产業家可能有的美德，是足以珍貴的。"①

到了1951年，他又說了下列的話：

"剝削是不是都是要不得的呢？为什么新民主主义之下，还要允許資本主义剝削的存在呢？这是因为剝削的性質是有所不同的。有的剝削，像封建地主，官僚資产阶級的剝削，和資本主义發展到最高阶段的剝削，是社会向前發展的障碍，必須肃清它。有的剝削，如資本主义青年期的剝削，在社会發展上可能起一定的进步作用。区别剝削好不好的标准，要看它究竟在这一个社会里是否有害或有利于生产力的發展，这是主要的。因为中国的民族資产阶級剝削是資本主义青年期的剝削，是可以而且应該在'公私兼顧'，'劳資兩利'的政策之下，允許它的存在的，这种合理合法的剝削制度的存在，从長远的人民利益看是無害的。这种剝削还是帶着进步性的，做民族資产阶級是光荣的。"②

大家都可以从这兩段引文中看到，章乃器在这里是十分錯誤地把解放后的中国資本主义的發展，即实际上已到了快接近死亡（消灭）阶段的資本主义發展，竟然看成了是在資本主义的青年时期的發展了。这样的一个錯誤的时代估計，当然会使他对于有关民族資产阶級的一切問題的看法，特别是对他們的剝削問題的看法發生了原則性的錯誤。

在章乃器的心目中，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中国民族資产阶級，竟然早已是一个在大体上消灭了"兩面性"的阶級。他說：

"不能否認，过去民族工商業者，在反动統治之下，是有兩面性和动搖性的，是不太可靠的；但是，也不能否認，經过一年多新时代的教育，他們的兩面性和动搖性已大体消除了。如果还把解放初期甚至在反动时代的眼光来看他們，就不符事实了，不适当了。如果我們永远这样看他們，那就缺乏对新事物的認識，对四个阶級和平地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論沒有信心，就会在社会向前的时候自己的思想落了后。"③

章乃器在这里不但認为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中国民族資产阶級已經早就在大体上消灭了"兩面性"，而且还甚至否認了中国在过渡时期的阶級斗爭的存在，竟然認为中国的四个阶級是可以"和平地"走向社会主义的。客观的事实，当然完全并不是这样。客观的事实是：解放后的中国民族資产阶級的生产活动，虽然有它有利于国計民生的一面，但也同样地还有它危害国計民生的一面。所以正当章乃器在大言不慚地說中国民族資产阶級已經在大体上消灭了"兩面性"的时候，偉大的"五反"运动暴發了，事实証明了中国的民族資产阶級，当时不但有"兩面性"，而且还正在向中国的工人阶級进行猖狂的进攻，也就是还有激烈的阶級斗爭。

但尽管章乃器对于解放后的中国民族資产阶級的估价，在事实的面前破了产，章乃器却总还是要把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中国民族資产阶級說成为是一个革命的阶級的。所以章乃器曾有过中国的民族資产阶級乃是"紅色資产阶級"的說法。

章乃器曾說过："在工人阶級領导之下成为一个革命阶級的中国民族資产阶級，說它是紅色資产阶級是說不到夸張的。"④

事实証明：章乃器在解放后对于中国民族資产阶級的認識，还依然停留在解放前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

---

① 章乃器著："論中国經济的改造"，五十年代出版社版，第145—6頁。着重点为本文作者所加，下同。

② 中国民主建国会："民訊"，第12期。1951年6月。

③ 同上。

④ 中国民主建国会二中全会彙刊，1956年11月6日。

命时代的認識阶段上。在思想上落后了的，因此并非别人，而正是章乃器自己！

三　章乃器是怎样在解放后成为抗拒党对中国民族資产阶級分子改造政策的"理論家"的？

章乃器既对中国的民族資产阶級有了像在前面所說的那种錯誤估价，因此在章乃器的心目中，中国的民族資产阶級分子在进入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后，要認眞地接受工人阶級的領导与改造的想法是沒有的。不但沒有，而且他是在实質上，加以抗拒的。

因此，如果說，中国在解放后，党对于中国的私营資本主义工商業的政策，乃是逐步推行私营資本主义工商業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的話，章乃器作为一个中国民族資产阶級的代言人在这一个偉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恰巧成为了是一个反对这一社会主义改造的資产阶級的"理論家"的角色。

章乃器是确实有他的一套要工商界抗拒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論"的。

这首先就是表現在他的否認中国民族資产阶級在解放后还具有"兩面性"这一点上。前面曾經說过，章乃器实际上是認为中国的民族資产阶級在"五反"以前就已經在大体上消灭了它的"兩面性"的。去年全行業公私合营以后，章乃器就又旧事重提，認为中国的民族資产阶級的"兩面性"已經基本上消灭了。用他自己的話来說，則是这样的：

"改变生产資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極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現在在我国已經基本上完成了。'（"八大"政治报告）这句話能不能解釋为民族資产阶級政治上和經济上的兩面性的物質基础已經基本上消灭了？如果可以这样解釋，那么，我們就可以說：民族資产阶級政治上和經济上的兩面性也已經基本上消灭了；留下来的只是殘余或者尾巴罢了。

实际上也正是如此。由于股息已經改为定息，私方人員已經成为收入一定工資的公职人員，企業的盈亏同資本家不發生直接的利害关系，他們已經完全沒有必要再从'唯利是圖'出發，重施'五毒'，發揮經济上的兩面性中的消極性了，当然也談不到政治上企圖發展資本主义的反动的一面了。"①

这个說法，显然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就曾明确指出：

"有人說，中国資产阶級現在已經沒有兩面性了，只有一面性。这是不是事实呢？不是事实。一方面，資产阶級分子已經成为公私合营企業中的管理人員，正处在由剝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轉变过程中；另一方面，他們現在还在公私合营的企業中拿定息，这就是說，他們的剝削根子还沒有脫离。他們同工人阶級的思想感情、生活習慣还有一个不小的距离。怎么能說已經沒有了兩面性呢？就是不拿定息，摘掉了資产阶級的帽子，也还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間繼續进行思想改造。如果認为資产阶級已經沒有了兩面性，那末資本家的改造和学習的任务也就沒有了。"

章乃器的所以要說中国的民族資产阶級已經在基本上消灭了"兩面性"，目的当然就在要否定中国民族資产阶級分子的改造和学習的任务。

章乃器最初企圖否認中国民族資产阶級有"兩面性"，后来当他感到否認不了时，他就又設法把工人阶級也說成是有"兩面性"的阶級，企圖混淆中国的工人阶級与民族資产阶級的区别。

章乃器故意歪曲毛主席在第十一次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議上的講話，認为毛主席是主張一切阶級都有兩面性的——即甚至工人阶級都有兩面性的。章乃器說："工商業家理解到：既然什么阶級什么人都有兩面性，都需要改造，民族資产阶級当然有兩面性，当然更加需要改造，民族資产阶級比起其他的阶級消極的一面而且还要多一些；除了思想作風問題以外，而且还有不劳而获的收入的尾巴——定息。"②換句話說，在章乃器的眼光中看，目前資产阶級与工人阶級的区别，只是簡單地"多"了一个"定息"，在思想作風上，那是大家都一样地有"兩面性"，都需要"改造"，完全沒有什么本質上的差别的。

其实，毛主席所强調的，就恰巧正是："剝削者的改造和劳动者的改造是兩种不同性質的改造，不能混为一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章乃器为了要使中国今天的民族資产阶級在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取得"理論"上的武器，还特别从根本上反对了人在阶級社会內的阶級性。

章乃器說："人的特点是共性（一般性），人的共性首先表現在大家都是人，人同野兽有本質的区别，其次是大家都是現代的人，不是古代的野蛮人；又其次对中国人来說，还須記着，大家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一般都爱中国。"③

章乃器又說："我們目前正处在人的阶級特性基本消灭，大伙兒共同向人类的共同本性过渡中。我們

---

① 見民建会二中全会彙刊，1956年11月6日。

② 章乃器："关于中国民族資产阶級的兩面性問題"，"工商界"月刊，1957年第6期。

③ 同注①。

应該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承認人的阶級特性殘余的客观存在和長期存在，但絕不应片面夸張阶級特性，而不同时指出人类共同本性的偉大目标。”①

在这里，章乃器故意要混淆阶級区别，模糊大家对今天的阶級斗爭还存在的認識的意圖眞是再明显也沒有了。

从以上的这些荒謬的基本“理論”出發，章乃器当然是决不会承認今天的中国民族資产阶級分子是还需要什么本質上的改造的。

章乃器惡毒地把一切依据党的政策，主張工商業者还需要进行本質的改造，也就是“脫胎換骨”的改造的人都罵成为“教条主义”者。然后他又打起了“反教条主义”的旗子，索性公开地挑撥工商業者接受党的改造。

章乃器說：“教条主义者向算命先生拜了老师，硬說資本家的改造是阶級本質或者阶級本能的改变，这就不能不在新国家成立已近八年的今天，仍然高談‘脫胎換骨’了。”②

章乃器又說：“教条主义者一貫低估民族資产阶級的进步。应該看到，八年来，他們經常处在阶級斗爭的火綫上，飽經了斗爭火焰的洗礼，这对于他們的教育和煅煉是十分深刻的。这种火焰移轉到了某些教条主义的官僚面前的时候，已經变成了温室中的暖气，成为教条主义官僚們的享受。正因如此，民族資本家进步了，教条主义官僚們反而落后了。”③

試看，这是对党的改造方針的何等露骨的挑撥与抗拒！

因此，我們認为：把章乃器看成是一个八年来代表了中国民族資产阶級抗拒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一面的“理論家”来說，是一点也沒有什么过分的。

总結以上所說，我們可以看出，章乃器实在并不是像他自己所吹噓的那样“一个在資本主义的泥坑里就追求社会主义的人”。他是一个道地的中国民族資产阶級的代言人。他在解放前追求的是資本主义，他在解放后，当絕大多数工商業者在党的領导下逐步放弃資本主义的理想准备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他依然还在歌頌中国的資本主义、中国的資产阶級，并未表示一絲一毫地願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意圖。这样，就使他自己不但越来越离开了党，也使他自己越来越离开了广大的願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商業者們！

就章乃器的“經济理論”来說，也是这样。他在最初，当中国还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情况的时候，他的“理論”是代表了当时中国民族資产阶級的反帝反封建与發展民族資本主义的要求的。如果說，那是章乃器的“理論”在工商界中起进步作用的时候，那么当解放之后，中国的民族資产阶級已經到了必須接受工人阶級的領导与改造的时候，他的那些抗拒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論”，便变成是在工商界中起完全反动作用的“理論”了。

章乃器本来是可以在中国的工商界起进步作用的，他也是应当在中国的民族資产阶級分子中起帶头接受改造的骨干分子的作用的。但他沒有这样做。八年来，他接受了党对于他的信任，可是却沒有接受党对于他的改造。他一点也沒有覺得，他自己就应当首先接受改造，一个“脫胎換骨”的改造。由于他的拒絕接受改造，他的阶級本質的坏的一面，就逐步發展起来，使他終于成为了一个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抗拒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抗拒接受党的領导的右派分子的头子！

当然，这說来也是一种历史發展的必然結果。我們从章乃器这个人的整个發展过程中，是也可以充分地看到了历史車輪向前进展的痕迹的！

1957，7，20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紅楼。

---

① 章乃器：“关于工商改造輔导工作的几个問題”，1957年6月9日“大公报”。

② 章乃器：“关于中国民族資产阶級的兩面性問題”，“工商界”月刊，1957年第6期。

③ 同上引。

关于哲学思想的阶級性与繼承性

張岱年

哲学是社会的上層建筑的一部分，在有阶級的社会中，哲学思想必然是有阶級性的。研究哲学史，首先要对于过去的哲学思想进行馬克思主义的阶級分析。同时，哲学思想的發展又是有繼承性的，哲学的历史是一个不可割断的發展过程。然而，如何对于哲学思想进行阶級分析呢？如何理解哲学發展中的繼承性？这都是相当复杂的問題。近来在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討論中，已經接触到了这些問題，許多同志們提出了不同的意見。本文尝試再作一些簡單的分析。本文中所提出的分析，主要是就中国哲学史上的情况来講的。

一　阶級分析与理論分析

（1）对于哲学思想进行阶級分析的途徑

哲学思想是社会的經济基础的反映。哲学范圍内的斗爭是阶級斗爭在思想上的反映。然而，哲学思想与經济基础的联系是曲折的、复杂的，而不是簡單直接、一目了然的。所以，恩格斯曾經把哲学称为"高高凌駕于空中的思想部門"（1890年10月27日致施米特的信）。惟其如此，所以發現哲学思想的阶級本質，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在近代資本主义社会以前，在奴隶制时代与封建制时代，哲学家虽然必不可免地站在一定的阶級立場上，然而却不一定能够認識阶級斗爭的事实。古代思想家虽然把人們分成为"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实际上并沒有明确的阶級观念。在事实上，当时的社会分成了彼此对抗的阶級，而对抗的阶級之間进行着不可調和的斗爭。然而，思想家們对于这个事实还不能够有明确的認識。因此，思想家們的阶級立場不一定是自覚的，至少不是充分自覚的。因其是不自覚的，所以他們的立場常常是漠忽的，摇摆的，甚至是矛盾的。这种情况也是我們在进行阶級分析的时候必須估計到的。

如何考察历史上某一个哲学家的阶級立場呢？这似乎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着手。第一，首先要看一个哲学家对于当时社会各阶級的态度；第二，要看一个哲学家对于当时的主要社会問題的主張；第三，还要看他的思想在实际生活中所引起的或可能引起的作用。

一个哲学家对于当时的政权持如何的态度？他对于人民的生活持如何的态度？他对于各阶層的人們采取了如何的看法？这在一般的情况下是比較明显的，有时也相当复杂。例如后汉时代的唯物主义者王充，一方面曾經極力贊美当时的最高統治者，一方面反对当时的"临民則采漁，处右則弄权"，"一岁典职，田宅并兼"的官吏（"論衡：程材篇"），同时却又有輕視体力劳动的傾向（同書，"效力篇"）。假如我們輕易断定王充是农民阶級思想家，或者簡單地認为他是中小地主阶級思想家，恐怕都是不恰当的。又如明清之际的唯物主义者王夫之，对于各阶級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然而他的看法却是复杂的、曲折的。他反对豪强貴族，又反对农民起义；他要坚持君子与庶民的区别，却又同情农民生活的艰苦，主張分别佃耕与自耕，按不同的标准收税。他鄙視商賈，却又說过"大賈富民国之司命"（"黄書：大正"）。他对于各阶級的态度如此复杂，所以我們要断定他的思想的阶級本質，就需要謹愼了。

其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要社会問題。例如北宋时代，"貧富不均"是一个主要問題。王小波起义，对群众說："我疾貧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后来鍾相起义，宣称"当等貴賤，均貧富"。可見人民已經把貧富不均看作首要問題了。思想家方面，李覯、張載都提出了"貧富不均"的問題，要求設法予以解决。而司馬光、苏轍却認为貧富区分是当然的、合理的，反对一切裁抑富人的措施。他們中間有立場的不同，不是很显然嗎？張載与司馬光是朋友（相当疏远的朋友），然而不能因为他們是朋友就忽視他們的思想在实質上的差别。

复次，一个学說的实际作用有利于哪个阶級，它就是屬于那个阶級的思想。所以学說的实际作用是必須考察的。思想学說的实际影响也有复杂錯綜的情况。一个学說往往会發生兩方面的作用。例如程朱学派的学說在实际上加强了封建礼教的力量，增加了礼教的殘酷性；但是同时也啓發了文天祥史可法等民族英雄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清代初年，張伯行等汉奸学者利用程朱来帮助巩固清朝对于汉族人民的統治，而呂留良却又憑借程朱学說来宣揚爱国抗清的思想。这些复杂的情况也是需要注意的。然而，一个学派在某一时期的主要影响在那里，仍然必須加以辨别。

在某一个有阶級的社会中所有的各种哲学思想中間，应該划一条基本的界限，即当时思想斗爭的主要陣綫，这是必需的。这条界限划在那里，却常需要审愼地考虑。例如，在中国封建时代，思想斗爭的基本界限应如何划定呢？能不能說：在封建社会中的思想家，假如不是反封建的，就是反人民的？假如是肯定封建制度的，就沒有进步意义之可言呢？我想，如果这样看，那就未免簡單化了。事实上，在封建时代，很少的思想家能够怀有推翻封建制度的念头；然而有許多思想家同情农民的苦难，他們反对統治集团对于人民的殘暴行为，他們主張尊重貧苦人民的独立人格，他們希望人民的生活过得更好一些，他們敢于正視当时的最严重的社会問題，虽然在实际上却只能提出一些空想性的改良主張来。应該承認，这类思想家在一定限度內是接近人民的。例如，汉代的王充，宋代的張載、陈亮，清代的王夫之、顏元、戴震，都是如此。王充虽曾歌頌当时的最高統治者，但是反对官吏們"損下益上"的行为。張載虽受到了后来封建統治者的尊崇（他并沒有歌頌当时的朝廷），但他提倡"爱必兼爱"，主張把一切貧苦的人都看作"吾兄弟之顚連而無告者"。王夫之憤恨当时一般人投降清朝，因而說了許多鄙視庶民的話，但是也極力主張減輕农民的負担。顏元也曾表示痛恨推翻明朝的农民起义軍，然而提出按人口分配田地的主張。戴震虽曾为清朝統治者服务，并沒有任何反对封建制度的企圖，然而激烈抨击了統治集团"以理杀人"的罪行。应該承認，这些思想家是和人民有一定联系的，他們对于当时的現实政治采取了批判的态度。

历史上也出現过对于封建等級制度进行了激烈批判的思想家，例如"抱朴子"中所記述的鮑敬言，唐末的無能子。然而他們只能提出消極的批判，不能提出积極的主張来，同时对于哲学思想本身也沒有作出重要的貢献。此外，明末的李贄曾經發表了一些反对礼教的言論，提出"民自治自理"的民主观念，而也沒有系統的反封建理論。在当时条件下，系統的反封建理論是不可能出現的。所以假如認为封建时代中进步思想的主流应当是反封建的思想，那就是不合实际的了。

此外，阶級对抗的形势与思想学說的分野，基本上是互相对应的，我們在进行哲学思想的阶級分析的时候，应該發現这种互相对应的情况。然而也应該注意，兩者不一定是完全一一对应的。在历史上，代表一个阶級的不一定只有一个学派；而一个学派也不一定仅代表一个阶級。同时也不是每一个阶級都有它自己的哲学家。例如，在先秦时代，荀子与韓非都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級的，而有儒法学派之不同。在宋明哲学中，程朱与陆王兩派斗爭得相当激烈，其实他們的政治立場基本上是一致的，他們兩派的斗爭乃是地主阶級中不同集团之間的斗爭。其次，王充的思想一方面反映了农民和小商人的一些要求，一方面也表現了中小地主阶級知識分子的态度。如果把王充思想簡單地归屬于某一个阶級，是不确当的。宋代的陈亮、叶适替商人阶級說了許多話，可以說都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商人的思想家；然而他們也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級的一些要求，这也是显而易見的。此外，在中国的封建时代中，是否有眞正的"农民思想家"？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問題。在封建时代，农民在經济、政治、文化各方面都遭受压抑，虽然經历了不断的斗爭，而仍然只是一个"自在的"阶級，沒有达到充分的阶級自覚，从农民的行列中还不可能出現哲学家。地主阶級知識分子，虽然可能因接近农民而同情农民，但是完全轉入农民方面，恐怕也是不容易的。同时农民也不一定能够提出徹底反对封建制度的綱領。所以，虽然一些进步的哲学家的思想必然要反映农民的一些要求；但是，如果肯定某人是农民思想家，却需要十分謹愼了。

应該承認，每一时代的先进思想就是符合当时的社会發展的客观需要的思想。然而，一个时代的社会發展的客观需要常常是复杂的，是多方面的。一个思想家不一定能够全面地符合当时社会發展的全部客观需要，而仅仅符合其某一方面。这种情况也是很自然的。例如商鞅、韓非猛烈反对世襲貴族，排斥旧貴族的頑固势力，这是符合时代要求的；然而他們不尊重人民的独立人格，把人民看作实現政策的工具，这就不符合时代需要了。实行法家学說的秦朝被人民大起义所推翻，并不是偶然的。孟子的学說在許多方面都与法家处在对立的地位。孟子提出了"民为貴，社稷次之，君为輕"的主張，虽然不是"人民作主"的民主思想，但是他反对重君輕民，反对絕对君权，还是很显然的。在这方面，孟子所代表的儒家学說符合了社会發展的客观需要。所以，应該承認，孟子学說也有明确的进步意义。如此，同一时代的先进思想之中，可以有不同的派别，甚至有相互敌对的学派，这应該是可以理解的。

总之，我們对于哲学思想进行阶級分析，旣要反对資产阶級客观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庸俗化的阶級观点。客观主义不承認社会思想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不从阶級斗爭来說明思想斗爭，因而决不能發現哲学思想的眞正本質。庸俗化的阶級观点从簡單的公式出發，而不从实际情况出發，企圖把一些簡單公式套在哲学家們的头上，而不顧思想学說的复杂情况，因而也不能發現思想学說的眞正本質。我們必須从实际出

發，掌握有关哲学思想的大量資料，然后才能發現哲学思想斗爭的內在規律。

（2）对于哲学思想的理論分析

我們对于一家的哲学思想进行了阶級分析，發現了它的阶級本質，这还不算完成了哲学史的分析的任务。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对于哲学思想的內容作理論的分析。

一个学說不仅有阶級意义，而且有理論的意义。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論到"平等"观念时說："这一观念特别因盧騷之力起了一定的理論的作用，而在大革命的时候及大革命之后，則起了一种实际的政治的作用，甚至現在在差不多所有国度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仍然起着显著的鼓动作用。这一概念的科学內容的闡明，正可以决定它对于無产阶級鼓动上的价值"（人民出版社1956年中譯本105頁）。一个概念有"理論的作用"，有"政治的作用"。对于哲学思想之理論的分析也就是对于概念学說之"理論的作用"的分析。

关于哲学的意义，毛澤东主席說过："自从有阶級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門，一門叫作生产斗爭知識，一門叫作阶級斗爭知識。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兩門知識的結晶。哲学則是关于自然知識和社会知識的概括和总結"（"整頓党的作風"）。这是关于哲学的本質的最精确的說明。一个哲学家进行概括与总結的时候，都有他的阶級立場。有的哲学家按照統治阶級的要求来进行总結，有的哲学家依照人民的願望来进行总結。一个哲学家从事这种总結是为了巩固当时的社会制度呢，还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狀况？这就是阶級分析所要研究的問題。一个哲学家对于自然知識与社会知識作了总結，他在事实上是如何总結的？他的总結的內容如何？在他的总結中那些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那些离开了正确的道路？他在人类知識宝庫中添加了什么新的內容，他的总結在人类知識發展的長流中發生了什么作用？这些問題就是理論分析所应該探討的了。

在进行理論分析的时候，应該考察一个哲学家在理論上的貢献。他討論了那些問題，解答了那些問題？在他的解答中那些是正确的，那些是妄謬的？这都是应該注意的。假若一个哲学家对于某一問題給出了正确的解答，这是他的貢献；假如他沒有給出正确的解答，而仅仅明确地提出了問題，这也是他的貢献。

在进行理論分析的时候，哲学思想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基本分野是首先必須注意的。同时也要注意每一家学說的各方面的具体內容。

一个哲学家的貢献可能在自然观或認識論方面，也可能在倫理学或社会观方面。假如一个哲学家謹严而篤实地总結了当时的自然知識，那么他就会在自然观方面有巨大的成就。假如一个哲学家謹严而篤实地总結了当时关于社会生活的知識，那么他就会在倫理学或社会观方面有卓越的貢献。有些哲学家虽沒有对于自然知識作出很好的总結，却对于治学方法或教学实踐作出了总結，他們对于自然观虽沒有貢献，却对于認識論作了重要的發展。历史上，在各方面都有貢献的哲学家是比較罕見的。一个哲学家在自然观、認識論、倫理学、与社会观方面的造詣常常不平衡。有些哲学家仅仅对于自然知識作出了精細的总結，而在社会思想方面却仅仅接受了傳統的見解。有些哲学家仅仅对于社会知識作出了总結，而在自然观方面却仅仅接受了流行的观点。这都是常見的事情，也都是很自然的事情。

惟其如此，所以一个哲学家的自然哲学与社会思想不一定是相互一致的。馬克思主义出現以前的唯物主义者在社会观方面的思想大致都是唯心主义的。这是因为，在資本主义高度發展的时代到来以前，事实上还沒有条件在社会思想方面作出科学的唯物主义的总結。历史上也有許多哲学家在社会观方面提出了一些进步的民主性的見解，而在自然观方面却仍然拘限于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的范圍之內。这就是因为他們仅仅对于社会知識作了精細的总結，而缺乏对于自然知識的研討。此外也有一些科学家对于自然科学的造詣很深，而对于哲学基本問題却不能給出正确的解答。例如北宋时代的沈括，对于天文地質都有貢献，然而是一个信仰鬼神的有神論者。这是由于他缺乏哲学素养，沒有接受以往的先进哲学家的啓迪。总之，实际情况是錯綜曲折的。

对于哲学思想的阶級分析是最重要的，然而它不能代替对于哲学思想的理論分析。在历史上起了巩固当时社会制度的作用的哲学，即所謂正統哲学，在內容上也并不是完全荒謬的。我們在断定了它的阶級本質之后，也还需要对它作理論的分析。事实上，完全荒謬的哲学是不可能取得統治地位的。所謂正統哲学，必然包含很多的夸大片面、顚倒事实的謬論，但是也必然在某一方面反映了客观实际，也必然在某一时期适合于社会發展的需要，也必然在某一方面尊重人民的一些要求。例如汉代董仲舒的学說，起了巩固当时封建政权的作用，而他所帮助巩固的封建政权在当时还是适合于生产的發展的需要的。董仲舒講天人感应，这是唯心主义，但他的体系中也含有一些唯物主义的材料。他把封建政权神聖化，然而他也要求最高統治者对于人民作一些讓步。对于这些复杂情况也是必須注意的。

何以某些学說取得了統治地位？何以某些露骨的反人民的思想在封建时代也不能取得优势？何以某些有进步內容的哲学著作也受到封建統治者的推崇？何以某些民主思想在遙远的后来的时代才發生了积極影响？这些問題在哲学史的研究中也都是不容忽略的。

二　哲学思想發展中的繼承性

（1）哲学体系的更迭与知識文化的累积

哲学思想是有阶級性的，不同的阶級提出了不同的哲学体系；同时哲学思想的發展又是有繼承性的，后一时代的哲学是前一时代的哲学之繼續發展。这兩方面都是事实。在表面上看来，这似乎是不易理解的。然而，从哲学的本質来看就可以知其所以然了。

"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識和社会知識的概括和总結"（毛主席："整頓党的作風"）。哲学是思想体系，同时也是知識。应該承認：一切思想都是客观存在的反映。这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哲学旣然是思想，所以哲学也是客观实际的反映，也是关于客观的認識。

同时，任何社会思想都决定于社会存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哲学是一种社会思想。因而哲学也受社会的物質生活所决定，所以哲学反映了阶級斗爭。

在阶級社会中，哲学必然反映阶級的要求，因而在阶級社会中哲学必然是有阶級性的。然而哲学又是客观实际的反映，哲学也是一种知識。人类的知識是逐漸發展起来的，經历了一个累积的过程。哲学的演变是人类知識累积过程的一部分。因此，哲学也是有繼承性的。

应該承認：哲学，从其本質来看，包括了兩方面。一方面，哲学是客观实际的反映，另一方面，哲学又是阶級利益的反映。惟其如此，所以哲学旣有阶級性，又有繼承性。

有些人專門着重哲学之为阶級利益的反映，于是覚得哲学思想的繼承性是不可理解的。这是忘記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思想是存在的反映，而把哲学看作完全脫离客观存在的主观臆造了。

从哲学之为客观实际的反映来看，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間有重大的区别。唯物主义在基本上是依照客观实际的本来面目来反映它的；唯心主义則是在客观实际本来面目上加以塗飾、加以增减、加以顚倒，結果只是歪曲的反映。然而唯心主义也不能不以一些片面事实作为最后的依据。任何夢想也都有其客观的根源。

人类的知識的發展是一个曲折的累积的过程，是一个由無知而有知，由淺知而深知的过程。前一时代对于世界的認識是后一时代繼續研究的基础。人类的文化的發展是一个由低級到高級的上升过程，前一时代的文化成就是后一时代繼續前进的基础。

在人类知識与文化的發展演进的过程中，哲学占有重要的位置。哲学發展的过程是哲学体系更迭代換的过程，也是关于自然知識与社会知識之正确总結之不断累积、不断提高的过程。

在哲学思想發展的过程中，前一时代所提出的反映客观实际的概念、范疇与命題，也就是前一时代所获得的知識，就是后一时代的哲学思想所由以出發的思想資料。恩格斯說："每一时代的哲学作为一个特殊的分工部門，都具有由它那些先驅者傳授給它，而它便由以出發的一定思想資料作为前提"（1890年10月27日致施米特的信）。所謂思想資料就是以前时代累积下来的一切总結性的知識。每一时代的哲学思想都是依据以前各时代累积下来的知識而發展的。

哲学思想發展的过程不是直綫上升的过程，而是曲折的螺旋式的前进过程。在哲学發展过程之中，有否定，有否定之否定；有批判，有斗爭。每一时期的思想繼承了前一时期的思想的某些內容，同时又否定了前一时期思想的某些內容。在演变推移的过程之中，前一时期的思想中的缺欠可能得到补充，它的錯誤可能得到糾正；然而前一时期的貢献也可能被抛弃，它的發現可能被遺忘。被遺忘的又重新得到肯定和提高，这就是否定之否定。

应該注意的是，在哲学思想的肯定、否定，与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存在着彼此对立的兩条路綫，存在着党派性。从整个文化来看，在历史上有科学与宗教的兩条路綫的对峙，有"兩种文化"的对峙；从哲学思想来看，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峙。

每一时期的唯物主义繼承了前一时期的唯物主义学說，对于前一时期的唯心主义可能有所吸取，可能接受其一些影响，然而基本上是加以否定加以批判的。在唯心主义方面也是如此。

这里可以就中国哲学史上举出很多的例子。孟子繼承了孔子的唯心主义成分，他虽然也受道家唯物主义的影响，但是他基本上是否定道家的。王充繼承了老子的唯物主义，他虽然也受儒家的影响，基本上是反对儒家学說的。張載繼承了易傳的唯物主义，他的学說虽然也和佛学有联系，实际上他是坚决反对佛学的战士。程頤朱熹繼承了孟子的唯心主义学說，虽然也推崇張載的一部分著作，对于張氏以"气"为"道体"的唯物主义学說却是坚决反对。王夫之繼承了張載的哲学，他虽然也受到程朱的影响，在哲学基本問題上却給予程朱以深刻的批判。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兩条路綫的对立是彰明較著的。但是，兩条路綫也不是

彼此脫离而全不相干的。在相互对峙之中又相互影响；在相互排斥之中又相互吸取。其間也有錯綜的关系。而且，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在其关于自然知識与社会知識的概括与总結之中提出的一些概念与一些命題，常常为以后不同的学派所共同采取、共同繼承。例如易傳所提出的“生生”的观念，“道”与“器”的范疇，在宋明哲学中，已經成为多数思想家所共同运用的概念了。

在哲学史中，有許多概念范疇是古往今来的許多哲学家所共同运用的。然而，是否可以說，这些概念是不变的呢？或者这些概念有不变的意义呢？事实上，在人类或一个民族的思想發展的長流中，有一些概念范疇固然是一脉相承的；然而这些概念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都有其演变推移的过程。

一个概念常包括多項不同的意义，这些意义并不是在同一时代被給予的，而有一个扩充累积与更換的过程。試以“天”的观念为例。古代所謂天，本来有兩項意义，一是天空，一是上帝。一个是朴素的常識的意义，一个是宗教的意义。唯物主义哲学家强調了天的朴素的常識的意义，即所謂“物質之天”；而唯心主义哲学家强調了天的宗教意义，即所謂“主宰之天”。在唯物主义發展的过程中，庄子荀子把天的朴素的意义扩充了，于是天成为表指自然的总概念，即所謂“自然之天”。在唯心主义者方面，孟子也改变了天的宗教意义，添上了最高的义理的意义。到宋代哲学中，唯物主义者張載以天为至大無外的总体，即物質世界的全体；程顥程頤以天为理，却取消了它的人格上帝的意义，專以天为表指最高义理的概念，其所謂天就是絕对观念了。如此，天的观念的意义实际上随着时代而改变；在改变的过程中，唯物主义路綫与唯心主义路綫是涇渭有别的。同时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二方面也有交互影响之处。二程修改了孟子所謂天的意义，專以天指最高义理，显然是接受了唯物主义的影响。在“物質之天”与“主宰之天”兩种意义中間是否也有共同的要素呢？有的。其共同之处是，天是在人头上的最大的东西。在不同时代的唯物主义者所謂天的不同意义中間，是否也有共同的要素呢？有的。天就是外在的广大的客观存在。不同时代的唯心主义者所謂天的不同意义中間，也有共同的要素，那就是在个人以外的精神性的实体。然而，这些共同要素不是独立存在的，这些共同要素不足以構成每一时代某一学派所謂天的完全意义。而实际上起作用的乃是每一家所謂天的完全意义。

总之，沒有固定不变的概念。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不同时代的概念之間有前后相承的关系。一个概念的意义，在演变的过程中，越来越丰富，越来越能够更深刻地反映客观世界。

关于哲学思想發展中的繼承性問題，一方面我們要反对形而上学观点，一方面也要反对相对主义。形而上学断定有固定不变的概念；相对主义認为每一时代所提出的概念只是对于那个时代有意义，对于以后时代就沒有意义。这兩种观点都是不对的。惟有从唯物主义出發的辨証的观点才是正确的。

（2）哲学遺产的繼承

我們要建設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必須批判地繼承过去各时代的文化遺产。关于如何建設無产阶級文化，列宁在“青年团底任务”中早已給出了明确的指示。列宁說：“若不清楚了解到，只有确切通曉人类全部發展过程所造成的文化，只有改造这种已往的文化，才能建設無产阶級的文化；若不了解这点，我們便不能解决这个任务。無产阶級文化并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無产阶級文化專家的人所臆想出来的。如果認为这样，那就是胡說了。無产阶級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資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官僚社会压迫下所創造出来的知識总匯發展底必然結果。……只有用人类創造出来的全部知識宝藏来丰富自己的头腦时，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义”，1948年莫斯科中文版，第438頁）。列宁指出了，必須憑借了，必須通曉并改造了，人类在阶級社会压迫下所創造出来的一切知識，才能建設無产阶級的文化。这就是說，人类在过去时代所累积起来的一切知識都是必須繼承的。考虑哲学遺产繼承問題的时候，应該特别注意这一点。以往的哲学体系中所包括的一切正确反映客观实际的知識，都应該認眞地繼承过来。

过去各时代的哲学中所有的眞实貢献我們都应該繼承。以往各时代的哲学中有那些眞实貢献呢？我們可以說，以往的哲学思想，在其关于自然知識与社会知識的概括与总結里，有許多命題或学說，正确地反映了世界上的若干基本联系或客观事物的若干基本規律；有許多命題或学說，正确地反映了人类認識的若干基本規律或認識方法的若干基本准則；又有許多观念或思想，相当正确地反映了社会生活中的基本联系或者人与人之間的一般关系之基本标准；更有許多观念或思想，相当正确地反映了人民的長久的共同願望。这些命題、学說、观念、思想、經过必要的审查、檢驗、分析、批判之后，都应当繼承过来。

古代哲学中有許多命題正确地反映了世界上最基本的关系。例如荀子所說“天行有常，不为堯存，不为桀亡”（“天論”），正确陈述了自然規律与人类的关系，指出自然規律是离开人的意志而独立的。又如張載在批判佛教唯心主义时指出佛学的謬誤在于

"以心法起灭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穷而謂之幻妄"（"正蒙：大心篇"）；同时提出了"人本無心，因物为心"；"感亦須待有物，有物則有感，無物則何所感"（"語录"）的学說。这应該說是正确地反映了物与心的关系。又如荀子"形具而神生"的命題，范縝"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的命題，都正确地說明了形神（身心）的关系。此外如王夫之的"道者器之道"的学說，李塨的"理在事中"的学說，都正确地說明了事物与規律的关系。这些命題与学說乃是中国古典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論，都是正确的，我們必須繼承。

其次，古代哲学中有許多闡明了客观辨証規律的命題或学說，都是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例如孔子所說"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論語：子罕"）；老子所說"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五十八章）；"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四十二章）。这些都是中国古典的辨証学說的基础。又如張載关于"兩一"的学說，王夫之关于"动靜"、"日新"的学說，也就是珍貴的遺产。

其次，孔子所說"学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学則殆"（"論語：为政"），应該說是人类認識規律的正确反映，所以在今天看来还是有价值的。古代哲学中这一类的命題頗不少。

在有規律意义的命題（即反映客观規律的命題）中，有一般与特殊的問題。命題所表指的規律是有一般性的，而那个命題在当时所涉及的事物則是特殊的。对于規律的認識乃从对于具体事物的認識中总結出来的。試以孔子所說"学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学則殆"为例。孔子所謂思有其特殊的范圍，他所謂学有其特殊的对象。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学，一阶級有一阶級的学；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思，一阶級有一阶級的思。孔子所从以总結出規律来的事物是特殊的；但孔子所总結出来的規律却是一般的，是对于别的时代也有意义的。他發現了这个規律，这就是他的貢献。他的这个命題是有科学性的，是后来的学者必須承認的。

又如"汉書：河間献王傳"記述河間献王刘德的治学态度是"实事求是"。这句話可以說揭示了科学方法的最基本的原則。刘德所謂实事有其特殊內容，他所謂是也有其特殊的意义。但是"实事求是"作为一个規律是有一般性的。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用这句話来表示唯物主义的基本态度。

其次，古代思想家虽然不能發現社会發展的規律，但也可能發現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基本联系。例如孟子提出了"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离婁上"）的命題，說明了人与法制的联系，基本上正确地反映了社会政治生活中人与制度的一般关系。

在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間，除了阶級关系之外，还有一些一般的关系。在原始社会里，人与人之間只有这些一般关系，沒有阶級关系。自从阶級对抗發生以后，阶級关系成为主要的；然而阶級关系并沒有复盖一切，人与人之間也还有一些别的关系。例如同一阶級中，有个人与个人之間的关系；不同阶級的人們之間也还有同类的关系，同种族的关系等等。有些倫理思想反映了人与人之間的一般关系。例如孟子所說的"与人为善"（"公孙丑上"），就是关于个人与个人之間的关系的基本准則的命題。这个命題在今日还是有益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五章中提到了"数百年来人所熟知，数千年来一切处世箴言上所重复說明的起碼的公共生活規則"。历史上有关于公共生活規則的箴言，这是一件必須承認的事实。

复次，在人类社会發展的历史中，統治阶級更换过几次，人民却是長久存在，从古到今世代相繼，延續不絕的。自从社会分裂为对抗的阶級以来，人民就有了反奴役反压迫的要求，就有了从压制下解放出来的願望。人民的这一类要求与願望，也不能不反映于哲学思想之中。統治阶級中有正义感的思想家，同情人民的遭遇，表达了人民的呼声。所謂正义是有阶級性的，有統治者的正义，也有人民的正义。取消压迫，恢复人人平等的关系，就是人民的正义。統治阶級中一部分开明人士，由于种种关系，可能舍弃了阶級的偏見，而承認了或者部分地接受了人民的正义。这就是有正义感的思想家。历史上有这类思想家，是不可否認的。例如古代儒家的"大同"学說，便是人民的基本要求之反映。人民从压迫下解放出来的要求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改变，然而先后之間有其相續相承的关系。自从"大同"学說出現以来，中国思想史上有一个人民性思想的傳統，这是应該承認的。我們要繼承这个傳統。

总之，对于以往的哲学进行恰当的理論分析，就可以解决遺产繼承的問題。以往哲学中所包蘊的眞理片断，以往哲学中所含藏的关于人类崇高理想的表述，都是优秀的遺产。在加以鑑别、檢驗之后，我們必須更加以闡明与發揚。

1957年6月28日

初級农業生产合作社中的地租問題

赵　靖

引　言

初級农業生产合作社中的地租和土地报酬問題，在不久以前还是經济学界爭論得極为热烈的一个問題；最近时期很少有人談論这一問題了，是不是因为这一問題在理論上已經解决，而在实踐上也已沒有什么重要性了呢？

我看不应这样說。初級社作为我国农業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阶段，基本上是已經过去了。到今年二月，参加高級社的农戶，已占全国总农戶的90%以上①；初級社所占比重已經很小，而且全部轉为高級社大概也是为时不久的事情。但初級社的地租問題，在目前的农村工作的实踐上还有着很大的意义；像本文的最末一节所要談到的，目前大型高級社内部村与村、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間在收入分配方面的矛盾，就是一个与初級社的地租問題有着联帶关系的問題。研究初級社的級差地租問題，对正确处理高級社中的許多工作，对促进高級社的巩固，还有着直接的作用。

至于在理論方面，这一問題就更不能說是过了时的問題。初級社的时期虽已基本过去，但如何在理論上总結我国农業合作化这一重要阶段的經驗，应該說作得还是很不够的；在地租問題上特别如此。过去討論过这一問題的作者，大多数都不曾在直接的形式上討論这一問題，都很少把初級社的地租問題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而只是从討論土地报酬的問題上接触到地租問題。土地报酬不是一个簡單的經济范疇，而是許多性質不同的成分所組成的一个复合体；它也包括着一部分地租，但不包括地租的全部。因此，想从土地报酬的研究来弄清初級社中地租的性質，是不容易办到的；相反的，如果先把初級社的地租性質研究清楚，对徹底弄清土地报酬問題却会有很大帮助。

初級社内部及外部的經济关系

馬克思指出过：地租是一个能够在許多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存在的范疇，但它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反映着不同的生产关系。因此，要弄清初級社中地租的性質及作用，必須先研究一下与初級社的地租有关的各方面的生产关系。

首先談初級社内部的生产关系。初級社是以劳动农民的生产資料部分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半社会主义經济形式，是从农民的个体經济向完全社会主义的农業生产合作社过渡的經济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一方面合作社本身已有了相当一部分公有的生产資料，全部土地（自留地除外）和主要的生产資料都由合作社統一使用；另一方面，社員对土地和其他生产資料的私有制仍然保存着，合作社并不能無条件地利用它們。在社員之間，由于生产資料的部分集体所有制和共同劳动的存在，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間的同志互助关系已經建立起来并且占着主要的地位；但由于土地及生产資料私有制还存在，而且各社員所占有的土地及生产資料的数量和質量又是不同的，因而社員之間也还保存着貧农与中农的差别。上述这些情况决定了初級社内部的分配形式还不能完全依据社会主义的按劳取酬原則，而仍須按照社員私有土地及生产資料的数量与質量来分配一部分收入。

由于地租問題不仅表現着某一农業生产單位内部的生产关系，而且还表現着各农業生产單位之間以及这些农業生产單位与整个社会的关系；因此，我們在研究初級社的地租問題时还必須注意各初級社与社外其他农業生产者之間的关系和初級社与国家之間的关系。

在初級社阶段，农村中不仅有着各农業生产合作社之間的关系；而且由于当时农業中还存在着很大数量的个体經济（在較長时期中个体經济甚至占着优势），因而还有着合作社与社外个体农民之間的关系。合作社与合作社之間的关系，固然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企業之間的关系；就是合作社与个体农民的关系，也和过去各个体农民之間的关系根本不同了，和富农与个体农民間的关系，更是有原則上的区别。个体农民作为小商品生产者，彼此有着互相竞爭、互相排挤的关系，并經常發生分化現象；富农則是不断利用自己在經济上的优势来排挤压迫小农，力圖并吞他們的土地和生产資料并迫使他們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但合作社則要在各方面帮助社外个体农民，利用自己在經济上的优越性来吸引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合作社与合作社間，合作社与社外农民之間在基本利害关系上是一致的；但社与社之間和社与社外农民之

① 邓子恢："在全国农業劳动模范代表会議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57年2月22日。

間，無論在生产資料所有权上和經营上彼此又都是完全独立的經济單位（这与以全民所有制为基础的各国营企業之間的相对独立关系是不同的）。它們彼此所处的自然条件及所具有的經济条件不同，因而在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上都有着差别，而合作社与一般个体农民之間的这类差别要比社与社之間的差别更大些。經济上的这种差别是社与社之間和合作社与社外农民之間存在非对抗性矛盾的基础。

在农業社会主义改造还沒有基本完成以前，我国农村中还存在着数量不大的富农，农業生产合作社与富农之間的关系，是敌对阶級之間的关系。农業生产合作社是社会主义在农村中的堅固陣地，是工人阶級領导农民反对农村資本主义势力的战斗堡壘；党在农村中实行限制富农到逐漸消灭富农剝削的政策，就是以农業合作化作为重要工具的。

合作社与国家之間的关系，也就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之間的关系，或者說是农業生产合作社与整个社会的关系。由于我国在整个农業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中农業机器站还为数不多，各农業生产合作社主要还是利用本身的生产資料进行生产，因而国家与农業生产合作社在生产上的結合还占次要地位；較重要的是通过商業与信貸关系和在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方面（通过农業稅的征收）来与农業生产合作社發生关系。在初級社时期，这类关系也和在高級社时期有着少数不同的特点：即不仅有着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間的关系，而且还殘留着国家与个体农民相互关系的某些特点（如农業稅还要按私有土地的情况来負担等）。

初級社还是和高級社在很長时期中并存着的。但因我們所研究的是初級社中的地租問題，初級社与高級社之間的关系，在这里就只能被舍象掉了。

以下分别就級差地租和絕对地租兩个方面来探討。

初級社中的級差地租

馬克思在研究資本主义地租时，論証了資本主义社会中的兩种基本的地租形式：級差地租与絕对地租。

級差地租是在較优良的耕作条件下所产生出的地租。它的产生条件是不同的农業生产單位之間在土地肥沃程度上、所处的位置上或（及）遞加投資的效率方面存在着差别，其产生的原因則是土地經营壟断（即把土地作为經营对象来壟断）。

馬克思所着重研究的虽然是資本主义的級差地租，但他从不曾把級差地租看作資本主义經营所特有的范疇。馬克思曾經研究过小农經济下的級差地租問題，他并且指出："即使这个形态（指小农的土地所有制形态——本文作者注）是出現在还沒有一般市場价格發展的社会狀态內，这个級差地租也是存在的；在这条件下，它是表現为多余的剩余生产物。"①这正說明，在沒有資本主义甚至沒有商品关系存在的情形下，只要存在着耕作条件的差别和土地經营壟断，級差地租也是能够存在的。

馬克思曾經預料社会主义条件下將沒有級差地租，他曾說过：級差地租"会和价格及資本主义生产一同消灭。"②但馬克思在那时并沒考虑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將会存在生产資料的集体所有制形式，因而它的这种論断，是以社会主义社会中只有全民所有制这一假定出發的。如果資本主义消灭后社会上只存在單一的全民所有制，那么土地經营壟断就將随資本主义生产的消灭而消灭，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自然不会存在級差地租了。

但实际上馬克思所設想的这种情形，除了像英国这样的少数国家外，在一般資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經济落后的国家中是不可能出現的。在同时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土地經营壟断并不能随資本主义經济的消灭而消灭（虽然这是一种和在生产資料私有制条件下所存在的土地經营壟断根本不同的土地經营壟断），因而級差地租也还会存在着。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沒有建成以前，农業生产合作社还和大量的非社会主义农業經济形式并存着；土地經营壟断和級差地租的存在，就更不消說了。

在农業合作化的初級社阶段，全社会的生产資料不是都归国家（全民）所有，而是分屬于不同的所有者（国家，生产合作社及社員个人，小生产者以及資产阶級分子等）。在这种情形下，耕作条件优于社会上最劣等經营条件的合作社，就能够把由較高的劳动生产率而帶来的更多的产品由本社所占有。这是一种和資本主义农業中及小农經济中都不同的特殊性質的土地經营壟断。这种土地經营壟断正是初級社中存在級差地租的原因。

形成級差地租的条件，仍然是由于不同生产者所使用的土地在自然条件或位置条件上有差别（級差地租 I），或者在土地上遞加投資的效率有差别（級差地租II）。但这种差别，不仅是指的各个初級社之間，而且是指的包括个体农民在內的所有农業生产者之間的差别而言的。由于这时个体农業經济在农村中还占着很大比重，而初級社在土地的自然条件、位置条件、特别是在遞加投資的效率上，都較个体农民

---

① 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卷，第1050—1051頁。

② 馬克思："剩余价值学說史"，第二卷，第264頁。

居于更有利的地位；因此，这时的最劣等条件的生产者，一般总是存在于个体农民方面的。

首先看土地自然条件的差别。农業生产合作社在初建立时，平均的土地肥沃程度并不一定优于一般的个体农民，一些貧农社員占比重特别大的合作社，土地的肥沃程度無宁还是較低的；但由于农業合作社在改良土地和合理利用土地方面的优越性，过了或長或短的时期，农業合作社土地的肥沃程度就会有显著提高。先看初級社合理利用土地方面的优越性。个体农民为了自給自足的需要以及生产資料和劳动力的限制，是不能因地制宜地种植最宜种植的作物的；但农業合作社則能更合理地利用土地，把不宜于种植某些作物的土地改种另外的作物。土地肥沃程度的差别，往往会因作物而异的；对某些作物的生長不算良好的土壤，在改种另外的作物时也可能成为相当丰饒的土壤。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土地的等級，提高了农業生产合作社全部土地的总的肥沃程度。

再看由于改良土地而造成的土地肥沃程度的提高。农業合作社由于集体經营的优越性，即便在使用原来生产資料的条件下，在改变自然条件方面也能較个体农民有不可比拟的威力。由于植造防沙林，兴修小型水利，改良土壤和进行水土保持等工作，能把原来的劣等土地变成較优等地甚或最优等地，一般农業合作社在办社三、四年之后，土地的等級便会發生明显的变化①。这就会加大着农業合作社与个体农民所占有土地之間的肥沃程度的差别，促进着农業生产合作社收入的提高。农業合作社之能够改良土地，提高土地的質量，是农業合作社所显現的优越性之一，它对个体农民發生很大的吸引作用。

各初級社之間以及社与社外农民之間，在位置上不仅原来就有着差异，而且这类差异也会随初級社的建立与扩大而有所改变，这种改变又总是加强着初級社对个体农民的优势。

在小农經济下，由于土地極分散，所以耕地距离住宅的远近，成为構成土地位置差别的因素之一：耕地距住宅愈远的小农，就愈处在不利的地位。在合作社建立后，由于土地的統一使用，能够把土地尽量交給居住較近的一些社員去耕种，位置上的不利条件就可發生很大的改变（农業社中按居住区划分耕作队，就是改变位置条件的办法）；社与社之間对插花地的交换，也可减少甚至消灭原来的位置上的不利②。当初級社的規模扩大，社員土地愈益联成大片时，位置上的不利就更容易消除了。

初級农業生产合作社在單位面积土地上的投資，是較社外的一般农民要多的，这种遞加的投資普通又总是和更高的劳动組織和一定的技术改革相結合的。因此，遞加投資的效率必然較社会上最劣等生产条件的农民为高，而且这种变化要較土地肥沃程度和位置的变化更为重要。

由于这些条件的差别而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就会使耕作条件超越于最劣等耕作条件的耕作者的初級社，获得較多的純收入（实物及貨幣純收入），这种超額純收入就構成初級社的級差地租。

这样看来，初級社的級差地租，就是自然条件或（及）遞加投資效率优于社外最劣等条件的生产者的各初級社，因有較高的劳动生产率而获得的一部分超額純收入。这一部分純收入是由社員的集体劳动創造出来的，而不是由个别劳动者或雇佣劳动者所創造出来的，因而它根本不同于資本主义的級差地租和小农經济的級差地租，而是首先反映着农業生产合作社内部的生产关系的（在部分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共同劳动）；另一方面，它所以会成为某些农業合作社的收入而不会变成全社会的收入，正是因为各农業社和社外农民都是作为生产資料的不同的所有者而互相对待的，因而它也反映着各初級社之間和社与社外农民之間的一定关系。

在初級社級差地租的占有或分配形式方面，表現着更为复杂的关系。

由于初級社中存在着土地私有制，級差地租的一部分，必然会为各个社員以土地私有者的資格所占有。这部分級差地租形成了社員土地报酬的一个構成部分。

目前大多数討論初級社級差地租的人，都認为在初級社中只有占有較优等土地的社員才获得級差地租；而社内占有最劣等土地的人的土地报酬則不包含級差地租。这是根本不对的。初級社中所以会形成級差地租，并不是由于社内土地的差别，而是由于初級社的土地的平均条件与全社会最劣等土地的差别。某些社員的土地和其他社員比起来是最劣等的，但在整个社会中却不一定是最劣等的；因此，他所获得的土地报酬中，不一定就不包含着級差地租。

---

① 例如，四川荣县双石乡“五一”农業社1957年初在为包工包产工作而重新进行土地評級时，發現原有土地等級起了很大变化：全社300多亩丁等土地基本上消灭了；47%的丙等土地变成了甲等和乙等；甲、乙、丙三等土地原来占土地面积的一半，現比上升为三分之二。見1957年2月20日人民日报。

② 山西省高平、屯留等四县，在1956年因解决了社与社之間的插花地問題，使1700亩土地由远地变为近地，农業合作社每年因此就可节省30,000个劳动日。这是农業高級合作化以后的情形。初級社因土地私有制存在和社的規模較小，这种情形当然要困难一些；但交换插花地的情形也不是沒有的。

社員凭借对土地的私有而占有一部分級差地租的情况，表現着初級社中土地使用权与土地所有权相結合的特殊条件，表現着社員以土地私有者的身分与合作社的关系，也表現着貧农社員和中农社員之間的关系。

由于初級农業生产合作社是半社会主义的农業經济形式而不是完全私有制的經济，相当于級差地租的这一部分超額純收入，当然不会完全以土地报酬的形式为社員占有，而是必然要有一大部分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則来进行分配。

首先，級差地租的一部分会包含在公积金及公益金中，为全体社員所集体占有。土地条件較好的社往往能积累更多的公积金和公益金，正說明了級差地租的这种占有形式。合作社以公积金及公益金的形式取得一部分級差地租，表現着初級社內部的社会主义关系；社与社之間及社与社外农民之間积累大小的不同，又在一定程度上表現着它們作为不同的生产資料所有者之間的关系。

級差地租不仅会有一部分以公共积累的形式为社員集体所占有，而且还会有一部分为社員个人以劳动报酬的形式所占有，也即是說，社員的劳动报酬中也可能包括着一部分級差地租。

在一般的初級社中，土地报酬在分配給社員的那部分收入（即土地报酬、劳动报酬及其他生产資料报酬的总和）中都还占着相当大的比重（一般为30%—40%，个别的社土地报酬的比重还要高），因此，就一般社員而言，單是从劳动报酬的形式下所获得的收入往往还少于必要生活資料；在这种情形下，連土地报酬也还包括着必要生活資料的一部分①。各个社員的土地报酬劳动和报酬中所包含的級差地租的数量，是由分配給社員的級差地租部分的总量，全社劳动报酬或土地报酬在两者总和中所占的比率以及每一社員的劳动报酬或土地报酬在全社同类报酬总量中所占的比重的乘积来决定的。設以D代表分配給社員的級差地租总量，D_1、D_2、D_3……等分别代表各社員劳动报酬中所包含的級差地租数量，Da、Db、Dc……等分别代表各社員土地报酬中所包含的級差地租数量；各社員的劳动报酬分别为A_1、A_2、A_3……等，土地报酬收入分别为L_1、L_2、L_3……等，則：

$$D_1=D\cdot\frac{\Sigma A}{\Sigma A+\Sigma L}\cdot\frac{A_1}{\Sigma A},\quad Da=D\cdot\frac{\Sigma L}{\Sigma A+\Sigma L}\cdot\frac{L_1}{\Sigma L}$$

$$D_2=D\cdot\frac{\Sigma A}{\Sigma A+\Sigma L}\cdot\frac{A_2}{\Sigma A},\quad Db=D\cdot\frac{\Sigma L}{\Sigma A+\Sigma L}\cdot\frac{L_2}{\Sigma L}$$

$$D_3=D\cdot\frac{\Sigma A}{\Sigma A+\Sigma L}\cdot\frac{A_3}{\Sigma A},\quad Dc=D\cdot\frac{\Sigma L}{\Sigma A+\Sigma L}\cdot\frac{L_3}{\Sigma L}$$

$$(\Sigma A=A_1+A_2+A_3+\cdots\cdots;\quad \Sigma L=L_1+L_2+L_3+\cdots\cdots)$$

全社劳动报酬对土地报酬的比例愈高，某一社員的劳动报酬在总劳动报酬中的比重愈大，則这一社員的劳动报酬中所包括的級差地租也愈多。在初級社建立几年之后，随着土地报酬所占比重的降低，級差地租也有更大的部分会在公积金、公益金和劳动报酬等項目下进行分配，而社員靠土地私有权所占有的級差地租也就相对降低了。

初級社的級差地租，也会有一部分为国家所获得。但由于我国目前农業机器站数目还不多，而且还多半处在不能贏利的狀态，国家基本上并不是作为农業生产合作社生产的直接参加者来获取这部分純收入的。在当前条件下，国家主要是通过商業系統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农業税）来获得农業社的一部分級差地租，把它变为国家集中的純收入并用来滿足全民的需要。

初級社中有無絕对地租？

馬克思在研究資本主义条件下的絕对地租时指出：絕对地租的产生条件是农業資本有机構成低于社会資本的有机構成，其产生的原因則是土地私有壟断。

現在讓我們来看一下我国的初級社中究竟有無絕对地租。由于我們考虑的对象不是資本主义的农業，所以我們必須拋开表現資本主义关系的一些范疇，而把絕对地租的产生条件一般地解釋为农業落后于工業（因为农業資本有机構成低于社会資本有机構成問題的实質即在于农業落后于工業），把絕对地租产生的原因一般地解釋为土地私有权的存在并和土地使用权相分离。

有些同志認为初級社中存在着絕对地租，他們的

① 据北京大学經济系1956年暑期在山西省解虞县紅星、燎原、幸福三社調查13戶农民（原調查22戶，除去五保戶和几个因特殊原因——如丧事而入不敷出的戶）1955年收支情况的結果，劳动报酬少于家庭生活費用的有10戶，劳动报酬稍多于家庭生活費用的只有3戶。

理由是：我国过渡时期中农業是大大落后于工業的，而初級社中不仅保存着社員对土地的私有权，并且这种土地私有权与土地使用权还是分离着的；合作社为了使用社員的私有土地，必須支付土地报酬，这种土地报酬中就包含着絕对地租。

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我国初級社中社員个人的土地私有权和合作社对土地使用权的分离虽然可以解釋作一种特殊形式的土地私有壟断，但仅有土地私有壟断并不一定就会产生絕对地租；要有絕对地租产生，还必須有絕对地租的实体——即相当于資本主义条件下农产品价值与社会生产价格的差額的部分——存在。但初級社农产品的售价中是沒有这种絕对地租的实体的。

在資本主义条件下，我們可以設想这样的情形：如果农产品的价值不高于社会生产价格，或虽高于社会生产价格但却只能按生产价格出卖，农業中就不会有絕对地租的实体存在了；这时如果存在着土地私有壟断，土地私有者并不会因为沒有絕对地租实体而不要租金的，土地的經营者就只好用刻减工資甚或减少自己一部分利潤的办法来支付租金。这种租金的支付也是由土地私有壟断产生的，但它并不是眞正的地租（因为眞正的地租必須是超过平均利潤以上的剩余价值余額），因而也就不可能是絕对地租。馬克思曾經考虑到小农不是耕种自己土地而是租入土地的情形，他認为这时"租金也更厉害得多地包括利潤的一部分，甚至包括工資的一种扣除；它不过名义上是地租，但不是当作一个独立范疇而与工資及利潤相对立的地租。"①在小农租入土地来經营时，土地私有壟断显然是存在的；但因小农的产品常被压低到价值甚至生产价格以下出卖，所以不存在絕对地租的实体，因而馬克思并不把在这种情形下支付給土地私有主的租金看作絕对地租。

在我国过渡时期中，工業农产品的差价不断被縮小着②。但由于解放前工农業产品差价十分巨大，而我国的工業發展水平又很低，在过渡时期中，实际上不可能也不应該过快地消灭工农業产品的差价。在工农業产品保存着相当差价的情形下，初級社甚至一般个体农民也都还能获得若干的純收入；但这部分純收入只能看作是"利潤"及級差地租（对耕作条件較优的生产者而言），而不可能大到包含着絕对地租的实体。

也許有人会認为：在資本主义条件下有着平均利潤这一明确的界綫，所以只有在农業的利潤超过平均利潤时，才会有絕对地租的实体；在我国初級社中，并沒有平均利潤这一范疇，怎能确定初級社的純收入中不包含絕对地租的实体呢？

当然，在沒有平均利潤这一范疇的情况下，一般的純收入与絕对地租的界綫是难于精确判定的；但在农業的純收入不多，而且一般地还不如工業企業的利潤率高时，我們是沒有理由認为农業的純收入中包含絕对地租的。小农經济中也沒有平均利潤的范疇，但馬克思不是也說小农所付的租金只是利潤及工資的扣除而不包含絕对地租嗎？

初級社的土地报酬中不包含絕对地租，也可从下面的情况得到証明：土地报酬的支付并不引起农产品价格上漲，而土地报酬的取消，也不引起农产品价格的降低。

我們都知道，絕对地租是农产品价格昂貴的原因，倘若土地报酬中包含絕对地租，則在个体农業过渡到初級社时，必然会發生农产品价格的上漲現象；反之，在初級社向高級社过渡时，土地报酬取消，农产品价格就会相应地下落（在农产品价格是由国家規定时，国家也不得不考虑这种情形的）。但这些都是不合乎事实的。我們并不曾因組織初級社而造成农产品价格上漲，也未曾在初級社向高級社过渡时减低农产品收購价格。認为初級社的土地报酬包含絕对地租的說法，在客观上是不适当地夸大了农民同工人阶級之間的矛盾，因而是有害的。

但初級社是要对一切私有土地的社員支付土地报酬的，既然初級社的收入中不存在絕对地租的实体，那末对最劣等土地的所有者支付的土地报酬，究竟是什么性質的呢？这就必須具体地分析一下最劣等土地的土地报酬所包含的成分。

最劣等土地的土地报酬，是由下列成分構成的：

（1）相当于社員的一部分必要生活資料的产品：前面提到，在初級社中，一般社員的劳动报酬都还少于必要生活資料，因此，土地报酬中总是或多或少地包含着一部分相当于必要生活資料的产品。

（2）对一部分原来有着長期投資的土地来說，如果入社时投資还未按分期攤还的方式收回，則这部分土地报酬中还会包含着一部分折旧費用和投資利息。不过就最劣等土地而言，这种情形是極少的。

（3）合作社純收入的一部分，表現为社員所获得的收入减去必要生活資料以后的剩余額。

把第二部分除外（因为它并不是眞正的土地报酬而是投資报酬），最劣等土地的土地报酬所包含的只是社員从初級社所获得的一部分必要生活資料和純收入。因此，这种土地报酬并不是地租而只不过是社員所

---

① 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卷，第1058頁。

② 据薄一波同志在全国农業劳动模范代表会議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1955年我国工农業产品的差价已較1950年縮小17.2%。

分得的一部分必要生活資料和純收入的一种支付形式。

但社員以土地报酬的形式向初級社取得一部分必要生活資料和純收入的情形，和在資本主义条件下用扣除一部分工資和利潤来支付租金的情形是根本不同的。因为初級社中的土地报酬，是社員的共同劳动所創造的，每一有劳动能力的社員都向社提供了劳动，又都向社取得了土地报酬；每人所取得的土地报酬，一般都包含着自己的一分劳动产品在內，而且在多数情形下土地报酬的絕大部分还是相当于自己劳动的产物（至于某些社員可能在土地报酬形式下占有少量的别人劳动产品的問題，因与我們的研究沒有直接关系，这里不准备談了）。所以不能把这部分土地报酬看作是必要生活資料和純收入的扣除。

研究初級社的地租問題的实踐意义

研究初級社的地租問題，对解决农業合作化过程中的許多实踐問題有着很大的意义。

首先看一下这一問題对解决初級社內部貧中农社員互利問題的关系。

例如我們既然知道初級社的級差地租是社員集体劳动生产率高于全社会最劣等土地耕作者的劳动生产率的結果，而不是社員之間劳动生产率差别的結果；因此，在級差地租的分配上就必須力求把它的主要部分在公积金、公益金及劳动报酬等項目下进行分配，而不应該把过大的部分按土地报酬的形式分配。在确定各級土地的报酬数量时，一方面要考虑到入社前小农經济中的級差地租問題而使各級土地的报酬量保持相当差别；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初級社級差地租的性質与小农經济根本不同而不宜使各級土地的报酬差别过大。因为各級土地的报酬如果差别过大，就会使按私有原則分配的級差地租部分相对增大，而使按社会主义原則分配的部分相对縮小。

其次，我們既然懂得了初級社級差地租的增長是社員共同努力的結果（办社后土地質量的改进、投資效率的提高等），因此，就应該力求使办社以后所增長的級差地租都按社会主义原則分配而不按私有原則分配。在規定初級社土地报酬与劳动报酬的比例时，这样考虑是十分重要的。有的社采取"土地固定吃租"的办法，土地报酬的数量不随合作社生产及收入的增長而提高；另外有些社虽采取土地和劳动按比例分配收入的办法，但随着合作社生产及收入的增長不断降低土地报酬所占的比例。这些办法都是基本符合上述原則的。但有些社却只采取比例分配的办法而不随生产及收入增長来降低土地报酬的比例，这就必然会使靠土地私有权而占有的級差地租不断增多起来。很明显，这种情况是会妨碍社員劳动积極性的提高和初級社中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長的。

研究初級社的級差地租問題对解决当前高級社中的許多重要問題也会有所帮助。例如目前大型高級社中村与村、队与队以及新社員与老社員在分配关系中的矛盾，就是与初級社的級差地租問題有着連帶关系的。

1956年全国許多地区發生了盲目办大社的偏向，出現了許多广袤几十里、包括着好几个村庄甚至整个乡的大社；这些大社中有許多社因条件适宜而办得很好，但也有許多大社因規模过大而發生了問題。在这些發生問題的大社中，有的是由原来自然条件及經济条件很悬殊的小社或村庄合并起来的，有的則是从吸收大量新社員而迅速扩大了自己的規模。

由于自然条件与經济条件有較大的差别，各社之間以及社員与社外农民之間，原来的收入水平就相差很大，而老社的收入一般高于新社，社員又大大高于社外一般农民。但在我国目前阶段，农業生产合作社还处在"集体农庄的手工工場时期"，在办大社以后头一兩年，收入是不会有很大比例的增長的。因此，在許多規模太大的合作社中，虽然总收入有了相当增長，但原来收入多的小社、村庄或社員，收入却增長很少甚至还有减少的情形，因而就引起了大社內部村与村、生产队与生产队以及老社員与新社員之間的不团結現象。

在农業合作化过程中，先进社帶落后社，合作社积極帮助个体农民，是不容变易的原則。原来条件較好的社在并社扩社中，不应拒絕条件較差的社和社外农民；条件較差的社或社外农民，在初进入大社后收入会有較大比例的增長，也是必然的現象。認眞教育农民，認識这一道理，在并社扩社中克服褊狹保守的思想，是不可忽視的政治思想工作。但如果因并社扩社而使原来收入較多的社或社員發生收入不增乃至减少的情况，那也是不应該的。由此看来，在并社扩社时，必須認眞研究級差地租問題，不要把原来自然条件及經济条件悬殊的社，过快地合并在一起；在吸收社外农民入社时，也要考虑到社員与社外农民收入的对比情况，力求使新社員数量与老社員保持一个恰当的比例关系（吸收新社員比例过小了，是不符合党的农業合作化政策的，但在收入过分悬殊的条件下，如吸收的新社員占老社員的比例过大，又会容易引起老社員收入减少的情形）。

上述这些大型高級社內部村与村、队与队以及新老社員收入多少不同的情况，本身已不是初級社的級差地租問題，甚至已不是級差地租問題。但这些大型高級社多半是在合作化高潮中由若干初級社（可能也包括一部分小型高級社）合并而成的，或由若干初級社与社外农民合并而成的；高級社的收入分配中所以会产生上述矛盾，主要是因为在合成大型高級社以前各初級社之間以及社員与社外农民之間因生产条件不同而收入水平很不一致。因此，这仍是与初級社的級差地租問題有着連帶关系的一个問題。

宋詞發展的几个阶段

龙榆生

一 宋詞的先导

長短句歌詞發展到了宋代，可說是"登峰造極"，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这个音乐語言和文学語言紧密結合的特种詩歌形式，就它的音乐关系来說，原来叫作"曲子"或"杂曲子"（例如敦煌發現的"云謠集杂曲子"、柳永："乐章集"后附的"續添曲子"）；又叫"今曲子"或"今体慢曲子"（并見王灼："碧雞漫志"卷一、五）；这都表明，詞原是在唐、宋以来新兴曲調的基础上逐步發展起来的。就它的文学組織来說，原来叫作"曲子詞"（見"花間集"欧陽炯序）或"長短句"（見"碧雞漫志"卷二）；这又表明，詞是經过严格的音乐陶冶，从五、七言近体詩的形式，錯綜变化構成的。据崔令欽："教坊記"所載教坊曲名有二百七十八調之多，另附四十六大曲。这些曲調，都是唐明皇（李隆基）开元年間西京（長安）左右教坊諸妓女所常肄習的。其中如"夜半乐"、"清平乐"、"楊柳枝"，"浣溪沙"、"浪淘沙"、"望江南"、"烏夜啼"、"摘得新"、"河漬神"、"二郎神"、"思帝乡"、"归国遙"、"感皇恩"、"定風波"、"木蘭花"、"菩薩蛮"、"八拍蛮"、"蕤江仙"、"虞美人"、"遐方怨"、"鳳归云"、"綠头鴨"、"下水船"、"定西蕃"、"荷叶杯"、"長相思"、"西江月"、"拜新月"、"上行杯"、"鵲踏枝"、"曲玉管"、"傾杯乐"、"謁金門"、"巫山一段云"、"相見欢"、"苏幕遮"、"訴衷情"、"洞仙歌"、"夢江南"、"醉公子"、"拂霓裳"、"蘭陵王"、"南歌子"、"風流子"、"生查子"、"天仙子"、"酒泉子"、"破陣子"、"撲魚子"、"南乡子"等；在晚唐、五代、宋人詞中，还是不断使用。晚近敦煌發現的唐人写本"琵琶譜"，也保存了"傾杯乐"、"西江月"、"心事子"、"伊州"、"水鼓子"、"胡相問"、"長沙女引"、"撒金砂"等曲。这八个曲調，都是"教坊記"中所有，只"水鼓子"作"水沽子"、"長沙女引"作"長命女"，大概由于傳写的訛誤。既然这些曲子，在开元时就已产生，为什么依照这些曲子的节拍来填的歌詞，很难見到开元詩人的作品，連李白的"菩薩蛮"也多数認为靠不住呢？据"云謠集杂曲子"（"觀村遺書"本）所載三十首詞中，共用"鳳归云"、"天仙子"、"竹枝子"、"洞仙歌"、"破陣子"、"浣沙溪"、"柳青娘"、"傾杯乐"、"內家嬌"、"拜新月"、"拋球乐"、"漁歌子"、"喜秋天"等十三个曲調；除"內家嬌"外，也都是"教坊記"中所已有的；只"浣沙溪"作"浣溪沙"、"漁歌子"作"魚歌子"，小有出入而已。这些無名作家的作品，据我个人二十年前的推測（見1933年"詞学季刊"創刊号拙撰"詞体之演进"），以及近年任二北先生的考証（詳見任著："敦煌曲初探"），認为有很多是出于开元前后的。这些作品，使用同一曲調，而句度長短，常是有很大的出入；这証明倚声填詞，要文字和曲調配合得非常适当，必須經过長期的多数作家的尝試，才能逐漸做到，而且非文士与乐家合作不可。这种尝試精神，不能寄希望于缺乏群众观念的成名詩家；而且运用五、七言近体詩的平仄安排，变整齐为長短参差的句法，也非經过相当長期詩人和乐家的合作，將每一曲調都搞出一个标准格式来，是很难順利發展的。由于無名作家的尝試，引起詩人們的好奇心，逐漸改变观念，努力促进長短句歌詞的發展，这不得不归功于肯"依忆江南曲拍为句"（"四部叢刊"本"刘夢得外集"卷四）的刘禹錫、白居易；而"能逐絃吹之音，为側艳之詞"（"旧唐書"卷一百九十下）的温庭筠却因"士行塵杂，狂游狭邪"，放下了士大夫的架子，来搞这个長短句歌詞的創作，奠定了这新兴歌曲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这是值得我們特予贊揚的。

这倚声填詞的風气，剛由温庭筠一手打开，接着遭到唐末、五代的乱离，教坊妓乐当然免不了四方逃散。因了南唐、西蜀比較有了相当長期的安定，声色歌舞也就跟着都市的繁荣而昌盛起来。韋庄挟歌詞种子以移植于成都，遂开西蜀詞風之盛。"花間集"的結集，显示令詞的發荣滋長；虽因温氏作風偏于香軟（見孙光宪："北夢瑣言"），导致多数作家缺乏思想性；而韋氏的白描手法，啓發了欧陽炯、李珣二家对南方風土人情的描繪；开了后来作家的另一法門。南唐李氏父子（中主璟、后主煜）保有江南，留心文艺，尤其是李煜，因了皇后周氏善歌舞，尤工琵琶（陆游："南唐書"卷十六），对歌詞的創作，特感兴趣。同时宰相馮延己在这个歌舞升平的小朝廷中，

也常是趁着朋僚亲旧在宴会娱乐的时候，随手写些新的歌詞，交給歌女們配着管絃去唱（四印齋本“陽春集”陈世修序）。这样朝野上下，相率成風，把短調小詞的艺术形式提高，和西蜀的“花間”詞派遙遙相对。这兩股洪流，由于赵匡胤先后消灭了西蜀、南唐的分割局面，随着政局的統一而匯合于汴梁（北宋首都开封）；复經几許曲折，醸成宋詞的不断發展，呈現“百花齐放”的偉观。这从开元教坊杂曲开始胎孕的歌詞种子，經过几百年的發荣滋長，以及無数詩人与乐家的合作經营，才能在中国詩歌史上开辟这样一大塊光輝燦爛的园地，使得古今多少英雄豪杰、志士仁人都要馳騁于其中，借以發抒他們的“奇情壯采”，至今一絕；这一發展过程，也是相当复杂的，值得吾人追溯一下的。

二　宋初令詞的繼續發展和慢曲長調的勃兴

我們了解了短調小令，在晚唐、五代的不断进展中，許多曲調都經过了詩人們的更迭实踐而有了定型；作者只須照着它的句度長短、声韻平仄，逐一塡上新詞，就可能按譜歌唱；因而不必每个作者都得精通乐律，和温庭筠一样“逐絃吹之音”；这样只把它当作“句讀不葺”的新体律詩去写，只管在艺术上不断提高；而且在晚唐、五代时，由于有些作家給过啓示，像这类本来是給歌女們配上管絃借以取乐的玩艺兒，也可以借来發抒个人的抱負和所有身世之感；它的感染力，較之过去各种詩歌形式，是“有过之，無不及”的。例如唐昭宗（李杰）被逼在华州，登上齐云楼，写了兩首“菩薩蛮”：一首是：“登楼遙望秦宮殿，茫茫只見双飞燕。渭水一条流，千山与万丘。野烟生碧树，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內中！”一首是：“颯颯且在三峰下，秋風往往堪沾洒。腸断忆仙宮，朦朧烟霧中。思夢时时睡，不語長如醉。早晚是归期，穹蒼知不知？”（“碧雞漫志”卷二引）像这样穷途末路的可憐皇帝的哀鳴，在当时，很多人还是会寄予同情的；所以在敦煌發現的唐人写本杂曲詞中，也有这个作品。至于李煜亡国以后，在“此間終日以眼泪洗面”的俘囚生活中写下了許多“以血泪凝成”的“浪淘沙”、“虞美人”、“相見欢”等作品，也就是王国維所称：“詞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人間詞話”卷上）；它給作家們的啓示，是更加重大的。北宋詞家，由于这些啓示，感覚到这个出于里巷歌謠的新兴詩体，一样适于“緣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極命風謠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回要眇，以喻其致”（張惠言：“詞选”目录序）。于是許多政治家和文学家如寇准、范仲淹、晏殊、欧陽修、王安石等，都或多或少的对这个長短句歌詞有所“染指”。这些作家的作品，虽也各有不同風格，一般說来，都是直接南唐系統，从李煜、馮延已的基础上發展起来的。晏殊、欧陽修和王安石都是江西人。江西原来就是南唐疆域，中主李璟还曾迁都洪州（南昌）必然会把歌詞种子散播于江西境內。和欧陽修同时的刘攽早就說过：“元献（晏殊）尤喜馮延已歌詞；其所自作，亦不減延已乐府。”（“貢父詩話”）清人刘熙載又說：“馮延已詞，晏同叔（殊）得其俊，欧陽永叔（修）得其深。”（“艺概”卷四）这都說明晏殊、欧陽修兩大作家的詞，都是直接南唐系統，和域关系有重大影响的。王安石也曾問过黃庭堅：“作小詞，曾看李后主詞否？”（“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九引“雪浪齋日記”）李后主的詞是“言之有物”的。这对于有偉大政治抱負的范仲淹、王安石給了很大的啓示，因而产生范氏：“苏幕遮”、“漁家傲”、王氏：“桂枝香”这一类沉雄激壯的好詞，开辟了苏、辛豪放派的大路，这一点是应該特别指出的。

我在前面已經說过，詞是在唐、宋以来新兴曲調的基础上逐漸發展起来的。所以我們要了解北宋詞特别兴盛的原因，除了上面所說的南唐影响外，还得注意那时的音乐發展情况。据“宋史”卷一百四十二“乐志”十七，提到燕乐，推本于唐“以張文收所制歌名燕乐而被之管絃，厥后至坐伎部琵琶曲盛流于时，匪直汉氏上林乐府縵乐不应經法而已”。这說明唐以来音乐界情况，是几于全部被龟兹人苏只婆傳来的琵琶曲所籠罩；而倚曲塡詞的發展，也是和这些琵琶曲調的傳播分不开的。“乐志”又說：“宋初循旧制，置教坊，凡四部。其后平荆南，得乐工三十二人；平西川，得一百三十九人；平江南，得十六人；平太原，得十九人；余藩臣所貢者八十三人；又太宗藩邸有七十一人；由是四方执艺之精者皆在籍中。”这来自各方的乐工，都被安排在教坊里面；于是久經离析的唐教坊旧曲又漸漸被整理出来，作为新朝音乐的發展基础。我們且看北宋教坊所奏十八調、四十六曲，其中如“万年欢”、“劍器”、“薄媚”、“伊州”、“清平乐”、“胡渭州”、“綠腰”等，也都是开元教坊流傳下来的旧曲。这四十六曲中除龟兹部“宇宙清”、“感皇恩”所用的乐器以觱栗为主外，其余都是以琵琶为主的歌曲。在“队舞”的“女弟子队”中，开首就是“菩薩蛮队”。这一切，都說明北宋时代的音乐，都是从唐开元教坊旧曲的基础上發展起来的。“乐志”也曾提到：“宋初置教坊，得江南乐，已汰其坐部不用。自后因旧曲创新声，轉加流丽。”又說：

"太宗（赵炅）洞曉音律，前后亲制大、小曲及因旧曲創新声者，总三百九十。"又說："仁宗（赵禎）洞曉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賜教坊，或命教坊使撰进，凡五十四曲。"單是这兩个皇帝就創作了这許多新曲，加上教坊所保存的旧曲，以及無数乐工"因旧曲創新声"的歌曲，这数目該是大得惊人的。由于音乐歌曲的繁荣，因之适应这些新兴曲調而創作的歌詞，也就应运而起，斗靡爭妍。加上赵匡胤在开国之初，自己覚得他的皇位是从"孤兒寡妇"的手中窃取得来的，怕他的"佐命功臣"將来也"如法炮制"，因而借着杯酒解除了那批大將的兵权，而劝他們"及时行乐"；这样間接鼓舞了滿朝文武，留連于声色歌舞的場所；不但"淫坊酒肆"，可以尽情度着"淺斟低唱"的生活，一般貴游子弟乃至士大夫家，差不多都要养几个"舞鬟"，教些歌曲，作为"娛宾遣兴"的主要条件。还有地方官吏，送往迎来，都有歌妓奉承，几乎成了慣例。由于这种种关系，文人和歌女接触的机会太多了，許多歌曲的节奏也听慣了；而且短調小令，經过無数作家的实踐，对句度声韵的安排，也早有了定型，在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不論在風格上、艺术上，令詞發展到了北宋前期諸作家，如晏殊、欧陽修、晏几道等，眞可說得上"登峰造極"。这三人中尤以晏几道为最突出。他是晏殊的第七子。尽管生長在宰相的家庭中，却对那些趋炎附势的人們看不順眼。黃庭堅說他"磊隗权奇，疏于顧忌"。又說他有四痴："仕宦之連蹇，而不能一傍貴人之門，是一痴也；論文自有体，不肯一作新进士語，此又一痴也；費資千百万，家人寒飢，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負之而不恨，已信人，終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豫章黃先生文集"卷十六"小山集序"）像他这样充滿矛盾的生活，迫使他一意向文学方面發展，用歌詞来排遣他那憤世嫉俗的心情；因而影响他的詞的風格的提高。連道学先生程頤听人念起他的名句："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过謝桥。"也不免要贊嘆一声："鬼語也！"（"邵氏聞見后录"卷十九）这可見黃庭堅贊美他的詞："可謂狹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豈減'桃叶'、'团扇'？"又說他"乃独嬉弄于乐府之余，而寓以詩人句法，清壯頓挫，能动搖人心"（"小山集序"）。这些話都是异常"中肯"的。几道自己也說过："叔原往者浮沈酒中，病世之歌詞不足以析酲解慍，試續南部諸賢緒余，作五、七字語，期以自娛；不独叙其所怀，兼写一时杯酒間聞見所同游者意中事。"（"小山詞"自序）这和他对黃庭堅說："我槃跚勃窣，犹获罪于諸公；憤而吐之，是唾人面也。"（"小山集序"）用来对照一下，他的"使酒玩世"，是有"滿肚皮不合时宜"的。他又叙述他的填詞动机："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龙家有蓮、鴻、苹、云（四个歌女）品清謳娛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諸兒；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而已！"（"小山詞"自序）他又把这些作品叫作"狂篇醉句"，可見其中也是"言之有物"的。这里面所記"悲欢合离之事"，我們現在很难給以确切的証明；但在整个"小山詞"中，他那高貴的品質，深厚的感情，以及高超的艺术手腕，却使人蕩气迴腸，挹之無尽。在令詞發展史上，李煜和晏几道是兩位最杰出的作家；而晏几道把令詞推向頂点，尤其是值得讀者深入寻味的。

北宋統一中国之后，虽然辽与西夏还常給赵氏朝廷以不断威胁；但一般說来，經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到了仁宗时，社会經济是漸漸繁荣起来了。因了汴京的繁庶，以及教坊新曲的盛行，于是从唐以来就已有了的"今体慢曲子"，由于普遍社会娛乐的需要，也就漸漸为士大夫所注意，而开始替这些慢曲長調創作新詞了。張先、柳永在这方面做了开路先鋒。陈师道說："張子野（先）老于杭，多为官伎作詞。"（"后山詩話"）叶夢得說："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狹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又說："永亦善为他文辞，而偶先以是得名，始悔为已累。余仕丹徒，尝見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飲处，即能歌柳詞'。言其傳之广也。"（"避暑录話"卷三）从張、柳兩人这些填詞經历，我們可以了解，"今体慢曲子"虽然和小令短調一样，早在开元以来就有了，但必須等到三百年以后的仁宗朝才大大發展起来，是有它的特殊原因的。我在前面已經說过，一般有了声望的文人，对于流行民間的新兴曲子，是不敢輕于接受的。运用五、七言今体詩的声韵組織，把它解放开来，适应一些新兴曲調，又非得着詩人与乐家的密切合作不可。我們只要仔細想想，柳永尙且把替教坊乐工代作歌辞"悔为已累"，这長調慢詞所以迟迟發展的症結，就可以"迎刃而解"了。由近体律、絕的声韵安排、錯綜变化，以創立長短句歌詞的短調小令，經过温庭筠的大量創作，还得有西蜀、南唐比較長时期安定局面的培养，才能够充分發揚；那变化更多、声韵組織更加复杂的慢曲長調，就更非經过長时期無数無名作家的尝試醞釀，而且有特出的富于文学修养的詩人，放下士大夫的架子，和乐工歌女們取得密切合作，是断乎不容易开辟这一广大园地的。恰巧張先、柳永挺身而出，担当了这一重任，为这一音乐語言和文学語言紧密結合的特种詩歌形式，留給天才作家作为發抒奇情壯采的一大广場；張、柳开創的偉迹丰功，是不容淹沒的。

三　柳永、苏軾間的矛盾和北宋詞壇的斗爭

柳永的輩分，是早于苏軾的。在苏軾"横放杰出"的詞風沒有取得广大讀者拥护之前，整个的北宋詞壇，几于全为柳永所籠罩。因为他的作品，很多是專为迎合一般小市民心理来写的；而且他所采用的語言也很接近群众；再和教坊时新曲調配合起来，給歌女們随地唱出，就自然会受到广大听众的热烈欢迎。在"乐章集"中，这一部分作品，有些是近于猥褻，不免低級趣味的；这是被一般文人雅士所共唾弃的一面。至于他那"羈旅穷愁之詞"，虽然是写的个人遭遇，而縱横排蕩，天才横溢；抒情写景，开辟了許多独特的境界。連看不起他的苏軾，讀到"八声甘州"的警句："漸霜風凄紧，关河冷落，殘照当楼"。也不免要点点头，贊一声："此語于詩句不减唐人高处！"（"侯鯖录"卷七）我覚得柳永的特殊貢献，还在他所写的慢詞長調，体会了唱曲換气的精神，在許多轉折地方，安排一些强有力的單字，用来承上轉下，作成許多关紐，把整个作品，像珠子一般連貫起来，使人感覚它在"潜气內轉"，"搖曳生姿"。这一套法宝，該是从魏、晋間駢文得着啓示；把它运用到体势开拓的長調慢詞上来，使这个特种詩歌形式，由于音乐的陶冶，賦予了生命力；而筋搖骨轉，竟体空灵，曲折宕間，恰与人們起伏变化的感情相应。这不是柳永对文学有深厚的修养，和对音乐有深刻的体会，把兩者結合起来，是万万做不到的。我們只要从他的代表作"八声甘州"里面所用的"对"、"漸"、"望"、"嘆"等字，以及許多錯綜变化的句法，加以深入的体会，就不难理解他那高超的艺术手腕，是怎样富于音乐性；而長調慢詞的發展，对抒情詩是有怎样的重要了！

柳永既然在詞的領域內，有了这样的开辟之功，正好供給天才作家以縱横馳騁的广大园地；那么，为什么苏軾在这方面会和他發生矛盾，甚至告誡他的門下，要和柳永展开剧烈的斗爭呢？据俞文豹："吹劍录"：

> 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問："我詞何如柳七？"对曰："柳郎中詞，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学士詞，須关西大汉，銅琵琶，鉄綽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絕倒。

这虽是一个帶有滑稽意味的笑話，但这兩家的風格，确也是迥然不同的。苏軾还曾对他的得意門生秦观說过："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詞！？"（"高齋詩話"）这都表現柳、苏間的重大矛盾，和兩派的剧烈斗爭。这个主要原因，还在当时一般士大夫对这个新兴歌詞的看法，可能阻碍"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碧雞漫志"卷二）的豪放詞派的發展，所以像他本人那样的浩蕩襟怀，还得和柳永的流派展开無情的斗爭；因为不这样，是很难在柳派的势力下，把詞的內容向前推进一步的。这消息，只要看当时最崇拜苏氏的文人，如陈师道，还要这样說："子瞻以詩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詞手，惟秦七、黄九耳！"（"后山詩話"）还有他的門下士晁补之、張耒也和陈师道一样的見解，只把秦观的詞当作正宗，因而有"少游詩似小詞、先生（苏軾）小詞似詩"（"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二引"王直方詩話"）的說法。这个傳統的狹隘思想，認定香弱一格的詞才算是当行出色，是在"花間"派以至柳詞盛行的影响下自然产生的。为了打开另一局面，解除这特种詩歌形式上一些不必要的"清規戒律"，好来为英雄豪杰服务，那么，这个"深中人心"的"要非本色"的狹隘成見，就好像一塊阻碍前进的"絆脚石"，非把它首先扳掉不可。苏軾立意要打开这条大路，憑着他那"横放杰出"的天才，"虽嬉笑怒罵之辞，皆可書而誦之"（"宋史"卷三百三十八"苏軾傳"）。因而"以文章余事作詩，溢而作詞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尙临鏡笑春，不顧儕輩"（"碧雞漫志"卷二）。他自己的作品，果如胡寅所称："一洗綺罗香澤之态，摆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塵垢之外；于是'花間'为皁隶，而柳氏为輿台。"（"酒边詞序"）他索性不顧一切的非議，只是"滿心而發，肆口而成"，做他那"句讀不葺"的新体律詩。說他"以詩为詞"也好，說他"小詞似詩"也好，他只管大張旗鼓来和拥有群众的柳詞划清界綫；終于获得知識分子的拥护，跟着他所指引的道路向前努力。于是这个所謂"詩人之詞"，不妨脫离音乐的母胎而卓然有以自树。这个别开天地的英雄手段，也就只有苏軾这个天才作家才能做得那么好。

四　北宋詞壇的兩个流派

一般說来，在長短句歌詞的發展史上，柳永和苏軾，虽然站在敌对矛盾的兩方面，但从兩个不同角度去看，也就各有各的开創之功。后人把它分作豪放、婉約兩派，虽不十分恰当，但从大体上看，也是頗有道理的。这兩派分流的重要关鍵，还是在歌唱方面的成分为多。所謂"十七八女郎，执紅牙板"，嬝嬝婷婷去歌唱的作品，自然以偏于軟性的为最适宜。所以在"苏門四学士"中，只有秦观的"淮海詞"，最被当时詞壇所推重。叶夢得說："秦观少游亦善为乐府，語工而入律，知乐者謂之作家歌。元丰間、盛行

于淮、楚。”（“避暑录話”卷三）又說：苏軾对秦观的詞“犹以气格为病”。这恰恰說明一般适宜入歌的詞，是和文人自抒怀抱的詞，有着相当距离的。陈师道推“秦七、黄九”为“今代詞手”，也因兩家集子里都有不少运用方言俚語、專为应歌而作的东西。从兩家的整个風格来看，秦詞有些确是受过柳七影响，偏于軟美一路；但在南迁以后的作品，則多悽厉之音，格高韵胜，确实不愧为一个“当行出色”的大作家，上比柳永，下較周邦彥，不但沒有遜色，而且有他的独到之处。“淮海詞”一向被讀者所推重，不是沒有理由的。黄庭坚的“山谷詞”，除掉那些应歌之作以外，大体都是沿着苏軾的道路向前进展：他的風格，也和他的詩一样，以生新瘦硬見長，使讀者像喫橄欖一般，細細咀嚼，才会感到“舌本回甘”的滋味，晁补之和黄庭坚同在苏門，他的詞也是沿着苏軾的道路走的。他曾批評过苏、黄兩氏的作品，說“居士（軾）詞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黄魯直（庭坚）間作小詞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語，自是著腔子唱好詩”（“能改齋漫录”卷十六）。看他言外之意，好像对苏、黄都不十分滿意，实則他直接受了这兩位师友的熏染，也可說是苏詞的嫡系。把晁氏当作由苏軾过渡到辛弃疾的桥梁，是很合适的。因了北宋后期对于元祐党人的排斥，苏軾一派詞風，在南方受了一定程度的阻碍，几經曲折，將种子移植于北方，从而产生金詞的“吳（激）蔡（松年）体”。直到南渡以后，这种子又由辛弃疾帶回南方，創立一派“豪杰之詞”。这一股巨流，是由苏軾疏浚出来的。

柳七一派，虽經苏軾的剧烈斗爭，但因它在广大人民中打下了深厚基础，所以它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不易消灭。如上所說，苏門秦学士且不免有所沾染。据王灼說，还有“沈公述、李景元、孔方平、处度叔侄、晁次膺、万俟雅言（咏）、田不伐（为）、曹元寵（組）等，源流皆从柳氏来”（“碧雞漫志”卷二）。这些人的作品，有的在“長短句中作滑稽無賴語”，受到当时市民阶層的欢迎，但不登“大雅之堂”，很快也就湮沒了。柳永以后，只有賀鑄、周邦彥兩家，在長調慢詞方面，有了进一步的發展。賀氏輩分，約与黄、秦相等。黄庭坚最爱賀作“青玉案”詞中：“梅子黄时雨”的警句，尝有“解道江南断腸句，世間惟有賀方回”的表揚。張耒替他作“东山詞序”，推崇他的作品，“盛丽如游金、張之堂，而妖冶如攬嫵、施之袪，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苏、李”。这些話，也不尽是溢美之辞。依我个人的看法，賀氏在詞界的最大貢献，除了小令另有独創，仿佛南朝乐府風味外；他的長調也有很多笔力奇横的作品，可以作为辛弃疾的前导。尤其是他那“六州歌头”和“水調歌头”，句句押韵，平仄互协，增加了这兩个曲調的声情激壯之美，打开了金、元北曲的先路，是值得特为指出的。

周邦彥是北宋詞壇的殿軍，也有人推他为“集大成”的作者（周济：“宋四家詞选序論”）。他的詞是从柳永的基础上向前發展的。从音乐和艺术的角度来看，他的地位是要超过柳永的。他有很深厚的文学基础，兼“好音乐，能自度曲”（“宋史”卷四百四十四“文苑傳”）。在徽宗（赵佶）崇宁年間，仿照汉武帝建立“乐府”的遺意，設置“大晟府”，作为整理、創作音乐曲調的最高机关。邦彥作了这“大晟府”的提举官，和万俟咏、田为一道工作（“碧雞漫志”卷二）。張炎曾經說起：他們在“大晟府”时做过“討論古音、审定古調”的工作；“又复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宫换羽，为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为之，其曲遂繁”（“詞源”卷下）。这个正式音乐机关，虽然沒有很長的历史；但由于徽宗皇帝的重視，这“大晟府”所搜集的乐譜資料，必然是异常丰富的。周邦彥和万俟咏、田为等在这里面工作，所看到的隋、唐旧譜一定很多。例如“蘭陵王”慢曲本来是北齐高長恭的“蘭陵王入陣曲”，而現存“清眞集”中有“蘭陵王”咏柳詞。据王灼說：“今越調‘蘭陵王’，凡三段，二十四拍；或曰遺声也。此曲声犯正宫，管色用大凡字、大一字、勾字，故亦名大犯。”（“碧雞漫志”卷四）周詞就是用的这个“越調蘭陵王”的遺声。据毛幵說：“紹兴初，都下盛行周清眞咏柳‘蘭陵王慢’，西楼南瓦皆歌之，謂之‘渭城三疊’。以周詞凡三換头，至末段声尤激越，惟教坊老笛师能倚之以节歌者。其譜傳自赵忠簡（鼎）家。忠簡于建炎丁未（1127）九日南渡，泊舟仪眞江口，遇宣和大晟乐府协律郎某，叩获九重故譜，因令家伎習之，遂流傳于外。”（“樵隐笔录”）把这王、毛兩人的話联系起来看，可見“末段声尤激越”的“蘭陵王”，确是“入陣曲”的遺声。更进一步去看“清眞集”中所有長調慢詞，确如王国維所說：“讀先生之詞，于文字之外，須更味其音律。今其声虽亡，讀其詞者，犹覺拗怒之中，自饒和婉，曼声促节，繁会相宜，清濁抑揚，轆轤交往。”（“清眞先生遺事”）長短句慢詞發展到了周邦彥，才算到了音乐語言和文学語言紧密結合的最高艺术形式。从艺术角度去看他的全部作品，确能做到“渾化”（周济：“宋四家詞选序論”）的境界。由于它的音乐性特别强烈，一直为歌女們所爱唱；直到宋亡以后，还有杭妓沈梅嬌会唱他的“意难忘”、“台城路”兩首歌曲（張炎：“山中白云”国香詞小序）。他在文学上及音乐上的影响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了。

五　南宋詞風的轉变和苏辛詞派的确立

詞在形式上的發展，到了周邦彥，已是"登峰造極"。这个高度艺术，恰巧随着北宋皇朝的崩潰而消沉下来。由于金人的南侵，汴京淪陷，所有歌舞人等也都四散奔逃，于是入乐的詞，受到环境的影响，漸漸不被作者所重視。所有爱国志士于流离轉徙之余，偶然"悲从中来"，借着塡詞来發抒"身世之感"，不期然而趋向苏軾一路。由于各个作者的爱国思想和激越感情，傾注于这个"句讀不葺"的新体律詩中，把这个高度艺术形式注入了許多新血液，于是这个本来是附屬于音乐的特种詩歌形式，不妨脫离音乐而自有其充分的感人力量。有如岳飞的"滿江紅"和張孝祥的"六州歌头"，都充分表現了作者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激壯蒼涼的民族英雄气概。就是許多南渡詩人于作詩之余，写些長短句，有如陈与义的"無住詞"，叶夢得的"石林詞"，朱敦儒的"樵歌"，張元干的"蘆川詞"，向子諲的"酒边詞"，陆游的"放翁詞"都是傾向于苏軾所指引的道路，在南渡初期自成系統的。只有女詞人李清照目空一切，对过去作家除南唐二主及馮延巳外，都表示不滿。她說：柳永"虽协音律，而詞語塵下"；張先等"虽时时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晏殊、欧陽修、苏軾"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尔"。她对詞别有一种看法，認为"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她比較的推重晏几道、賀鑄、秦观、黃庭坚，說这四家是懂得怎样塡詞的；但一面又指出他們的缺点："晏苦無鋪叙，賀苦少典重；秦卽專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貧家美女，虽極妍丽丰逸，而終乏富貴态；黃卽尙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減半。"（以上皆見"苕溪漁隱叢話"后集卷三十三）她这样严格的要求古人，究竟她自己的成就怎样？我們讀了她的"漱玉詞"，确实不愧为"当行本色"（沈謙："塡詞杂說"）的作家。清照和后起的辛弃疾都是济南人，在詞的成就上各有各的特点。清代詩人王士楨談到詞的兩大宗派說："婉約以易安（李）为宗，豪放惟幼安（辛）称首。"（"花草蒙拾"）清照也曾飽經丧乱流离的苦痛，她却不肯在塡詞方面破坏她自己所定的約束，故作壯音。她只就寻常言語度入音律，随手拈来，自然超妙。这在南宋初期諸作家中，是具有独特風格的。她这种"本色"語，也曾影响辛弃疾的晚年作品，不过兩人的身世环境不同，笔調究难一致罢了。

苏軾"横放杰出"的作風，恰宜發抒英雄豪杰的热情偉抱。这一啓示，由他的門徒黃庭坚、晁补之分途發展，以开南宋初期作家的風气；直到辛弃疾，进一步把局面打开，这样才奠定了詞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刘辰翁說得好："詞至东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观，豈与群兒雌声学語較工拙？然犹未至用經、用史，率雅、頌入郑、衞也。在稼軒前，用一語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軒橫竪爛熳，乃知禪宗棒喝，头头皆是。"（"須溪集"："辛稼軒詞序"）由于辛弃疾是一个有肝胆、有魄力而一意以恢复中原自任的爱国男兒，他那火一般的爱国热誠，貫穿在他一生的言論行动中，貫穿在他的所有文学作品中；他只把長短句歌詞形式作为他發泄"不平之鳴"的工具，他打破了一切顧虑，只管写他的"豪杰之詞"。这样充滿着热力的作品，所以能够做到"大声鏜鞳、小声鏗鍧，横絕六合，扫空万古"（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九十八"辛稼軒集序"）的境界。苏辛詞派的确立，是詞学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个經历長期音乐陶冶而成的詞体，到了辛弃疾，才算充分賦予了生命力而放射出异样光芒来。和他同时的陈亮、刘过以及南宋末年的刘克庄、刘辰翁等都是响往辛氏，作風相近，而才力是万万不相及的。

六　姜夔的自度曲和南宋后期的詞風

南宋偏安局定以后，首都临安拥有湖山之美，声色歌舞，保持了一个相当时期的昇平气象。这时除了一部分慷慨激昂的爱国之士，借着長短句来写他們的壯烈抱負外，一般文人仍然特别重視柳、周一派的音乐性和艺术性，想在这一方面作进一步的發展：虽然成就不够大，但也不容一笔抹杀。在这一派里面，最富于創造性的杰出作家，自然要推姜夔。

姜夔是一个精通音乐的詩人兼艺术（書法）家。他不曾做过官，生活圈子是很狹窄的。他的詩繼承了江西詩派的傳統，而又改变了面目，实踐了他的："意格欲高，句法欲响"（"白石詩說"）的理論。夏承燾教授說他"把江西派的內在美（神味）和它的創格鑄辭法融入新体文学的詞里来"，所以能够别开一派，"和苏辛、柳周兩派鼎足而三"（見"文学研究"1957年第一期，夏承燾："論姜夔詞"）。这对姜詞的評价，是相当正确的。因为他是一个音乐家，不甘于沿用旧曲塡詞，从而打开"自度曲"的一条新路。他曾說："予頗喜自制曲，初率意为長短句，然后协以律，故前后闋多不同。"（"白石道人歌曲"卷四"長亭怨慢"小序）像这样的創造精神，确实又把慢詞的表現技法，大大地推进了一步。我們只要一讀他的"長亭怨慢"："閒人多矣！誰得似長亭树？树若有情时，不会得青青如此！"以及"揚州慢"：

"自胡馬窺江去后，廢池乔木，犹厭言兵。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就会感到眞有一气舒卷、宛轉相生的妙境，是姜夔所特有的。傳世的"白石道人歌曲"自注工尺旁譜的有十七首，其中"揚州慢"、"長亭怨慢"、"滄黃柳"、"石湖仙"、"暗香"、"疏影"、"惜紅衣"、"角招"、"征招"、"秋宵吟"、"凄凉犯"、"翠楼吟"等十二首都屬于"自制曲"。这十七首詞所保留的工尺旁譜，为今日仅存的最宝貴資料。据个人所知，夏承燾、楊蔭劉兩教授和丘瓊蓀先生正在向这上面作深入的探討。这对宋詞的唱法和創作民族形式的新体歌曲，都將發生重大的作用，是应該予以特別注視的。

和姜夔并称而作風不同的專業詞人有吳文英。張炎曾把"清空"、"質实"兩种不同境界来評判姜吳二氏的高低。他說："詞要清空，不要質实。清空則古雅峭拔，質实則凝澁晦昧。姜白石詞如野云孤飞，去留無迹；吳夢窗詞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詞源"卷下）吳文英詞确实有"凝澁晦昧"的毛病。他是接受温庭筠、周邦彥的作風，再加上李商隐作詩的手法，也想自創一格的；可惜沒有相当的条件和开拓的襟怀，不覺鑽入牛角尖里去了。近代况周頤、朱孝臧諸詞人都是推重夢窗的。况說："夢窗密处，能令無数丽字……生动飞舞，如万花为春，非若鵝鶵蹙綉，毫無生气也。"（"蕙風詞話"卷二）我們如果專从艺术方面去看吳詞，有些技法似乎也是值得参考的。

南宋末期作家，除前面提到的刘克庄、刘辰翁等是辛派的后勁外，其余如王沂孙、周密、張炎等，都是跟着姜夔走的；虽然也各有不同程度的若干成就，但都是一些"亡国哀思之音"，有如草际虫吟，使人听了难受而已！

七　結　論

赵宋一朝，是長短句歌詞發展到最最光輝燦爛的时代。这个音乐語言和文学語言緊密結合的特种詩歌形式，是从开元以来教坊乐曲的基础上，經过若干無名作者和晚唐、五代以来許多專業作家辛勤积累經驗逐漸發展起来的。北宋初期作家在令詞方面接受南唐系統，提高了它的風格，晏几道要算是达到了頂点的代表作家。由于汴京的經济繁荣，随着教坊杂曲的不断發展，而長調慢詞勃然以兴；柳永适应这个时代需要，把这特种詩歌形式的园地大大地拓展开来了。接着苏軾以"横放杰出"的天才，感于柳詞的"歇皷从俗"，風格不高，反过来，利用这个新辟的园地来發揮作者的詩人怀抱，在內容上打开了"以詩为詞"的新局，于是"弄笔者始知自振"（王灼說），为南宋爱国詞人作了"先驅"。他的門徒，有的跟着他走，如黃、晁等；有的还免不了柳永的影响，例如秦观趋向婉約一派。由于北宋后期的設立"大晟府"，周邦彥得着这个"討論古音、审定古調"的机会，他又把这个特种艺术在柳永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完成了这个音乐語言和文学語言緊密結合的最高艺术形式。由于南宋初期民族矛盾的特別尖銳，所有爱国人士發出"抗敌救亡"的呼声，往往借着这个新兴文学形式来抒写悲憤热烈的情感；于是豪放一路的苏詞，給了他們以啓示，进一步發展到辛弃疾，把这个艺术形式注入了新鮮血液，写出了許多"豪杰之詞"，确定了苏辛詞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李清照和姜夔都想独树一帜，自成其为"詞人之詞"；單就艺术角度去看，也是各有其特点的；姜夔的"自度曲"，尤其值得研究音乐文学者的探究。南宋辛、姜二派，各自分流，直到宋亡，北曲代兴，才見衰歇。历来評論家都把宋詞归納为"豪放"、"婉約"二派，而对各大作家的看法也各有不同。清初朱彝尊特別提出姜夔、張炎来創立所謂"浙西詞派"。中叶以后，又有張惠言倡"比兴"之說，选了一部"詞选"来标示他的宗旨；接着周济又从張的基础上加以扩展，拈出四家，作为学詞的准則，說什么："問塗碧山（王沂孙），历夢窗、稼軒以还清眞之渾化。"（"宋四家詞选"）依据这个标准，建立了所謂"常州詞派"；它的影响，是直到現在，还沒有完全消灭的。現在要从宋詞这个丰富遺产內吸取精华来丰富我們的創作，我覚得从周、姜一派深入探求它的音乐性和艺术性，从苏、辛一派深入研究它的思想性和时代性，这里面是有很多宝貴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的。

1957，7，3，写于上海

略論战国秦汉社会的性質

童書業

中国古代史分期問題的討論，到了現阶段，已經比过去深入了一層，大家已經逐漸从一般理論的討論进入到具体的史料、史实的討論了。但这新阶段的討論，还在开始的时期，所以深入的还很不够，例如关于汉代的租佃制和奴隶制的問題，就有若干值得考虑的看法。有人認为：汉代的租佃制还在萌芽的狀态之中，所以这只是奴隶社会的租佃制而不是封建社会的租佃制。又有人認为：从战国时代起，奴隶已經不从事农業生产了，而在此以前，奴隶多是从事农業生产的。这兩种看法，都是不符合史料和历史事实的。事实上，至少在汉代，租佃制已是主导的、極普遍的剝削形式，奴隶制关系万万比不上它。同时租佃制的开始發展，和債务奴隶制的开始發展，是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的，那就是战国末年。并不是債务奴隶制發展在前，而租佃制發展在后。在战国秦汉时代，債务奴隶制的發展是相当微弱的，它只是当时一种非主要性的和从屬性的社会制度。因此战国秦汉的社会，一定是早期的封建社会（但它的封建制比西周春秋时代的封建制却要發展一步，因为它的私有經济比西周春秋时代要發展而显著），而不是所謂"發展的奴隶社会"。至于奴隶的从事农業，則在春秋以上也是很少的事情，因为东方国家的奴隶，本来很少使用于农業。在东方国家，奴隶社会里的奴隶很少使用于农業，而封建社会里的奴隶倒有使用于农業的，例如中国封建时代的記載中，就有不少奴隶从事农業的証据：春秋文献国語晋語中有所謂"隶农"，就是农業奴隶，但那时这种农業奴隶似乎不多，所以記載中很少看到。汉代的奴隶也有从事农業的，見史記季布傳、王褒僮約等記載。汉末三国时就有"奴执耕稼"的話，見三国志楊戏傳注引襄陽記。南北朝时人常說："耕当問奴，織当訪婢"（这兩句俗話，似本是地主輕視劳动的意思，未必当时农業上普遍使用奴隶），見宋書沈庆之傳、北史邢巒傳等記載（魏書食貨志載李冲說："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当未娶者四"，可見奴婢中有任耕織的，也有不任耕織的）。均田制度規定：有奴婢的人可以多受田地。唐代还有使用奴隶于农業的記載。甚至到了明代，奴僕也还从事农業，見醒世恒言（第三十五卷）等記載。所以奴隶較多应用于农業，并不能証明当时还是奴隶社会。确定社会性質，应从主导的生产关系着眼。战国秦汉时代的主导生产关系，是皇帝貴族等和隶屬于国家的农民，地主和依附于地主的佃农相对立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是向前發展的，領导其它社会关系的；而且無論是战国或秦汉，占劳动人民中極大多数的都是农奴性的农民，而不是奴隶；所以战国秦汉时代是封建社会而不是奴隶社会。至于奴隶逐漸脫离工商業的生产而从事农業，就东方国家說来，倒是封建制度逐漸成熟的征象。因为这种从事农業的奴隶，主要不是进行大农生产而是进行小农生产的，奴隶从事小农生产，本身就帶有封建性。如果是少数家内奴隶从事农業，更不能証明当时还是奴隶社会，因为这种奴隶只是生产上的助手，这不过是封建社会里的贅疣而已。魏、晋、南北朝、唐、明等朝代，是公認为封建社会的，但农業上使用奴隶，可能有些时候比战国秦汉时代还要普遍，这就証明：农業上使用不使用奴隶，与社会性質是無关的。

战国时代的土地自由买卖，是殘存在封建社会里的公社制解体的結果，而公社的解体，則由于生产与交换的發展。此后到了所謂"中古"时代，土地又曾部分的不能自由买卖，均田制崩潰后，土地才又全部自由买卖。土地的自由买卖（也就是比較徹底的私有化），是促使租佃制度出現的主要原因，也就是促使封建制进一步發展的直接原因。西周春秋时代的主要生产关系，是宗法貴族对領民和隶屬农民（原始的农奴）的生产关系，战国秦汉时代的主要生产关系則是国家对隶屬于国家的农民（所謂"自耕农"）和地主对依附性的农民（所謂"佃农"、"雇农"）的生产关系；比較典型的农奴，則是汉末魏晋时代才出現的。此后农民的隶屬性，虽然随着时代的轉移而有强弱的变化，可是直到清代前期，依附农民的农奴性还存在着（例如野叟曝言第五十九回："这庄子一面临水，三面环山，屏崖峭壁中，忽开几里平地，結成这个庄子，并沒一个庄鄰，四散住着几十家，俱是东方庄僕"。"庄僕"即"庄客"，——"近古"期的农奴），并不是战国以后就沒有农奴和农奴性的农民了。至少从战国直到清代前期的"佃农"，都是或多或少帶有农奴性的；便是隶屬于国家的农民，也是变相的农奴：所以这是封建社会。我們不能把战国以后的地主与佃农和西欧領主封建制瓦解时的地主与佃农同样看待。总之，中国的战国秦汉时代，与西欧的封建末期，許多表面上的經济現象，虽然相近，但其实

質却有不同之处。关于这个問題，我們得比較詳細地来分析一下。

出現于战国秦汉时代的商品經济，是古代性的（这里"古代"一个名詞不代表奴隶制），它帶有"古典經济"（大体說来，即一种早期的、不很成熟的商品經济）的色彩。其产生的原因是：由于鉄器的普遍使用，提高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分工，于是發展了交换。而交换的發展，引起了貨幣經济；貨幣經济的發展，引起了商業高利貸；商業高利貸的發展，加强了財富的不平等；財富的逐漸集中，同时又由于一切生产資料的商品化，这就造成了土地兼并。土地兼并的結果，就使"公社"（原始封建制的）大部解体；"公社"的解体，表現为土地集中于地主，大部分农民貧困破产，这就引起了租佃关系的發展、雇工和債务奴隶的出現等等。这种現象，在西方国家和某些东方国家所造成的后果，是形成了發展的奴隶社会。但是在中国和其他某些东方国家，則因封建关系早已取得优势，甚至早已形成封建社会（如中国），所以上述的情况的出現，至多只引起奴隶制經济局部的、畸形的發展，并不能形成發展的奴隶社会；这是因为封建社会不会倒退到奴隶社会去（同时由于中国等东方国家，殘存在早期封建社会里的"公社"，只是变相的封建庄园，所以当这种"公社"解体的时候，也会出現西欧封建末期的某些現象）。然而"古典經济"的現象还是要出現的，其特征是：一、手工業、商業相当高度而集中的發展，由此而引起大城市的出現，但城市的周圍依旧是自然經济占絕对优势的农村，商品經济并不能普遍深入。二、財富，尤其是貨幣的集中，大量貴金屬，如黃金，集中在国家和少数富人的手里，貴金屬貨幣使用量很大，但不能普遍行用。三、貧富悬隔的現象特别严重，社会动盪不定。四、工商業迅速兴起，迅速衰落，結果形成工商業一蹶不振的現象。五、在手工業上，甚至在农業上，出現若干"大生产"的傾向。六、奴隶制經济和雇佣劳动有一定程度的發展。七、商業高利貸的高度發展，引起农村經济的分解，出現大量流民。①必須指出：在东方某些国家，尤其是在中国，这种"古典經济"形态的出現，并不是奴隶制發展的結果（在希腊、罗馬，是奴隶制先有發展，然后逐漸形成古典性的商品經济，商品經济的不断發展，再推进奴隶制，形成古典奴隶社会）；相反的，奴隶制的局部的、畸形的發展，倒是这种"古典經济"所引起的。这一点很重要，如果弄不清这一点，那就很容易把汉代認为是"發展的奴隶社会"。

为什么說上述的"古典經济"形态并不是奴隶制發展所引起的呢？这只須分析一下战国秦汉时代奴隶制經济的發展过程，就可明白。我們知道：在中国古代，"古典"性商品經济的开始出現，是在春秋战国之間，到战国前期，工商業和城市的發展，已不比汉代差多少，可是奴隶制度，直到战国中期，还不曾發展起来。我們看論語和孟子，就可了解：在孔孟的时代，根本沒有什么奴隶問題存在；在論語和孟子里，簡直看不見有奴隶；奴隶制度只是到了战国末叶，才看見有畸形發展的現象。这就可以証明：战国时代的"古典經济"形态并不是奴隶制度所引起的，而奴隶制的畸形發展，却是"古典"性的商品經济所引起的。

許多人夸大战国秦汉时代的奴隶制經济，事实上这时候的奴隶制經济是發展得極其有限的。我們先看那时候的奴隶价格：王褒僮約所載一个"髯奴"的价格是"万五千"；居延汉簡：（据"居延汉簡考釋"）"小奴二人，直三万"（一四六·三七·四三）；"大婢一人，二万"（一四六·三七·三五）。風俗通載一个"老蒼头""直錢二万"：大概汉代一个普通奴隶的价格是錢二万左右。汉代"黃金一斤，直錢万"，那么一个奴隶的价格是黃金二斤（約当今六兩多），这价格是極高的。当时的谷价，大約是每石（約当今二斗）数十錢到百錢左右（汉書食貨志載李悝尽地力之教：粟"石三十"錢。史記貨殖傳引計然的話說："糴二十病农，九十病末，……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則农末俱利。"根据其它汉代史料，平常的谷价与此相去不远）。汉書食貨志載：战国时"一夫挾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又載：西汉时"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根据我的考証：大概从战国到西汉，一个农民一年劳动的收获普通是粟七十五石左右，以中价每石五十錢計算，得錢三千七百五十。当时高利貸的年利是十分之二（見史記貨殖傳），經营工商業的利息也

① 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經济發展現象的特征是：一、手工業商業和城市的普遍發展，农村的自然經济逐漸解体。二、財富虽然逐漸集中，但集中的范圍較广，有大量中等所有者阶層存在。貴金屬貨幣逐漸普遍行用。三、民間貧富悬隔的現象是逐漸产生的，中小有产者人数都很多。四、工商業逐漸發展，無衰落現象。五、只在手工業上有較大的工場企業出現，在农業上除生产工業原料等的农場外，一般仍是小农經济。六、雇佣劳动逐漸發展，一般不使用奴隶。七、高利貸資本多轉向工商業，瓦解农村的作用比較不显著。农村流民多轉入城市，变成雇工。

是十分之二（見史記苏秦傳），这似不是年利。二万錢的年息是四千。一个奴隶的价格为錢二万；养活一个人的費用，据汉書食貨志："食，人月一石半"，則一年是十八石，値錢九百；"衣，人率用錢三百"，合食需錢一千二百（尙有其他費用），再除三十稅一（汉以前是十分稅一或更多）的賦稅二石半，为錢一百二十五，合共一千三百二十五。三千七百五十除一千三百二十五，尙余錢二千四百二十五，已不及工商業和高利貸的利息远甚；同时加上田价和其他农業生产的費用，使用奴隶从事农業，一般是無利可圖的。又奴隶沒有生产兴趣，收获当更少，如根据鼂錯的話：农民二人耕田百亩，收获不过百石，則一个奴隶至多只能收获五十石，値錢二千五百；除去养奴及生产的費用和賦稅等，奴隶主眞是太不上算了。即使后来生产力提高，收获量增加了（"代田法"、"区田法"等法的出現。眞正的"区田法"，可能是东汉时才确立的"氾胜之書"的記載尙有問題），使用奴隶生产，也不会有多大的利益。地主們最有利的剝削方式实是租佃的方式，因为汉代田地的价格很便宜，九章算术："善田一亩，价三百；惡田七亩，値五百"（卷十）。居延汉簡："田五頃，五万"（一四六·三七·三五）；"田五十亩，値五千"（二三〇·二四·一背）。大概汉代中等田地的价格，是每亩二百錢左右（可能再貴些），一頃田値錢二万，相当于一个奴隶的价格。如果把一頃田出租，則"見稅什五"，每年可得七十五石的收获，値錢三千七百五十，除去少数的賦稅，所得与工商業和高利貸的利息相差不远，而且經营土地要比經营工商業和高利貸稳妥些。所以收地租比使用奴隶于农業，合算得多，①这就是战国秦汉时代在农業上租佃制（也就是农奴制）比奴隶制發展得多的根本原因。到了东汉以后，农民进一步农奴化，租佃制的剝削更重，租佃制（农奴制）对于地主說来，就更有利了（只有上等田地，使用奴隶生产才比較合算些，如汉代都城附近的良田价格很貴，这类田可能使用奴隶生产）。

如上所述，战国秦汉时代农業上的奴隶制經济，是不会很發展的（后来"中古"时期，奴隶較多应用于农業，原因似乎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劳动力的不足）；便是在手工業方面。奴隶制經济也并不十分發展。我們知道：战国秦汉时代的主要手工業是鹽、鉄、鑄錢和紡織業，紡織業的生产，主要是依靠农村妇女，除官府等所設奢侈性的紡織業外，紡織業上使用奴隶是不多的，当时的記載正可証明这点。至于鹽、鉄、鑄錢業則据鹽鉄論复古篇說："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鉄石鼓鑄，煑鹽，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汉書称：吳王濞"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車煑海水为鹽"（本傳，史記略同）。可見汉代私家鹽、鉄、鑄錢業的全盛时期經营这种事業的人所使用的劳动力，主要是依附性的手工業者，而不是奴隶（官府冶金等業中主要使用"卒、徒"，"卒、徒"也并非眞性的奴隶）；則汉代奴隶制的生产，可以說是非常有限的。因此說汉代是"發展的奴隶社会"，实在極其勉强。

战国秦汉时代的所謂"奴隶"中，許多并非眞性的奴隶，例如有名的卓王孙家"富至僮千人"的故事，据汉書司馬相如傳說："卓王孙僮客八百人，程郑亦数百人。"所謂"僮"之中还包有"客"在，"客"是依附人，并非奴隶。又如汉末大商人糜竺有"僮客万人"，一次献給刘备的"奴客"就是"二千"（見三国志本傳），"僮""奴"之中也有"客"，可能"客"比"僮""奴"多得多。"客"这种依附人，在所謂"中古"时代，就是农奴，所以这种"主""客"的关系，是屬于封建性的。我以为汉代記載中所謂"僮"多少，"奴"多少，一定包含有許多非奴隶的人在內。这样，我过去所假定的汉代奴隶的数量，就須大打折扣了。其实我們只須看汉代的奴隶价格这样貴，就可推想奴隶的数量不会很多，奴隶制經济不会很發展。我們知道：汉代大富人的財产有名的不过"千万"、"数千万"，最多的不过"万万"。史記貨殖傳把"百万之家"来比"千戶"的"封君"，酷吏傳載宁成說："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則"千万"已为巨富，但这种巨富即使把全部的財产購买奴隶，也只能买到五百个。在汉代"五千万"的巨富已是極少有的了，如果蓄奴婢千人，就需使用他的財产的一半左右，就此可見当时所謂"僮""奴"若干一定不全都是眞性的奴隶，其中不用購买或代价很少的依附人，如"客"之类，一定占極大的

---

① 有人說：使用奴隶于农業，农耕以外，还有其他剝削，农業奴隶的劳动，算在农耕上的，至多只能到三分之二，另外还有三分之一的劳动可以剝削。佃农只交納地租，沒有其他剝削；所以使用奴隶于农業，并非太不合算。按：农業奴隶除从事农耕外，所从事的多是家內劳役，加上这种剝削，奴隶主还是不上算的。又汉代的佃农，并非眞正的"自由农民"，他們被地主所"役屬"、"役使"，汉書貨殖傳說："其为編戶齐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虽为僕虜，犹亡（無）慍色。"崔实政論說："下戶踏踵，……乃父子佽首，奴事富人；躬帅妻孥，为之服役；……貧者……历代为虜，犹不贍于衣食，……岁小不登，流离溝壑，嫁妻卖子"（全后汉文卷四十六）。这所說就是貧佃农一类人。所以这时的佃农已在农奴化，除交納地租外，与奴隶差不多，也有其他的剝削。地主采用租佃制的剝削方式，确是最有利的。

数量。这一点，是研究汉代奴隶制經济的人应当特别注意的！

我們不主張战国秦汉时代是奴隶社会的人，同时又主張这时候有“古典經济”形态存在，那就必須作如上的分析，以說明“古典經济”形态的存在，并不等于奴隶社会的存在。我个人認为：战国秦汉时代的商品經济必須認为是古代性的，否則就無法解釋从魏晋到唐中年五百多年的比較严格的自然經济統治的現象，也無法解釋中国封建社会的長期停滯化，和資本主义萌芽的晚起。①自然，我們也不否認战国秦汉时代有某些与西欧封建社会晚期相类似的情况，但这不是主要的方面。

战国秦汉时代历史的研究成績，現在不但在国外，就是在国內，也还是相当貧乏的。因此，这时期的历史現象，我們还不能弄得很清楚，要分析这个时期的社会性質，还需先作这个时期的一般历史的深入研究，这样，才能够避免孤立地根据某几种历史現象来談社会性質；在思想方法上，才能避免形而上学方法的錯誤。目前国內研究战国秦汉时期历史的專題論文还很少，成書的專著更不多，比較起来，只有楊寬先生所著的战国史，是一部史料和考証相当充实正确而又能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来研究战国历史的著作。这部書在史料和考証上毛病比較少，但还有些小疵，例如有些地方措詞和行文尙欠謹严，解釋尙有問題②。而在理論上則可商討的地方比較多些，例如楊先生認为战国时期的土地自由买卖，是和欧洲“封建制度已被破坏，資本主义已經得到自由的时候”的土地自由买卖差不多的（見頁241）。这种說法，至少是有語病的，因为春秋战国間的土地自由买卖是封建社会里公社制解体的結果，而欧洲的土地自由买卖則是封建制解体的結果，这是兩种不同范疇的土地自由买卖，似乎不能并为一談，又如楊先生認为，“战国时代奴隶很少被使用于农業生产”，这就是“战国时代的社会已經不是奴隶制社会“的証据（見頁77）。其实，西周春秋时代的奴隶，甚至殷代的奴隶，也“很少被使用于农業生产”，而秦汉以后的奴隶，仍有被使用于农業生产的，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所謂“典型封建制时期”，奴隶被使用于农業生产，乃是常事，反駁者如一举出史料上的証据来，簡直無法回答。以上兩点，是楊著战国史中比較可商討的地方。因为这是一本新出版的比較充实而有价值的断代史，所以我在这里略加評論。我和楊先生对于古代史分期的看法，在目前已达于完全一致，但在如上所說的这类理論和史料問題上，我們的看法仍是有分歧的，我在这里提出我的意見，希望楊先生和讀者們不吝指教！

---

① 把古代性的商品經济認为与發展的奴隶制只是一物的兩面，就很容易把封建制生产关系已占絕对优势的战国秦汉的社会說成“發展的奴隶社会”，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把古代封建社会中公社解体后所产生的商品經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帶有資本主义性的商品經济混同起来，又很容易把早期封建制的战国秦汉的社会說成“后期封建社会”，甚至把資本主义的萌芽說到那时候去，这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只有从史料中分析历史事实，才能說明各国历史的特殊現象。

② 如楊先生在頁157說乐毅破齐后，“齐国所残存的土地，大概只有五分之二”，这主要是根据下列的史料作出的結論（尙有其它証据）：战国策齐策一，“（鄒忌）入朝見威王曰，……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燕策一，齐宣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楊先生因此又在頁113說：“实际上这时齐国失掉了三都，即失去五分之三的土地，共七十余城；而另外二都有四十多城尙未完全失守。”这个說法是有可商榷之处的。因有根据史記赵世家的記載，乐毅破齐后，秦赵兩国还屢次攻齐，赵国曾取齐昔陽、麦丘等地。楊先生自己在頁157也指出：秦、魏、赵、楚、魯等国在这时，都曾攻取齐地。又齐在威王时，已有百二十城，宣、湣二王时，灭宋、割楚，西侵三晉，当有扩充的土地；那末究竟乐毅伐齐时，齐国有多少城是很难計算的。总之乐毅破齐后，齐地究竟还剩几分之几，实在很难判断。楊先生的話，似乎說的太肯定些。又如国語晉語九所說：“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的話，是說像范氏、中行氏这样大貴族的子孙去做农民，好比是用宗庙的牺牲去耕田，很可惋惜（参看国語註）。楊先生在頁27里把这句話解釋为：“过去养着准备作宗庙祭祀用的牺牲，这时也就用于农耕了”。这个解釋，也是可以商榷的。又如楊先生在頁49說：“当时市上已什么都有出卖了，而且市区已有相当規模，四周有‘市門’（史記呂不韋列傳），設有‘市吏’来管理（見韓非子內儲說上篇“宋太宰使少庶子之市”的故事）。”按韓非子內儲說上篇已有“市門”之称，原文云：“市南門之外，甚众牛車”。“市門之外，何多牛屎”，这正是“四周有市門”之証。楊先生在“論春秋战国間社会的变革”一文中，“四周有市門”語下無“史記呂不韋列傳”一註（文史哲1954年第3期），这是不諧的。本書加上“史記呂不韋列傳”一註，好像韓非子中無“市門”的記載，稍嫌不妥（史記一註移入下括弧中，另加說明，便妥）。又史記呂不韋傳中但有“咸陽市門”語，并不能証明“四周有市門”，“宋太宰”今本韓非子作“商太宰”，“商”即“宋”，似也应註明。

一得之見

应該重視中国經济学說史的研究

吳忠观

不久以前首都学术界关于中国哲学史問題的討論和关于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議的召开，对于今后推进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是有积極意义的。我們一方面十分庆幸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繁荣，但是另一方面对当前我国关于中国經济学說史的研究，則感到十分冷落。我們認为，应当把中国經济学說史的研究，重視起来。

或者有人要說，中国历史上經济学說最不發达。建立了完整的經济学說体系的思想家几乎沒有，因此，中国經济学說史是沒有研究內容的。这种說法不是由于無知，就是有意的歪曲。其实中国經济学說的产生比世界各国都早，远在公元前十一世紀周公的著作"周礼"中就有对經济問題的論述，公元前七、六、五世紀管子、老子、孔子等，都有自己对經济問題的看法，特别是管子所制訂的管理封建国家的經济思想，可以說是中国早期的国家經济学。这些經济学說比古希臘塞諾芬、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經济学說都要早一、二个至几个世紀。后来董仲舒、王安石等人的經济学說是我国封建主义經济学說的进一步發展。到了近百年来是我国經济学說史上一个新的时代。西欧資产阶級古典的和庸俗的經济学的輸入和我国已經产生的帶有啓蒙观点的經济思想相結合，出現了近代我国薛福成、康有为、梁啓超、孙中山等人为代表的資产阶級的經济学說。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济学在中国得到了迅速傳播，于是中国經济学說史上發生了一个偉大的变革。从此以后中国經济学說史就是以馬克思主义的經济学說与中国經济实际相結合，以及馬克思主义經济学說与各种反馬克思主义的經济学說的斗爭为中心，可見，我国經济学說史是有極其丰富的內容的。

同时，研究中国經济学說史也有極为重大的意义。第一，可以丰富世界經济学說史。凡是研究世界經济学說史的人都感到封建主义时代經济学說內容的貧乏，殊不知这并不是封建主义的經济学說本身貧乏。問題在于，这些研究者把取材的范圍局限于西欧几个国家。我国長期处在封建主义时代，关于封建时代的經济学說有十分卓越的貢献。可見整理我国历史上的經济学說，將有助于克服目前世界經济学說史研究中的缺陷。第二，也可以从我国历史上思想家的經济学說中吸取合理的、有价值的东西，来丰富和發展馬克思主义。馬克思主义的政治經济学是批判的吸取前人的学說而建立起来的，这一点是已为人所公認了。但是有这样兩种观点还是存在的。第一种观点是有些人認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建立馬克思主义經济学說时已經把前人学說中一切有价值的成果都吸收完畢。因此，今天再来說吸取前人的学說已經过时。第二种观点是有人認为馬克思主义的經济学說主要是吸取古典政治經济学特别是亞当·斯密和李加圖的学說而建立起来的，吸取中国历史上的經济学說来發展馬克思主义似乎沒有可能。这兩种說法都是錯誤的、站不住脚的。我們知道，在历史上吸取前人的学說总是从一定的实际需要出發。馬克思吸取前人的学說主要是为了分析和研究資本主义經济，解决当时的任务。在今天我們面临着与馬克思当时不同的时代，我們有新的实际需要。因此，我們除了繼承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遺留下来的一些基本观点、方法之外，还应該从現实的需要出發，以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武器，批判的吸取前人的某些合理的东西，来發展和丰富馬克思主义，并使之有助于我国今天实际任务的解决。事实上，中国历史上一些思想家的經济观点，对于我国今天的实际工作也还是有参考价值的。第三，能够更好的闡揚馬克思主义經济学說对我国的实际意义。因为中国經济学說史有力的証明，在馬克思主义的經济学說傳入中国以前，我国的經济学家还几乎是在黑暗中摸索。只有馬克思主义的經济学說傳入中国并与中国实际相結合，才照亮了中国經济發展的道路，指明了中国經济运动的客观規律，为中国經济学界点燃了智慧的明灯。可見，这对于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济学不适合中国国情論，是一

强有力的反駁。第四，可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們常常說中华民族是勤劳的、勇敢的、智慧的民族，中国人民是聪明的、智慧的人民。这就是因为"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發达的农業和手工業，有許多偉大的思想家、科学家、發明家、政治家、軍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毛澤东选集，卷二，第592—593頁，1952年版。）我国历史上先进的思想家是我国人民智慧的象征。他們的著作是我国人民智慧的結晶。我們应該为我国历史上有这样多的思想家而自豪，为他們給我們留下了丰富的典籍而自豪。我国历史上的思想家所遺留的經济学說，是我們祖先所遺留的宝貴遺产的重要組成部分。整理这份遺产就能够大大的鼓舞我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激發我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第五，它是使我国科学达到国际水平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不能設想忽視我国自己的科学文化遺产，对于本国的文化遺产一無所知就可以使本国科学达到国际水平。無論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資本主义国家中的进步学者，都極为重視本国文化遺产的整理研究。特别是在苏联对于本国經济思想的研究可以說極为重視，所出版的研究历史上俄国經济思想家的著作極为不少。

在我国学术界中，哲学界、法学界关于繼承性問題的討論；最近又有人提出教育学中的繼承性問題，反映了我国学术界从現实的需要出發，向历史人物学習的热情。但願經济学界也能够分出一定的力量来研究、整理我国历史上宝貴的遺产，使中国經济学說史这个領域也能百花盛开。

整理和研究我国古典文艺理論的遺产

应杰　安倫

源远流長的中国古典文学是極其丰富多采的，翻开中国文学史，我們就会看到"詩經"、"楚辞"、兩汉乐府、魏晋乐府、唐詩、宋詞、元曲等等著名詩篇，以及与这些詩歌同时發展的民間歌謠。我們还会看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光輝的历史散文和諸子百家的著作，唐宋古文，清代桐城派的著作；以及反映复杂的城市生活的志怪、傳奇、話本，"水滸"、"三国演义"、"紅楼夢"等等著名的章回小說，和元明清的戏曲。所有这些宝貴的文学遺产，它們各有着自己独具的艺术光輝。

我們的祖先，不仅給我們創造了数不胜数的古典文学巨著，同时，在文学理論方面，也留下了許多宝貴的著作，其中有很多值得我們珍視的艺术观点，可以看到我們的祖先对文学这一社会意識形态本身和它的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許多正确的認識。这些遺产应当是建树我国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論的一个重要来源。

遺憾的是，近几年来，有許多人用教条主义的方式去学苏联的文艺理論，而不顧中国过去和現在的实际，在文艺理論領域內，虽然也闡述了文学的一般規律、構造学說、發展学說，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严重的是，它沒有被移植到我国既有的文艺理論的土壤上，跟我国古代所流傳下来的文艺理論遺产形成了严重的脫节現象。在这种文艺理論中，我們只听到十九世紀俄国的偉大文学理論家柏林斯基說，車尔尼雪夫斯基說，杜勒罗柳波夫說，以及普列哈諾夫說，高尔基說……，而我們的祖先，孔子、王充、曹丕、陆机、刘勰、鍾嵘、白居易、韓愈、王安石、……章学誠等却都成了啞巴。在这种教条主义的"言必称希臘"的情况下，于是我們的文艺理論研究和教学，往往变得很沒有生气，难怪有些讀者和学生这样想："中国过去沒有文艺理論，文艺理論是苏联的、欧洲的。"

整理和研究古典文艺理論遺产的时机应該来到了。我們应当把苏联的文艺理論种植在黃帝子孙的土壤上，讓黃河、長江来灌溉它，在中国現代文学工作者的培植下成長起来，成为中国的花朵，具有中国的特色，从而丰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論宝庫，生动地闡述我国文学發展的斗爭历史，揭示我国文学在不同时代的發展規律。

学术通信

对"試論形式、內容和性質的关系"一文的几点質疑和作者的答复

对本刊今年6月号所載关鋒同志的"試論形式、內容和性質的关系"一文，有兩位讀者分別来信提出了意見。經我們轉給作者后，作者来信作了一些更正和說明。現在我們分別發表在下面：

一　龔育之同志来信（摘要）

关鋒同志这篇文章的第二段着重談了談有机化学。

討論哲学范疇而运用自然科学材料，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是一件我們今天的哲学工作者还做得很不够因而值得大大提倡与鼓励的事情。同时，由于我們的許多哲学工作者过去沒有多少机会学習自然科学，因此今天在运用自然科学材料方面，有时产生不够正确和不够深入的缺点，这也是难免的和可以原諒的。但是，运用自然科学材料，总还是应当力求正确些，深入些，所以这方面發生的一些缺点，提出来談一談，看来总是不無益处的。

关文举例說："甲烷的同系物具有共同的性質，用哲学术語說叫作共性。这是由它們的原子种类相同所决定。"这个說法是不充分的。甲烷的同系物固然"原子种类相同"，那都由碳和氫兩种原子組成，但由碳和氫兩种原子組成的化合物并不止于甲烷的同系物；乙烯的同系物，乙炔的同系物，乃至苯的同系物，都是仅由碳氫兩种原子組成的，但后几类同系物与甲烷同系物的"共性"有很大差别。应当說，甲烷的同系物的"共性"不仅决定于它們原子种类的相同，而且决定于兩类原子之間的一定結構关系，具体的說，决定于它們結構的飽和性質，决定于C_nH_{2n+2}这个普遍的分子式。

关文还說，甲烷的同系物各有各的"个性"，这种"个性"的不同，是"由于它們的原子量不同，虽然它們都是由性質相同的碳原子和氫原子構成的，由于数目不同就引起了質变——性質的不同"。这里用了"原子量"这个术語，但其实指的并不是"原子量"，而是指的"原子的数目"，即碳原子和氫原子的数目。至于"原子量"，它是指各种元素的原子之間的比較重量（把氧原子定为16），与"原子的数目"完全是不同的概念。

还有，文章引用了一段"自然辯証法"的文字，并在其中的"同質异性体"后注明"即同分异構物"，但是，同質异性体与同分异構体是兩回事情。同質异性体是指的像金剛石、石墨、炭黑或赤燐、黃磷这类的由同一种元素構成（前三者同由碳構成，后二者同由燐構成），但由于存在形态不同因而性質不同的物質。同分异構体是指的像丁烷、异丁烷或乙醇、二甲醚这类的化学成分、分子式相同（前兩者同为C_4H_{10}，后兩者同为C_2H_6O）但由于結構不同因而性質不同的物質。至于"自然辯証法"那一段文字中"同質异性体"是譯錯了，应譯作"同分异構体"。

上面談的是三点不够正确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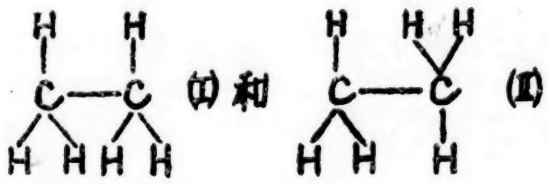
此外，如果談到有机化合物結構理論中物質的化学成分，化学結構及其化学的和物理的性質之間的相互关系問題，那么，关鋒同志文章中所运用的材料，与这个領域中材料的丰富程度比較起来，是很不够的。当然，談得更丰富些、更深入些，这只能算是更进一步的要求。

近来自然科学家对哲学家頗多批評。原因在那里？从哲学工作者的方面来檢查，我以为，主要的当然还在于过去一段时期中哲学与自然科学关系上的教条主义錯誤。但是，哲学工作者运用自然科学材料方面不够正确和不够深入的缺点，也不能不是次要的原因之一。哲学工作者在这方面多努一把力，爭取更正确更深入地掌握自然科学材料，我以为是应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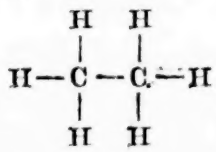
二　王宗睦同志来信（摘要）

第一，关先生文"……物質的性質不仅决定于它的分子內所含有原子的种类与数目，而且决定于这些原子結合的順序"（着重点是我加的）。显然，关先生把这句話当做了布特列洛夫結構理論的眞諦了。可是，这里"順序"二字，依拙見是不妥的。布特列洛夫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被关先生忽略了；这就是：布特列洛夫認为，分子內諸原子間以一定的从屬于它們的"力"互相作用着，他說"……我把这种力的分配叫做化学結構"。布特列洛夫認为物質的化学結構决定其性質。因此像关先生所說的"順序"是不妥当的。我們还可以举一个事实来說明"順序"的不妥。比如

乙烷CH_3-CH_3分子，可以采取兩种不同構型（空間的）：



随着条件不同，（Ⅰ）、（Ⅱ）兩种型式的分子所占比例是不同的。因为二者的性質是不同的（諸如內能、比热……）。显然这里不能簡單地用結合的順序不同来說明了（从結構式看来，只有一种乙烷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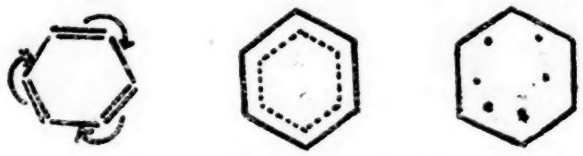


像关先生写的那样）。（Ⅰ）、（Ⅱ）兩种分子性質之不同是由于它采取不同的構型时，分子間諸原子相互作用的力改变了。这是有物理內容的，"順序"是不足以說明的。这样一来，关先生的說法就不能認为是妥当的了。所以，对于一个分子来說，究竟什么算內容，什么算形式，有进一步探討的必要。

第二，跟着上面而来的是，关先生的內容（原子种类和数目）和形式（原子結合的順序）相互制約的論点；即"炭必为四个化合价，必須与四个原子結合成飽和烴，否則剩下化合价就要成非飽和烴"的說法，也就成为不妥的了。例如苯分子C_6H_6，按关先生应該是不飽和的了。但实际上苯分子既不是飽和的，也不是不飽和的，而是一种特殊的"芳香烴"。这一点讀过有机化学的人都知道。显然造成这个特性也不是原子結合的順序或种类，数目等。而是力的分配。按現今的結構观点来看，苯分子是一共軛系，各炭原子除三个共价之外还有一个共有的π一鏈。通常表示成

这一点就談到这里。

第三，在論及正丁烷和异丁烷的时候，关先生說："我們再拿正丁烷和异丁烷来說，……仅仅由于結構式（着重点是我加的）不同，則發生性質不同的情形"。又說"……它們的这种特殊性，就純粹是由分子結構式不同决定的"。还說道："……前者說明基于化学成份和結構式不同，而化合物性質不同；后者說明仅仅由于結構式不同（以上兩处着重点均系我加的），而性質亦有所不同（着重点原有）"。这里，关先生数次提到的是結構式而不是結構，这也是不妥当的。我們知道一物質的結構，是客观实有的，而結構式不过是人工的描写罢了。所以本質的东西是結構，而不是結構式。何况結構式往往写得还不一致。比如苯分子就有



等不同写法（每一角隅代表一个"CH"）。

除以上談到之外，23頁左欄29行中"原子量"应改为"分子量"（想系笔誤）。

三　关　鋒同志的答复

1、答龔育之同志

龔育之同志提出：哲学工作者应当爭取更正确更深入地掌握自然科学材料；我百分之百的贊成这主張，并且要履行。龔同志对拙文"試論形式、內容和性質的关系"中談到有机化学部分的批評，我基本上同意，并表示感謝。所指三个不够正确的地方，第一个是由于疏忽；这是一个錯誤，龔同志的指正是很对的。第二个是用詞的不当，把專門的化学术語"原子量"混同于"原子的数目"。而第三个則是另外一种情形。"金剛石、石墨、炭黑或赤燐、黃燐这类的由同一种元素構成，但由于存在形态不同因而性質不同的物質"与"同分异構現象"是兩回事，我是知道的；拙文引用"自然辯証法"的一段文字，在其中的"同質异性体"后注明"即同分异構物"，是就引的那段文字注的，显然恩格斯指的确实是"同分异構物"，而不是金剛石、石墨或赤燐、黃燐等类由同一种元素構成、因存在形态不同而性質不同的現象。从这个意义上說，我注为"即同分异構物"是对的。至于是否翻譯上有錯誤，当时沒有顧及到，因而沒有請教翻譯專家。龔育之同志指出："自然辯証法"那一段文字中"同質异性体"是譯錯了，应譯作"同分异構体"；如是，就糾正了一个翻譯上的錯誤。在这里，順便对翻譯家們提个意見；專門术語的翻譯要統一起来；專門翻譯哲学著作的跟專門翻譯自然科学的也要通通气，似乎这方面还有問題。例如龔同志所說应譯为"同質异性体"的，在56年出版的"普通化学教程"中就譯为"同素异形体"。

龔同志指出：拙文运用自然科学材料不深入，是完全对的。我想，不仅是运用有机化学材料很不够，而且只是有机化学的材料，面也太窄了，例如普通化学中的"同素异形体"（或"同質异性体"）就是論証拙文中所要論証的那个哲学原理的絕好材料。

龔同志还指出："近来自然科学家对哲学家頗多批評。原因在那里？从哲学工作者的方面来檢查，我以为，主要的当然还在于过去一段时期中哲学与自然科学关系上的教条主义錯誤。但是，哲学工作者运用自然科学材料方面不够正确和不够深入的缺点，也不能不是一个次要的原因之一。"而我以为：从我国情况看来，似乎哲学工作者很少运用自然科学材料，似乎哲学工作有"跛足"的現象；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当然，龔同志指出的那种現象也是有的，至少我的文章就是一例。不过，在这里我需要声明一下：在哲学上我是一个学徒，在自然科学上我是一个門外汉；希望自然科学家不因拙文对哲学家引起什么观感。我为了論証"形式、內容和性質的关系"，临时抱佛脚补習了一下有机化学。当写到这一部分时，曾想到定会有錯誤，还是不要班門弄斧的好。后来这一部分还是保留了。其原因，一則如龔同志所說，有点盆子会得到自然科学家的原諒；二則（更重要的）引起自然科学家或哲学家的糾正，也就可能从而引起他們对拙文所論述的那个哲学原理的注意，这样就收到了抛磚引玉之效。我希望会是如此，希望哲学家們充分运用現代化学材料，深入探討和論証形式、內容和性質的关系及由量变到質变轉化的規律。

2、答王宗睦同志

（一）关于第一、二兩点，似乎王同志是更深入的考虑問題。拙文中"順序"一詞是指的構成分子的諸原子是怎样結合的；在有机化学中（据我了解）常常这样說："表明分子內所有原子的結合順序的化学式叫做結構式"。我認为：关于物質的性質决定于它的分子的結構这一条原理，是布特列洛夫化学結構理論的基本原理（或"眞諦"）之一。至于"分子內諸原子以一定的从屬它們的'力'相互作用着……"，拙文沒有涉及，那是由于我沒有深入掌握現代有机化学的材料，所以論述也是浮淺的。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缺点。运用現代有机化学的材料論証形式、內容和性質的关系及由量变到質变轉化的規律，只是稍稍涉及。

（二）第三点，王同志的意見是对的。但拙文只是用詞不太确切，所謂"結構式不同，性質亦有所不同"的"結構式"，显然是指的：物質的客观、固有的結構，而不是指的写在或画在紙上的"結構式"。

訂　　正

本刊今年6月号第36頁右欄第11行"这还是一个……"系"这不是一个……"之誤。特此訂正。

中国哲学史講授提綱（初稿）（七）

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编

第三节　張載的唯物主义学說

張載（1020—1077）字子厚，在陝西郿县横渠鎮講学，学者称横渠先生。

張載是宋代最偉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坚决地进行了反对佛教唯心主义的斗爭，同时对于天文学医学都有研究，总結了当时的自然知識，从而建立了自己的唯物主义体系，把唯物主义提到新的水平。

張載經常注意民間的疾苦，他对于人民的痛苦有深切的同情。有一年陝西大旱，他走路看見餓殍，伤感悲痛，回家后整天吃不下飯。他更要求解决"貧富不均"的問題，尝說："貧富不均，教养無法，虽欲言治，皆苟而已"（行狀）。于是提出了恢复"井田"的主張，建議"以田授民"。他还想买一大塊土地作井田的試驗，但未成事实。他的恢复井田的主張，表面上看来是复古的，但其中包含了解决貧富不均問題的眞誠願望。

張載的主要著作是"正蒙"、"西銘"、"易說"等，还有弟子記录的"語录"。（明朝人把当时存在的張載著作編集为"張子全書"）

（1）天人本末　对于佛教唯心主义，張載展开了激烈的斗爭。从唐代韓愈以来，批判佛教的人很多，但是都从社会倫理观点反駁佛教，沒有接触到哲学的基本問題。張載与他們不同，直接从哲学基本問題方面，严厉地批判了佛教的"一切惟心"的唯心主义学說。

張載指出，佛家認为世界是心造的，乃是顚倒本末的荒謬思想。"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灭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穷而謂之幻妄，眞所謂疑冰者歟？"（正蒙大心篇）物質世界是巨大的根本的，而心是微小的从生的，佛家反認为天地因人心而起灭，那是把本末的关系顚倒了。

張載更指斥了佛家以世界为假相的学說，"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范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尽，則誣天地日月为幻妄"（同上）。天地日月都是实在的，都是离开人的意識而独立存在的；佛家却認为虛假的，眞是荒謬的思想。

在这些批判佛家的言論中，張載明确地肯定了物質世界的独立存在，肯定了物質的第一性。

（2）气与太虛　張載提出了一切存在都是气的学說。他認为一切存在一切現象都是气，一切物体都是气所構成的。"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正蒙乾称篇）。世界乃是气的世界。張載更提出了关于气的明确的界說。"所謂气也者，非待其蒸郁凝聚接于目而后知之，苟健順动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尔"（同書神化篇）。看得見的如云烟之类固然是气，但气不一定是看得見的。只要可以說有运动靜止的广闊深远的，都是气。这里，他指出气的兩个特点，一是有运动靜止，一是有广度深度。有如此特点的气正是我們今日所謂物質。气就是有运动靜止有广度深度的实体。

張載提出"太虛卽气"（正蒙太和篇）、"虛空卽气"（同上）的学說。所謂太虛卽是广大的天空。广大的天空看来好似空無所有，其实充滿了气，是气散而未聚的狀态。他說："太虛不能無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虛"（同上）。气散則为太虛，聚則成万物。他以水与冰的关系作比喻来說明太虛和气的关系。"气之聚散于太虛，犹冰凝釋于水"（同上）。太虛、气、万物、乃是同一实体的不同狀态。張載又說过："太虛無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同上）。气散而未聚，乃是气的本来的狀态，所以說是气之本体。气的凝聚是变化不定的，所以叫作客形，客形卽是出入不定的形态。这里所謂本体不是和現象对立的。

張載指出，假如認为"虛能生气"，那就是承認"有生于無"，实际上太虛也是有而不是無，"知太虛卽气則無無"（正蒙太和篇）。太虛就是气，不应該說虛生气。假如認为"万象为太虛中所見之物"，那也是把虛与气割裂了，那就会陷于以虛空为唯一实体而以山河大地为假相的唯心主义，更是錯誤的了。总之，太虛就是气，不可以把虛与气对立起来。

張載論証了"太虛卽气"，也就是肯定气是唯一的实体。太虛也是物質性的，天空与万物共同構成無限的物質世界。

張載从唯物主义观点給予道的观念与天的观念以明确的解釋。他認为道就是指气化而言。"由气化，有道之名"（正蒙太和篇）。道就是气的变化的过程。这气的变化过程也就是陰陽相互推移的过程，其中

总括陰陽二气，是陰陽的統一。陰陽的統一也叫作“太和”。太和就是道。“太和所謂道”（同上）。这就是肯定，道即是气，道是物質变化的总过程。

張載認为，天就是指太虛而言。“由太虛，有天之名”（同上）。天就是广大的天空。把太虛，气，与万物总括起来，也叫作天，这所謂天就是宇宙的全体，即至大無外的全体。“天大無外”（同上）。这样，天即是广大無限的物質世界。

張載指出，天只是气，是沒有意識的。“天惟运动一气鼓万物而生，無心以恤物”（易說）。“天無心，心都在人之心”（理窟詩書篇）。人是有心的，天則無心。心是从生的后起的現象。“思尽其心者，必知心所从来而后能”（正蒙乾称篇）。心是有所从来的，就是說，心不是根本的，而有它的根源。心的根源在于物。“人本無心，因物为心”（語录）。外物作用于人的身体，然后引起人的認識活动。

（3）气之性——神与能 張載認为，气是經常在运动变化之中的。气的运动变化，不是由于外在的原因，而是由于內在的动力。这气的变化之內在的动力也就是气的能动的本性，叫作神，也叫作能。这所謂神不是指有人格有意志的神灵，也不是指能認識的精神作用，而是指气的变化之內在的动力。这神的观念是由易傳来的。

張載認为，神是天的本性，是一切变化的根源。“神天德，化天道，德其体，道其用，一于气而已”（正蒙神化篇）。天德即自然世界的本性。神是自然世界的本性，化是自然世界的过程。本性是过程的根源，过程是本性的表現，二者是統一于气的。天的本性也即是气的本性。“气之性本虛而神，則神与性乃气所固有”（同書乾称篇）。神与性是二而一的，是气所固有，內在于气之中的。这神性即能变的动力。“惟神为能变化，以其一天下之动也。”（同書神化篇）

这性也叫作“浮沉升降动靜相感之性”。“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胜負屈申之始”（正蒙太和篇）。这性也叫作“屈申动靜終始之能”。“惟屈申动靜終始之能一也。故所以妙万物而謂之神，通万物而謂之道，体万物而謂之性”（同書乾称篇）。从其“妙万物”而言，謂之神；从其“体万物”而言，謂之性。其实只是一个“屈申动靜終始之能”，即变化运动的潛能而已。

張載又提出“机”的观念。“气块然太虛，升降飞揚未尝止息。……此虛实动靜之机，陰陽剛柔之始”（同書太和篇）。他曾經解釋所謂机道：“凡圜轉之物，动必有机。旣謂之机，則动非自外也”（同書参兩篇）。机就是运动的內在原因，即內在的动力。神也即是机，乃是气的自己运动之內在的源泉。

关于性的內容，張載有进一步的分析。他指出，这能变的本性即是統一之中包含对立。“性其总，合兩也”（正蒙誠明篇）。“一物兩体气也。一故神，兩故化”（同書参兩篇）。一物之中包含兩部分或兩方面，这兩方面互相作用，因而有無穷的变化，对立的兩方面相互作用，叫作“感”。“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同書乾称篇）。二端相感即是性的內容。从主动方面叫作“感”，从受动方面說就叫作“应”。“神者太虛妙应之目”（同書太和篇）。对立的兩方面有感必应，这就是太虛的本性，即气的本性，亦即物質世界的本性。

張載肯定物質是自己运动自己变化的，物質具有运动变化的本性。

張載討論了鬼神的問題，他不承認人死有知，他指出所謂鬼是不可信的。“今言鬼者不可見其形，或云有見者且不定，一难信。又以無形而移变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推，二难信”（拾遺）。“今更就世俗之言詳之，如人死皆有知，則慈母有深愛其子者，一旦化去，独不日日憑人言語，托人夢寐，存恤之耶？今世之稍信实亦未尝有言亲見者”（同上）。他否認了关于鬼的迷信。同时提出对于鬼神二字的新解釋。他認为鬼神是气的兩种作用。“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正蒙太和）。“鬼神往来屈伸之义”（同書神化）。鬼就是往而屈，即是沒落的过去的东西。神就是来而伸，即是新生的方来的东西。在这个解釋中，他否認了鬼神的宗教意义，却也保持了鬼神这兩个名詞，这还是受了儒家經典的束縛。

張載有时將“神化”与实物对立起来。他曾經說：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尔”（正蒙太和篇）。用“糟粕”二字来講万象，含有鄙視有形物体的傾向。他又說过：“太虛为淸，淸則無碍，無碍故神。反淸为濁，濁則碍，碍則形”（同上）。神不是物体而只是一种本性。形是一件一件的物体。神与形在这个意义上是对立的。但張載所說不够明确，很易引起誤会。他又說：“虛靜照鑒，神之明也”（同書神化篇）。这所謂“明”，“照鑒”是指太虛的光亮透明。但更易引起誤会。有人根据这些話認为張載所謂太虛是精神性的，認为張載所謂神是神灵或精神，都是誤解或故意曲解。但張載有些文句意义不够明确，也是他的一个缺欠。

（4）万物之理 張載指出：物質世界有复杂的錯綜的变化，而它的变化有一定的規律。“天之不測为神，神而有常謂天”（正蒙天道篇）。自然世界的变化是極其复杂的，但这复杂的变化具有恒常性。这恒常性叫作理。“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塗，然其

为理也順而不妄”（同書太和篇）。張載肯定：“万物皆有理”。（語录）。这理即是“变化之理”（易說）。張載明确肯定了理的客观性。“理不在人，皆在物。人但物中之一物耳”（宋本張子語录）。理是在物中的，是不能离开物的。

張載更說明了气、理、道的关系。“陰陽者天之气也。生成复幬天之道也。損益盈虛天之理也。道得之同，理得之异”（語录）。道是总的变化过程，理是变化的条理。道是普遍的，理是特殊的。

（5）变化与兩一 对于事物的变化及其規律，張載曾經进行深刻的观察与分析，得到許多極有价值的結論。这部分学說可以說就是他的辨証思想。

張載指出，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沒有孤立的东西。“物無孤立之理，非同异屈申終始以發明之，則虽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异有無相感，則不見其成”（正蒙动物篇）。物与其前后左右的物有联系；事与其前后四周的事也有联系。

張載提出变化的兩种形式的学說。一种是显著的“变”，一种是逐漸的“化”。“变言其著，化言其漸”（易說乾卦）。他又指出兩者之間的关系：“变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变，以著显微也”（正蒙神化篇）。著变引起漸化，这是由巨大的轉入于細微的；漸化中的裁断叫作变，这是以显著的表現出那細微的来。所謂“变而裁之”接近于“連續性的中断”。

張載也有簡單的抽象的發展观念。他解釋易傳“生生之謂易”說：“生生犹进进也”（易說）。进而又进，进进不已，这就不是循环了。“进进”就是“日新”。他說：“日新者久無穷也”（正蒙大易）。世界是新而又新的無穷無尽的过程。

張載提出“兩”与“一”的观念，以对立的相互作用为变化的原因。“一物兩体气也。一故神（自注兩在故不測），兩故化（自注推行于一）”（正蒙参兩篇）。一中有兩，兩又合一，就是說，統一之中包含对立，对立的兩方面又有統一的关系。这样，便發生复杂的变化。張載更說明了对立与統一二者之間的关系：“感而后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無以見易”（同書太和）。有对立然后才有統一可說。“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体者，虛实也，动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同上）。假如对立之間沒有統一的关系，那末对立也不起作用了。

張載認識到对立的斗爭。“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篇）。一切現象都有对立，对立兩方面所为相反。相反就相仇，即相互斗爭。但斗爭一定归于和解。他認識了对立的斗爭，这也是一項重要貢献。

（6）見聞之知与德性所知 在認識論方面，張載的学說，有唯物主义的成分，也有唯心主义的成分。張載首先肯定，人的知識的来源在于感官有所接受，而感官有所接受，又由于“內外之合”即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人謂已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正蒙大心篇）。“合”即由交互作用而統一起来（正蒙乾称篇：“感即合也”。合与感同一意义）。客体作用于主体，主体有所反应，就是內外之合。知識不是內發的，而是由于外在事物对于主体的作用。張載肯定知識以外在世界为基础。“感亦須待有物。有物則有感，無物則何所感？”（宋本語录）“人本無心，因物为心”（同上）。感覚的發生以外物的存在为先决条件。这个观点是鮮明的唯物主义观点。

張載提出兩种知識的說法，他認为有从耳目得来的“見聞之知”，即感性的認識；还有比見聞更高一級的知識，叫做“德性所知”。他認为这德性所知是不依靠見聞的。“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見聞”（正蒙大心篇）。德性所知即是关于“神化”的知識，即所謂“穷神知化”。他以为穷神知化以道德修养为基础，所以叫作德性所知。張載看到有比見聞更高一級的認識，这是正确的，但把这高一級的認識神秘化了，又完全否認了它与見聞的联系，于是陷入于唯心主义。但这德性所知也是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識，叫作“合內外于耳目之外”。这一点还保持了唯物主义观点。

張載認为，見聞之知的眞确性的标准是公共。“独見独聞，虽小异，怪也，出于疾与妄也。共見共聞，虽大异，誠也，出陰陽之正也”（正蒙动物篇）。群众的共同見聞就是事实。德性所知的眞确性的标准是“断事無失”。“吾学既得于心，則修其辞命，辞無差，然后断事。断事無失，吾乃沛然”（行狀）。断事無失即是預断証实，这是学說正确性的标准。

（7）“天地之性”与“气質之性” 張載提出一种神秘的人性論，認为人性有兩層，一是“天地之性”，即人与万物共同具有的本性；一是“气質之性”，即一个人因其特殊形体而具有的特殊的性質。天地之性是普遍的，是任何人任何物所同有的。气質之性則人与人不同，“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正蒙誠明篇）。“形而后有气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同上）。这天地之性也就是“气之性”，即气的本性，即物質世界的一般的本性；人是气所構成的，所以也具有这本性。从一方面說，人是物質世界的一部分因而具有物質的本性，这是事实。

但从另一方面說，这性都不就是人性，而与人性有区别。張載認为“气之性”就是人的最根本的性，这就混淆了問題。因“气之性”是永恒的，于是認为人的本性也是永恒的，在生以前即已存在，在死以后也不消灭。这就陷入神秘主义了。

張載認为，假如人們能够認識自己的本性是与一切人一切物相同的，就会汎爱一切人一切物。于是他以为这普遍的本性即是道德的基础，这样賦予“天地之性”以道德的意义。他又認为，气質之性是偏杂不純的，应該加以改变。于是提出了“变化气質”的学說。

（8）“民吾同胞”“爱必兼爱” 在“西銘”中，張載提出了“民胞物与”的学說。“乾称父，坤称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独鰥寡，皆吾兄弟之顚連而無告者也。”一切人都是天地之子，在这个意义上都是平等的。这里所謂“乾坤父母”只是比喻之詞。“天地更分甚父母？若語道則不須如是言”（語录）。一切人都生存于同一世界上，所以都是兄弟。張載又講人道的基本原則說：“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正蒙誠明篇）。所謂兼爱就是視人如己。“以爱己之心爱人，則尽仁”。（同書中正篇）

这种汎爱思想的实际意义如何？这要看这种学說是对誰宣傳的。北宋中期的情况，阶級矛盾虽然日益复杂化，然而基本的問題还是改善人民生活的問題。張載的西銘乃是对地主阶級知識分子講的。应該承認，这种“民胞物与”的思想在当时主要是要求統治集团对于人民有所讓步，减輕对于人民的压迫，所以是有进步的意义的。

但是“物吾与也”的观念，不仅要求爱一切人，而且主張爱一切物，認为应該“視天下無一物非我”（正蒙大心篇），陷入于一种神秘主义。此外，西銘中还宣揚“乐且不憂”的乐天順命思想。把全宇宙看作一个大家族，从宗法关系来說明人的义务，这就含蘊着承認宗法关系是永恒的，因而起了巩固当时封建社会中宗法制度的作用。这是西銘的保守方面。

張載又把“爱”与“礼”結合起来。“恭敬樽节退讓以明礼，仁之至也，爱道之極也”（正蒙至当篇）。他强調了礼的重要。这也是保守的思想。

張載認为天道与人性是統一的。“所謂誠明者，性与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别也”（正蒙誠明篇）。但他也指出了天道与人道的区别。“老子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芻狗，此是也。聖人不仁，以百性为芻狗，此則异矣。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于是分出人之道不可混。聖人苟不用思虑，憂患以經世，則何用聖人？”（易說）天無思虑憂患人則不能無思虑憂患。自然界沒有意識，社会生活則須經过意識的安排。社会生活有别于自然过程。

張載認为义利是統一的，公共的利益就是义。“义公天下之利”（正蒙大易篇）。他强調了利民的重要。“利于民則可謂利，利于身利于国皆非利也”（拾遺）。人民的利益才是公共的利益。

（9）“井田”与“均平” 張載指出，貧富不均是当时的基本問題，主張“均平”。“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理窟周礼）。他提議实行井田，把田地收归国有，然后分給人民。井田的原則是“人受一方”，“以田授民”（同上）。为了消除大地主的反对，他主張使大地主作“田官”，以补偿他們的土地。“其多有田者使不失其为富”（同上）。但这使大地主作田官的办法还是暫时的。“始則因命为田官，自后則是擇賢”（同上）。这恢复井田的主張表面上看来是一种复古思想，但其中包括了解决土地占有問題的改良願望。

張載提出关于中国唯物主义基本范疇“气”的明确的比較完备的解釋。他明确地論証了世界的物質性，論証了物質实体的自己运动。他更提出关于事物变化基本規律的精湛学說。他对于中国古典唯物主义与古典辯証法思想作出巨大的貢献。

張載的唯物主义学說遭受到后来唯心义主者的批評。但他的学說深刻地啓發了南宋以后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是宋明哲学中唯物主义傳統的奠基者。

第三节参考文件

張載：正蒙——太和篇，参兩篇，神化篇，誠明篇，动物篇，乾称篇。（参看王植：正蒙初义）

張子語录（四部叢刊影宋本）

第四节 北宋中期“功利”思想与“反功利”思想的斗爭

（一）李覯的社会思想

北宋中期，阶級矛盾与种族矛盾日益深刻化，中央政府的財政發生困难，人民生活日益困苦，軍队無力应付外来的侵略。在这种条件下也出現了注意現实問題、重視“功利”的思想家。其中最主要的是李覯与王安石。

李覯（1009——1059）出身于中小地主阶級，沒有考中进士，靠私人教学維持生活。晚年才被任命为太学說書。他是一个不得志的学者。著作很多，都收

在李覯講文集中。

李覯沒有提出宇宙观方面的理論，他的研究范圍是社会政治問題。他的思想的特点就是重視“功利”，反对孟子董仲舒不講功利的态度。

（1）論“利” 李覯指出，一般的儒者都“貴义而賤利”，其实是不应該的。“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則治国之实，必本于財用”（富国策一）。政治上各方面的問題必須有財才能解决。“礼以是举，政以是成，爱以是立，威以是行”（同上）。解决經济問題是行政的第一要务。“賢聖之君，經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同上）

李覯指出，“利”与“欲”都不是不可以講的。“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原文）利是人們維持生活的必要条件。“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同上）欲是人的自然的情感。利欲本身并不是罪恶。假如求利而違反了礼，那是貪；假如求欲望的滿足而違反了礼，那是淫。貪与淫是罪恶。利欲而合乎礼，就都是正当的。李覯肯定了利欲的重要，也就是肯定了物質生活的重要。

李覯虽然講利，但他不是商人阶級思想家。他主張中央政府掌握理財之权，防止商人屯积居奇壟断取利。“財者君之所理也。君不理則蓄賈專行，而制民命矣”（富国策六）。他主張政府实行“平糴”之法以便利农民。这一思想反映了人民摆脫豪商剝削的願望。

（2）論礼 李覯强調“礼”，他認为礼是人生的最高准則。物質生活問題的解决，欲望的滿足，都应該遵守礼所規定的限度，礼包括“飲食、衣服、宮室、器皿、夫妇、父子、長幼、君臣、上下、师友、宾客、死丧、祭祀”等等的标准。他以为礼是“仁义礼智信”以及“乐刑政”的总和。乐刑政是礼的三支，仁义智信是礼的别名。他这样把礼抬高起来。

儒家所講的礼基本上是巩固封建的生产关系的工具。李覯特别重礼，所以基本上他是維护封建制度的。李覯思想的进步性在于，在維护封建制度的条件下，他要求注意經济方面的实际問題，要求注意人民的物質生活。

（3）均田 李覯注意到土地問題的严重性。他指出，耕者不免飢餓，养蚕的人不得穿衣，而“不耕不蚕”的人反而获得厚利。那些大地主大商人，“巨产宿財之家”，反而有吃不完的五谷，穿不尽的衣服，他主張恢复井田。“井地立則田均，田均則耕者得食，食足則蚕者得衣”（潛書）。他認識到，假如土地問題不解决，那末，所謂礼也就談不到了。“法制不立，土田不均，富者日長，貧者日削。虽有耒耜，谷不可得而食也。食不足，心不常，虽有礼义，民不可得而教也”（平土書）。不均土田，耕者不可得食，礼义也就都成为空話了。

李覯看到食是礼的基础。“人所以为人，足食也”（国用一）。这一点是与他的重利的观点一致的。

李覯也反对佛教。他主要从生产观点来講。認为佛教徒不从事生产劳动，反而靠农民养活，所以是社会的一个大害，应該反对。这比專从封建倫理观点批判佛教的議論要进一步。但他沒有从宇宙观方面加以批判。

（二）王安石的哲学观点与社会思想

王安石（1021——1086）是北宋中期偉大的政治家，曾經主持一次变法运动。他出身于中小地主阶級，对于人民生活的艰苦抱一定的同情。他有一首感事詩說：“賤子昔在野，心哀此黔首。丰年不飽食，水旱尙何有？虽無剽盜起，万一起不久，特愁吏之为，十室灾八九。”他看到了人民受剝削受压迫的悲慘情况。他的發廩詩說：“后世不复古，貧穷主兼并。非民独如此，为国賴以成。我尝不忍此，願見井地平。”他反对兼并，主張寻求减輕貧富不均的道路。

（1）道有本末 王安石沒有提出系統的宇宙观来。但他的基本傾向是唯物主义。他肯定万物的根源是自然的，是离开人的意識而独立存在的。他說：“道有本有末。本者万物之所以生也，末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万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后万物以成也”（文集老子篇）。万物之“所以生”是不依靠人的；万物之“所以成”是有待于人力的。他肯定了万物的独立存在，又肯定了人类的能动作用。

王安石認为，万物的最初的根源就是太極。“夫太極生五行，然后利害生焉”（原性）。太極生出五行，然后出現复杂錯綜的現象。但他沒有詳細的解說。他以太極为世界根源，基本上是和周敦頤一致的。

在講到人的身心关系时，王安石肯定身是第一，心是第二。“神生于性，性生于誠，誠生于心，心生于气，气生于形，形者有生之本”（礼乐論）。这里把心与神分为二事，意义不明确。但他断言形是根本，却是明显的。这也是唯物的观点。

王安石也有簡單的辯証观念。他認为“道立于兩”（洪范傳），对立是根本的。他認为五行都包含对立。“蓋五行之为物，其时其位，其材其气，其性其形，其事其情，其色其声，其臭其味，皆各有耦。一柔一剛，一晦一明，故有正有邪，有美有恶，有丑有

好，有凶有吉。性命之理，道德之意，皆在是矣。耦之中又有耦焉。而万物之变遂至于無穷”（同上）。現象表現了对立，对立的每一方面也包含对立，于是引起無穷的变化。

在历史观方面，王安石也肯定了变化。他認为古今不同，事情的变化是复杂的。“夫天下之事，其为变豈一乎哉？”（非礼之礼）他指出“权时之变”的重要。

王安石的哲学思想是断片的不成系統的，他繼承了过去唯物主义者的一些正确观点，却沒有进一步的發揮。

（2）有为 王安石肯定了人的能动作用，在政治思想方面，主張积極有为，反对古代道家的無为思想。“至乎有待于人力而万物以成，則是聖人之所以不能無言也無为也”（文集老子）。于是他肯定了“礼乐刑政”的重要。“故昔聖人之在上，而以万物为己任者，必制四术焉。四术者，礼乐刑政是也，所以成万物者也”（同上）。所謂礼乐刑政是封建社会的上層建筑的主要部分。王安石講积極有为，是正确的。但講到有为的具体內容，却仍然只是“礼乐刑政”，这表現了时代的和阶級的局限性。

王安石的历史变化的观点与有为的思想，都是他的新法的理論根据。新法的中心观念是关于“理財”的原則的思想。“蓋聚天下之人，不可以無財；理天下之財，不可以無义。夫以义理天下之財，則轉輸之劳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貨賄之有無，不可以不制，而壓重歛散之权不可以無术”（乞制置三司条例）。理財一定要有原則，实施这原則一定要有办法。最主要的办法就是政府掌握經济大权，掌握充足的貨物来管制市場上的貨品价格。使“富商大賈”不得屯积居奇抬高物价。“稍收壓重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劳費，去重歛，寬农民，庶几国用可足，民財不匱矣”（同上）。这样旣可以解决国家財政問題，也可以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

（三）司馬光的哲学观点与社会思想

北宋中期，在政治上与王安石处于对立地位的是司馬光（1017——1086）。司馬光对于史学有巨大的貢献，他編成了一部杰出的編年史資治通鑒。在政治方面，他却是一个保守派，反对变法。他的有关哲学的著作是“迂書”与“潛虛”。迂書的內容很簡單，潛虛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其中也沒有深刻的思想。他的哲学思想也是不成体系的。

（1）潛虛的“心学” 潛虛是模仿太玄而作的，“玄以准易，虛以拟玄”。其中包含了許多圖式，是一种“象数之学”。以五行的五为基本数。易經有六十四卦，太玄有八十一首，潛虛包括五十五“名”。这种圖式只是一种文字游戏。

潛虛首段講論万物的根源。“万物皆祖于虛，生于气，气以成体，体以受性。”“故虛者物之府也，气者生之戶也，体者質之具也。”这里認为虛与气是万物的原始。这所講的虛与气的关系，与張載正蒙中所講的有很大的区别。正蒙反駁了“虛能生气”及“万象为太虛中所見之物”的說法，潛虛所說，却正是認为虛能生气，并且認为虛是容納万物的所在。因为如此，所以潛虛中的万物根源学說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乃是很不明确的。

宋人張敦实著有“潛虛發微論”，他認为潛虛是“心学”。宋末的王应麟也說：“潛虛，心学也”（困学紀聞卷九）。潛虛的圖式都是內心思維的产物，而不是考察客观情况的結果。至少从这一点来講，潛虛的思想应該說是唯心主义。

迂書中有更明显的唯心主义观点。“小人治迹，君子治心”。“学者所以求治心也，学虽多而心不治，安以学为？”在“心”与“迹”二者之中，他認为心是主导的。

司馬光在迂書中說，他有取于佛家的“空”。“釋取其空”。何以取空？“空取其無利欲之心。”他認为利欲之心是完全应該消除的。这一观点正与李覯的思想相反。

（2）古今不異 司馬光認为历史是不变的，古今沒有差异。“古之天地有以异于今乎？古之万物有以异于今乎？古之性情有以异于今乎？天地不易也，日月無变也，万物自若也，性情如故也，道何为而独变哉？”（迂書）他認自然世界是古今無别的，人的性情也是古今相同的，从而推論出，生活的准則（道）也是不变的。

根据他的历史不变的观点，司馬光反对变法。他說：“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汉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汉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宋史列傳）。他認为一个朝代假如坚守开国的法規不改变就不会灭亡，朝代灭亡都是变更法制的結果。他这样来为他的保守观点辯护。

（3）論貧富 司馬光認为，貧富的区分是理所当然的。有的人生来聰明而且肯劳动，所以成为富人。有的人生来愚笨而且懶惰，以至于衣食缺乏，就变成穷人了。“夫民之所以有貧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識差長，憂深思远，宁劳筋苦骨，惡衣菲食，終不肯取債于人，故其家常有贏余，而不至狼狽也。貧者呰窳偷生，不为远虑，一朞月富，無复贏余，急則取債于人。积不能償，至于鬻妻卖子，冻餒塡溝壑，而不知自悔也”（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他完全掩盖了人剝削人的事实。他不但不承認貧穷是受压迫受剝削的結果，而且認为富人对于貧民是有恩惠的。“富者常借貸貧民以自饒，而貧者常假貸富民以自存。虽苦乐不均，然犹彼此相養，以保其生”（同上）。由此，他反对任何裁抑富人的措施。在这里，他代表大地主大商人說話。

宋代的进步思想家如張載、李覯、王安石，都要求解决貧富不均的問題，而司馬光却为貧富不均的情况作辯护。这个对照是相当鮮明的。

第四节参考文件

李覯：直講李先生文集——富国策一、六，礼論一，潛書，原文。

王安石：王临川集——洪范傳，礼乐論，老子，原性。

司馬光：司馬文正公傳家集——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迂書。

司馬光：潛虛。

科学出版社初版新書

黑龙江省滨州鉄路沿綫碱性草原的地植物学概論　T·Д·高尔捷也夫等著　0.36元（滬）

山东霑化县徒駭河东岸荒地植物群落的初步調查　周光裕等著　0.38元（滬）

茶樹生物学　庄晚芳著　道林本0.85元　报紙本0.60元（京）

亞麻　董一忱著　0.48元（京）

护林防火研究报告匯編　中国科学院林業土壤研究所編輯　道林本1.60元　报紙本1.20元（京）

金华猪　張仲葛編著　道林本1.10元　报紙本0.80元（京）

本草綱目的矿物史料　王嘉蘇編　0.46元（滬）

蚜虫概論　朱弘复著　道林本1.60元　报紙本1.20元（滬）

昆虫动态与气象　馬世駿著　0.90元（京）

关于物种与物种形成問題的討論

第二十集　T·Д·李森科等著　王爵淵等譯　0.46元（京）

第廿一集　B·H·苏卡切夫等著　俞志隆等譯　0.55元（京）

关于物种变化問題的研究（第三集）　B·B·斯克利普欽斯基等著　俞志隆等譯　0.55元（京）

示踪原子法和蛋白質代謝問題　B·H·奥烈霍維奇等著　凌治鏞譯　0.80元（京）

苏联中部地帶小家鼠的生态学　H·B·居皮科娃著　李汝祺等譯　0.46元（京）

論胚胎学当前的任务　Б·П·陶肯等著　刘若譯　0.24元（京）

作物栽培与环境　R·O·华埃特著　施證等譯　2.20元（滬）

根据植物細胞和組織的休眠深度对植物耐寒力的鑒定　П·A·金烏里等著　高煜珠譯　0.40元（京）

关于植物年龄周期性学說的評論　A·H·克連啓等著　傅世耀等譯　0.44元（京）

植物的二氧化碳施肥　B·A·微斯諾科夫等著　历葆初等譯　0.44元（滬）

米丘林方法在大田作物选种中的应用　B·Я·尤里也夫等著　孟庆喜等譯　0.46元（京）

落花生　З·A·盧济娜著　孙大容譯　0.80元（滬）

伊万諾夫斯基的生平及其科学活动　K·E·奥甫查罗夫著　高尙蔭等譯　0.60元（滬）

家蝇的生态及其在傳染病学上的意义　B·П·傑尔本尼娃·烏霍娃著　張宗炳等譯　0.90元（滬）

利用低温防治儲模害虫的生物学原理　P·C·烏涉廷斯卡雅著　唐覺等譯　0.50元（京）

高級神經活动类型学說及其对畜牧業的意义　B·K·克拉苏斯基著　張良敏譯　0.36元（京）

怎样在池塘里养魚　Ф·Г·馬尔蒂舍夫著　銀丕振譯　0.65元（滬）

从辯証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巴甫洛夫学說　K·M·貝科夫等著　賈金祥等譯　0.85元（京）

語言学論文选譯（第四輯）　A·И·斯米尔尼茨基著　高晶齋譯　0.28元（京）

新华書店發行

本刊每月三日出版·　零售每册三角五分　本刊代号2—2'4 2